

现在的瞬间，就是将来的历史

【 目 录 】

序	言	新沪中学沧桑六十四年 / P2—P27
第 一 章		沙龙轶事 / P28
第 二 章		音乐启蒙----文化沙漠年代 / P29
第 三 章		师生轮回 --- 忆艾华澄老师 / P31
第 四 章		金之光 / P33
第 五 章		娘子---成功处世的启示 / P34
第 六 章		拿破仑 / P37
第 七 章		巧克力---奋斗与机遇 / P38
第 八 章		顽童勾文海与“黑厚学” / P40
第 九 章		宋谷春列传/P45
第 十 章		玛丽 / P50
第 十一 章		道德楷模 / P53
第 十二 章		停课反省---六十年代学农纪实 / P54
第 十三 章		柴板---极左年代 / P57
第 十四 章		郁闷之夜---记 66 年废止高考 / P59
第 十五 章		张友白之死 / P61
第 十六 章		悼念名师毛天锡 / P63
第 十七 章		校长施纫秋之死 / P65
第 十八 章		“战斗小组” / P67
第 十九 章		有枪必有炮---文革目睹 / P70

第 二十 章 病退与勾家纪事 / P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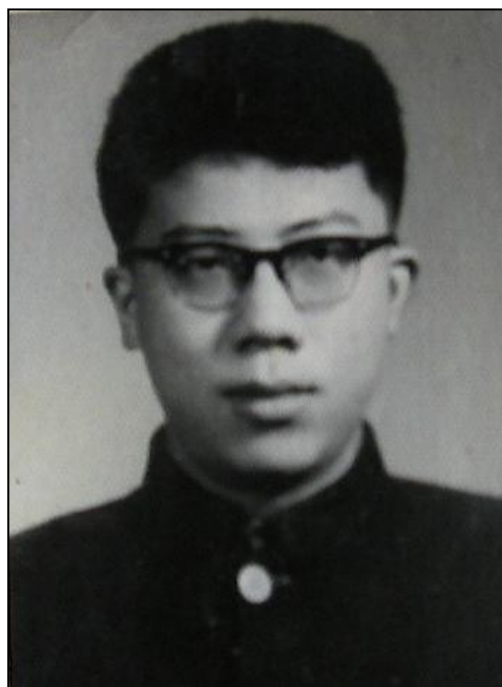
第 二十一 章 扬州才子 --- 忆恩师纪民 / P81

第 二十二 章 传奇---文革逃犯纪实 / P84

第 二十三 章 恩师许恽和 / P87

【 后 记 】 / P92

【新沪中学校史补遗十八则】/P93



仅以这些琐碎的回忆敬献给我的母校、同窗、老朋友、故去的恩师、同事以及我几十年来孜孜不倦教导过的桃李们。

【代序：新沪中学沧桑六十四年】

我的母校“新沪中学”，前身是“私立京沪中学”。据记载，新沪中学原校址为汤恩伯

的第三方面军接受的敌产-----原“日本海军俱乐部”（老市民称“东洋花园 ” ）地处溧阳路 1177 号，接近四平路口。）

1945 年创建京沪中学时，汤恩伯任董事长，校务由第一任校长**黄树滋**先生【见注 1：】全权处理。当时学校占地 28 亩，后增至 35 亩，（不包括外操场 14 亩地）楼房原有七栋，后新增至 12 栋。1946 年 8 月开始，京沪中学首批招生高初中九个班级，共计 460 人。（包括寄宿生 100 人）学生除上海学生外，还有来自苏州、无锡、常州等地外地学生，一律通过严格考试，择优录取，故新生各科文化基础相当扎实。1947 年夏，高、初中生增至 760 人，同时增建了民后楼和化学实验室。1948 年高、初中生增至 825 人。解放后初期达到 42 个班级、学生人数 2590 人，为上海滩上大型的私立中学。

黄树滋校长早年就留学日本，精通教育，抗战前又担任过中国三、四十年代名气极大的中国名牌中学“春晖中学”【见注 2】的校长，故治学开明而严谨。为了创建名校品牌，除了以原**春晖中学**的教师为主要班底外，他还广揽教学人才，分别从扬州中学、上海的复兴中学、光华大学附中等等名校高薪聘请了大批有名望的教师和学者，如蒋伯潜、陆本渊 魏凤江、陈致平、黄丹护、陈致平、励乃骥、胡斗文、丁浩霖等等。故师资力量相当雄厚、教学质量也极高。（扬州中学为当时江南名校，**乔冠华**就毕业于此校。）



下图：五十年代旧照片：是正对新沪中学溧阳路正大门的“中大楼”。

历史上，新沪中学培养过许多人才，遗憾的是至今没人专门统计过。仅仅据我个人所知，其中最有名、最感人的是当今享誉世界的考古学权威、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女，59 年新沪中学毕业

生，考取北大考古系。1963 年她从北京大学毕业后，面对北京与上海的分配选择，樊锦诗却毅然选择了千里之外的新疆戈壁荒漠中的小镇敦煌，在那里她四十年如一日的埋头苦干，再也没有离开过。而且说服了爱人来敦煌一起安家立业。电视中曾经系列报道过她在荒漠中贡献了一辈子青春年华的感人事迹。近年来她又首创了敦煌系统资料的数字化存储。敦煌莫高窟前建有她的石刻全身立像。为名人生前立像，在中国除了毛泽东之外，樊锦诗恐怕是少有的一位了。);

新沪中学知名的毕业生还有**钱梦龙**（48 届）全国劳动模范、著名的教育家；**吴蔚英**（男，50 届）是解放初新沪中学的学生地下党员、前徐汇区政协主席，**陈高华**（50 届，北大历史系毕业）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明史》编委会委员；**孙滨**（51 届）：前上海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张正宜**（女，52 届）：上海广播艺术团团长；**吴文珠**（56 届）：新中国第二批女飞行员之一；**陈汉元**（56 届）依靠人民助学金完成了从初中到大学的学业，考取了华师大，曾任中央电视台总编辑兼副台长、报告文学作家，他是《话说长江》、《话说运河》、《潘汉年》等一系列大型纪录片的撰稿人，现被誉为电视界的“牛虻”；九十年代重庆市长（姓名我已忘）；**郭常霖**：（55 届）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博士生导师；**丁贤勍**[jie](56 届)浙江农科所规划研究所所长；**吕龙根**（61 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西班牙文系主任、教育部评估专家组成员；**沈若蕾**（男，62 届，我的对门老邻居、比我大三岁）八、九十年代历任浙江省工商银行副总行行长、上海市工商银行分行行长；**陈鸿梅**（75 届）知名电影演员（由七十年代电视连续剧《玫瑰香奇案》出名，出演过《上海的早晨》《沙漠驼铃》、《上海纪事》、《烛光里的微笑》等多部电影和电视剧。); **林祥媚**，华师大教授、语言文学研究室主任、著名语言学家。**王迟**，现在的上海国际客运中心总经理；作家**殷慧芬**，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门栅情思》、长篇小说《苦情三部曲》等。先后获得过《萌芽》、《上海文学》的优秀作品奖；**万钢**，前同济大学校长、现在连任的国务院科技部长（最后四人均均为新沪中学老三届）等等，其实，新沪中学培养出的出类拔萃的人才（包括许多海外成名的人士和著名企业家）远不止这些人。

如图照片：第一排左一为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左二为本届国务院科技部长万钢，

左三为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陈高华，左四为著名的教育家钱梦龙。

第二排左一为电影演员陈鸿梅，左二为前中央电视台副台长陈汉元，右边是女飞行员吴文珠。



据我所知，在老新沪中学担任过教师的名人有：魏凤江，顶级梵文专家、泰戈尔的唯一中国弟子、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的同窗好友。1933 年秋，22 岁的魏凤江由中印学会会长蔡元培推荐并批准，只身赴印度留学，泰戈尔格外钟爱这位弟子，每逢外出讲演，他总把魏凤江带在身边，并要求魏凤江把他的讲演辞记录下来。以至于引起印度学生的不满。魏凤江在他的家中所创办的泰戈尔纪念室和圣雄甘地纪念室，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第一家民间国际博物馆。中印战争 20 年后，中国《人民日报》国际版头条刊发了一篇署名魏凤江的文章：《怀念英迪拉》，这是中印开始解冻的信号。鉴于他大量的国际社会沟通活动，被誉为中印友谊“民间大使”。长期



来，新沪中学一直派人每月给他送退休金。魏凤江于 2004 年 3 月 5 日逝世。

其他在新沪中学任教过的名人还有丁浩霖，三、四十年代中国著名的英语教育家：蒋伯潜，民国元老、著名学者、教育家，1955 年任浙江文史馆研究员。蒋伯潜对经学、文学均有很深造诣。励乃骥，民国元老，1926 年就加入孙文主义学会，曾任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院长，五十年代曾担任新沪中学数理教师，退休后又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翻译家李兰，三十年代曾任上海《光明》杂志编辑，解放初为新沪教师，后任上海译文社编辑。郑保定老师，抗战时为盟军的上校翻译官。后在桂林著名的美军援华空军“陈纳德飞虎队”司令部工作。经魏德曼推荐，他曾经带领一批飞行员赴美培训，退役时军衔为上校。同时，郑保定老师也是我校五、六十年代深受学生爱戴的高中英语教师。



覃 英

1947 年，新沪中学就有了第一名中共党员陈丽华，是她首先开始发展地下外围组织。至 49 年，新沪中学就有以吴蔚英（男）为首的中共地下党党支部（约 20 人，绝大多数为青年学生）进行秘密活动，并公开成立中共外围组织“新生社”，创办“新生报”，私下散发传单，传播革命思想，在黄树滋校长的庇护下，组织不断壮大。解放前夕，他们成立护校队，绘制上海北四川路地区详细地图，冒雨带领解放军迂回包围国民党军队。49 年 6 月初，上海市军管会以舒文为军代表、覃英为组长，接管了京沪中学。届时四达路的“中正中学”并入京沪中学，于是，京沪中学更名为“新沪中学”。覃英成为新沪的第二任中共校长。（根据网上的回忆录，覃英是一个相当低调而富有人情味、又具有早期共产党员优良风范的校长）但当时的新沪中学的建制依然为私立中学。

1954 年，原“私立前进中学”【见注 3】并入新沪中学，此时我校已经成为拥有 42 个班级、学生人数达 2590 人的大型完全中学。1954 年，新沪中学响应上海市教育局的号召，先后无私地调出两批优秀骨干教师支援解放后新建的高等院校，担任大学讲师和教授。直至反右运动重创后，大批骨干教师被打成右派和历史反革命，师资力量才被严重摧残削弱，（下文将详述）高考升学率开始明显滑坡。解放前，新沪中学作为一所私立中学。在寸土如金的大上海，教学大楼之多、占地之大在私立中学中绝无仅有的。尤其是藏书量之多更是在上海虹口区各个中学中首屈一指，中学名师更是不胜枚举。由于新

沪中学各科优秀师资济济一堂，阵容强大。名声在外，故入学新生的素质也相当好，高一新生录取比例大约为八、九取一，竞争非常激烈，因此高考成绩极为出色。解放后从 1948 年一直到 1958 年我校高考平均升学率高达 98%，而且重点大学占其中的 95%，是虹口区（当时叫“北四川路区”）名副其实的名校。五、六十年代，新沪中学毕业生中尤其是考取医学院的百分比特别高。和现在不一样，当时考大学模式是文、理、工、医、农分开，每类要考六、七门学科，和现在一样，考医学类大学相当难。



自然，当时新沪的学费比起公办中学也昂贵得多。（高中每学期 60 大洋、相当于那时一个中级职员月工资）记得解放初我三哥和表哥好不容易同时考进新沪中学，由于表哥家境不佳，读了半年，实在付不起学费，不得不转学到复兴中学。在今天的虹口区的中学生看来，这种事几乎是本末倒置。

【注 1】：新沪中学的创始人黄树滋，1897 年出生于上

虞丰惠镇蒲湾村的书香世家。1921 年公费出国东渡日本留学，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大学。学习期间，结识了当时在学校附近以经营小饭铺为生的浙江同乡汤恩伯。当时汤恩伯正在设法进陆军士官学校，黄树滋的慷慨解囊相助使汤恩伯感激不尽，一再表示：将来若有出头之日定当报答厚恩。当然，黄树滋的这一义举，并不是为了日后图报，而纯粹出于对同乡的同情。

1925 年，黄树滋从东京高等师范大学毕业回国。黄树滋曾回家乡与其弟共同在祖宅创办免费农民夜校，教农民读书识字，甚受农民欢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黄树滋被迫离开省城，暂避他乡。1930 年，黄树滋应经亨颐先生（近代教育家、国民党元老）之聘，毅然返回家乡，不顾土匪绑架的风险，出任春晖中学校长，（春晖中学在三、四十年代是中国的名校）并且连任达五年之久，成为在春晖中学任期最长的一位校长。黄树滋主持春晖中学校政，继承和发扬了春晖的优良传统，教育认真，师生融洽，学风民主，言论自由。面对“九·一八”事变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他支持春晖师生积极投入抗日

救亡斗争，触犯了国民党政府当局。1935年，浙江省教育厅指派省督学来校导演了一场“驱黄夺权”的闹剧，从而引发了由春晖师生和校友联手的声势浩大的护校运动，连何香凝女士等许多名人也来函声援，终于迫使当局取消了接管方案。但是事后为平息这场风波，黄树滋主动提出了辞呈。

汤恩伯自1926年从日本回国后投靠蒋介石，成了蒋的亲信嫡系，迅速发迹。在黄树滋任春晖校长期间，汤恩伯曾多次来信要他出去做官，均被他婉言谢绝。但黄树滋辞职以后，一家八口的生计日益艰难，在其妻的一再催促下，才不得已给汤恩伯去信求职。汤恩伯不食前言，以礼相待，欲委以重任，但黄树滋不愿从政，他只想在部队中干些文化教育工作。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两党商定在南岳衡山创办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由蒋介石任主任，汤恩伯和叶剑英任正副教育长。汤恩伯委派黄树滋以教育长助理的机要室主任的职务先去筹备。黄树滋通过与叶剑英朝夕相处，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和友谊。他曾利用自己的工作权限，为共产党的活动提供了不少帮助。所以，当叶剑英在离开南岳干训班时曾紧握黄树滋的手说：“你做的好事，我们全知道，共产党不会忘了你这个朋友，我们后会有期。”抗战结束后，由于黄树滋坚决要求重返浙江教育岗位，汤恩伯从上海办事处拨出上述的溧阳路地盘，以蒋经国的名义恳请他筹办京沪中学。1946年夏，由汤恩伯任董事长、黄树滋任校长的上海市私立京沪中学建成开学。在白色恐怖笼罩下，黄树滋坚持开明办学的方针，多方延聘名师，培育良好校风，同时利用汤恩伯这块招牌，掩护和支持校内地下党员和进步师生的革命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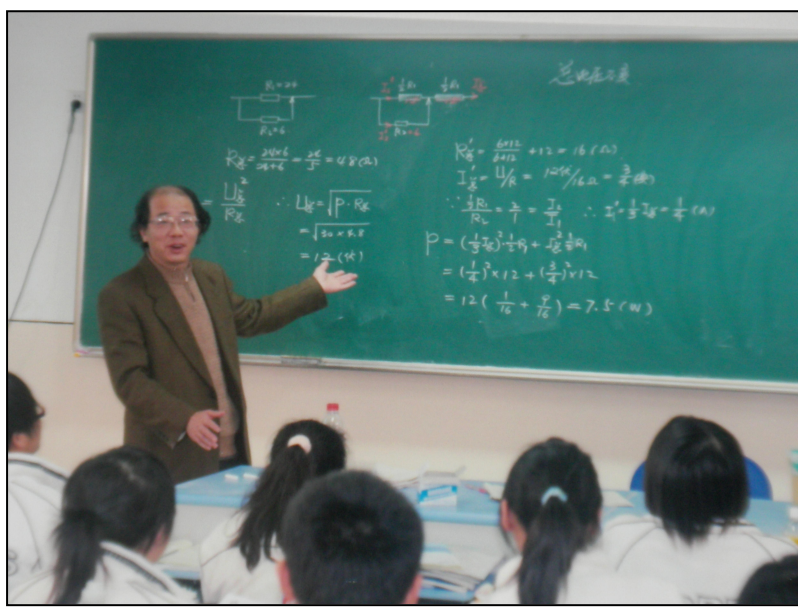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急转直下，汤恩伯与黄树滋的关系也迅速恶化，直至最后彻底翻脸。就在上海临解放前的某一天，汤恩伯（见照片）把黄树滋叫到他家中，掏出一把手枪往桌上一撂，恶狠狠地说：“我待你不薄，你为何总是给共产党说话？现在我要你马上去台湾，否则休怪我对你不客气！”这时正好进来几个美国人和翻译，黄树滋只说了一句：“那就让我先回家去安排一下。”趁机急速溜出汤家。于是全家匆忙出走，转移到成都南路亲戚家的小楼避难。过了十几天，终于盼来了上海的解放。解放后，他离开上海京

沪中学回浙江老家。应邀担任杭州市第四中学校长。1956 年以浙江省代表的身份到北京出席了中国人民促进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是一位真正与共产党长期精诚合作、同舟共济的民主人士。但是，“文化大革命”使黄树滋也难以逃脱这场巨大的劫难，与汤恩伯的特殊关系成为他永远无法说得清的历史罪状，终于使他于 1970 年饮恨而终。

【注 2】：春晖中学是中国三十年代的名校，丰子恺、朱自清、朱光潜等许多名人曾经任教于此所中学。该校居然还能不定期地邀请到当时社会各界名流，如蔡元培、张闻天、叶圣陶、胡愈之、黄炎培、陈望道、黎锦晖、俞平伯、吴稚晖、何香凝、廖承志、柳亚子、张大千、黄宾虹等都前来考察和讲学。大导演谢晋、泰戈尔的门生魏凤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胡愈之、作家黄源、哈佛大学教授石雨江等名人皆毕业于此校。)



【注 3】：“前进中学”是由抗战时的《前线日报》总编辑、著名作家、记者曹聚仁先生创立并担任前进中学校长。期间，他不受学校分文酬劳，这种清廉耿介情操在物欲横流的现在更加令人肃然起敬。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军管会通知，将没收前进中学校产，幸经曹聚仁偕同教务和总务主任前往军管会说明，始获允许于暑假迁出，另租房舍。不久，前进中学并入新沪中学，曹聚仁离校移居香港。曹聚仁是一位中国近代史的名人，解放后他多年为两岸国共秘密和谈在大陆与台湾之间多次奔波，在中共高层与蒋介石父子之间做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工作，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台湾对国共和谈彻底失去信心为止。他被两岸都承认是“国共密使”。详见“钟恕尧博客”中转载的有关曹聚仁介绍。



从 1960 年至 1966 年，我的初中、高中都就读于新沪中学，亲睹了新沪中学的文化大革命狂潮。1967 年插队落户。1978 年我又回到母校，长期从

教于高中物理教学，历任十四届高三毕业班的物理教师、教研组长、中层干部、民主党派（民进）支部书记、退休前连续三届担任虹口区兼杨浦区物理高级教师资格评审委员。

从 1960 年到 2009 年退休，从普通学生到母校的高级教师，我就读于此、立业于此。前后时间延续长达四十余年，在母校，我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中苏决裂，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10 年以后，回到母校后又经历了改革开放年代、目睹了母校原校址的拆毁和新沪中学的两次搬迁。以及眼睁睁看见了 2008 年新沪中学拆并的“无疾而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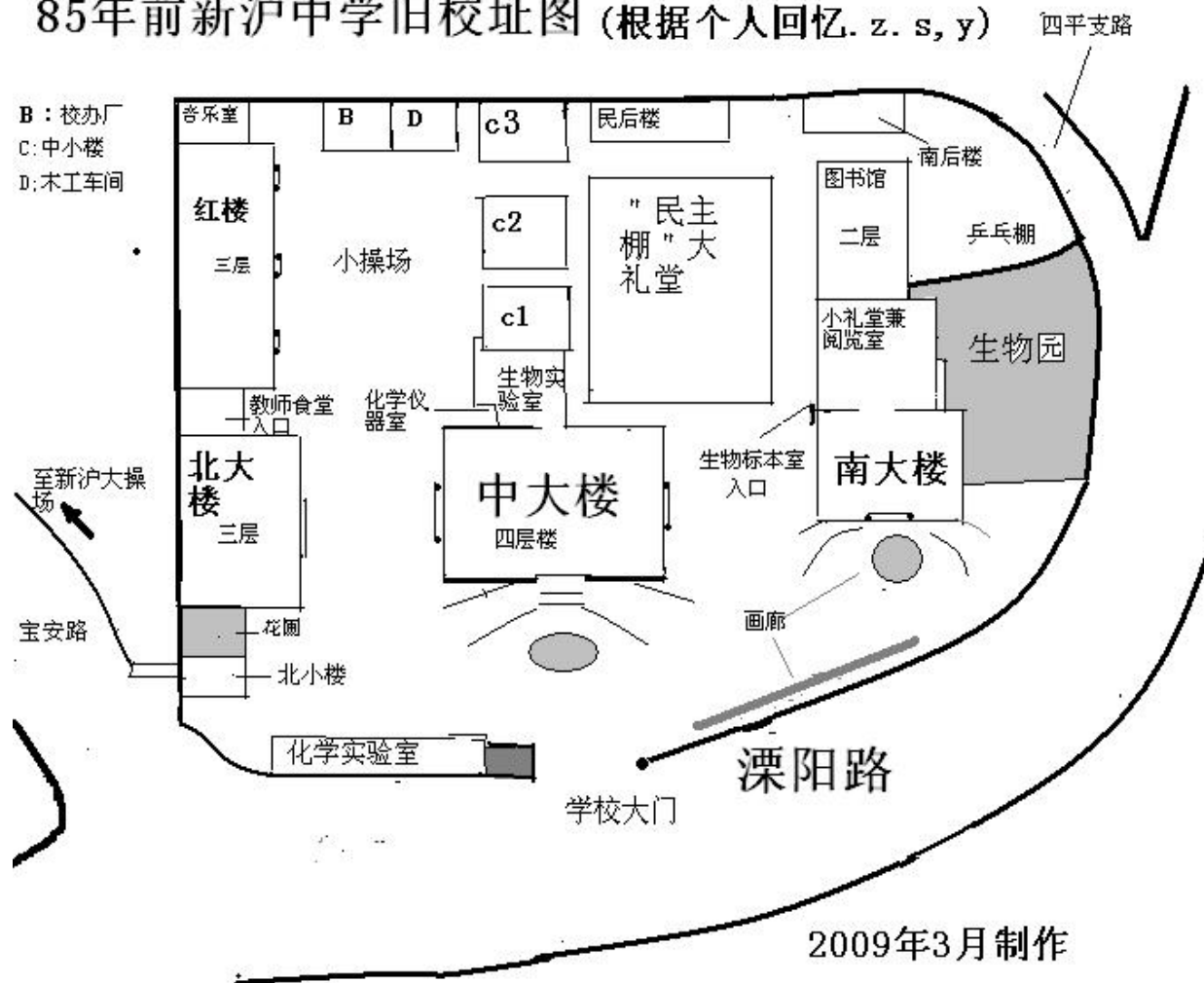
老新沪的一草一木对我如此亲切，年华流逝，往事如烟，一切仿佛电影般淡出。窗前景下，凭着历历在目的四十多年的记忆，我运用初级的电脑水平画出了一张六十年代老新沪的学校平面图，供新沪中学校友们参考，同时也是作为一名六六届高三中毕业生对母校“亡故”的祭奠，抚案沉思，感慨不已。（见下页图）

【注】：本图为新沪中学本部的平面图，不包括校外大操场。如今，图中的四平支路、大明铁工厂早已经不存在。旧址为许多栋豪华高层建筑、“喜临门”大酒家和横穿的新马路完全肢解，老校友到此，已经完完全全看不到老新沪中学的丝毫影子了。只有在新沪中学老教师的心目中，还有老新沪中学平面结构的清晰轮廓。

与上海乃至全国许多非常有名的历史性建筑因为商业利益被统统拆掉相比，与许多新造的“伪历史建筑”相比，老新沪的消失微不足道。

中大楼、南大楼都是解放前日本人所建西式建筑，大楼正面两边都有有缓缓而上的坡道，轿车直接可以驶到门廊下，既方便、又避雨。（见第十二页）此外有红楼、北大楼、

85年前新沪中学旧校址图 (根据个人回忆. z. s, y)



中小楼三栋、北小楼、北后楼、南小楼、南后楼、民后楼、生物园（有两扇铁门在大炼钢铁时被拆）校办工厂、木工间、音乐室（上层为单身教师的宿舍，文化大革命时优秀教师张友白就因受辱自杀于此。详见十五章“张友白之死”）此外，还有独立于教学大楼的化学实验室（在校门右侧，为厚铁皮外墙、典型的防火结构建筑，）尤其是**民主棚大礼堂**，是一幢独特的纯毛竹结构的建筑物，约可以坐十几个班级的学生，面积之大，上海仅此一座。文革后被拆除，改为水泥地操场。

新沪中学总计有大大小小近二十多座建筑。

“**红楼**”为办公行政楼和教师办公室。红楼的一楼是总务处、团委、教导处、油印室、音乐教室、地理、历史办公室。二楼有五个大办公室，每个五、六十多平方米，大办公室都一律朝南、高敞明亮，每个办公室内部配有盥洗室，洗手池。三楼（加层）是五个教室。



(上图照片：为红楼一角。校长室就是图中红楼二楼左上角两间开窗处，二楼往右的八个窗户处是互相串联的大办公室，照片外最后的两个窗户处是教师阅览兼休息室。)

解放后，当时的新沪中学师资雄厚。老教师告诉我，新沪还有多个高薪聘请的名师在新沪兼职，这些客座教师雇用黄包车来回奔波于各名校之间，被戏称为“黄包车先生”。教师的俸禄、待遇也自然相当优厚，直至五十年代末，教师的午餐仍旧沿行解放前的包桌制，教师不吃食堂，六人一桌，五菜一汤。中午下课，学生们常常看见四川路大饭店的几个伙计用扁担挑着热腾腾的饭菜大蒸笼，往教师食堂里送。据老教师说，那时，每天上班前，学校工友早已把办公室垃圾清空，打扫得干干净净。如果教师在办公桌上放上茶叶罐，那么，教师上班时，一杯热茶已经为你泡好了。六十年代，新沪中学只有七、八个工友（即工务员），却管理着几千人学校的一大摊事务，工作效率之高，现所未见。从打扫校园、办公室、张罗一半学生的食堂膳食、从木工、电工、泥瓦、花木、修理校舍、布置场地、上下搬运等等，他们个个非常敬业。我印象最深的几个有：木匠王岐山（有时加上一个临时工）就要负责全校两千多张旧课桌、椅和各种木器的修理工作。电工老丁也是我印象极深的一个，五十多岁，背有些驼，双手布满老茧，里里外外一把手。当时我甚至以为他是哑巴，因为他几乎像鱼一样寡言，但随叫随到。尤其是理、化、生老教师都对他格外尊重和敬佩。我亲眼看见过他修理实验室用电设备时居然从不关电闸，

也不带手套而带电操作。物理老师告诉我，他的厚厚的老茧是绝对保险的绝缘层，所以既安全，工作效率又高。78年我回新沪从教时，他早已退休，现在已经过世多年，可老教师们依然常常叨念着他的。此外如徐火宝、莫乐夫等都是吃苦耐劳的能人



上图旧照片是 1968 年遭到文化大革命摧残后破败的新沪中学校舍。右图为中大楼，正对校门。左图为南大楼前部，南大楼延伸的后部（下图）是生物仪器室、阅览室兼舞

厅、庞大的图书馆。照片中南大楼楼前那棵广玉兰树由于缺乏管理，已经营养不良。中学时代，它极其茂盛，落下的花瓣比手掌还大。旧照片是我们 1968 离校去插队落户前我的同学勾文海所摄，给本文留下了珍贵的回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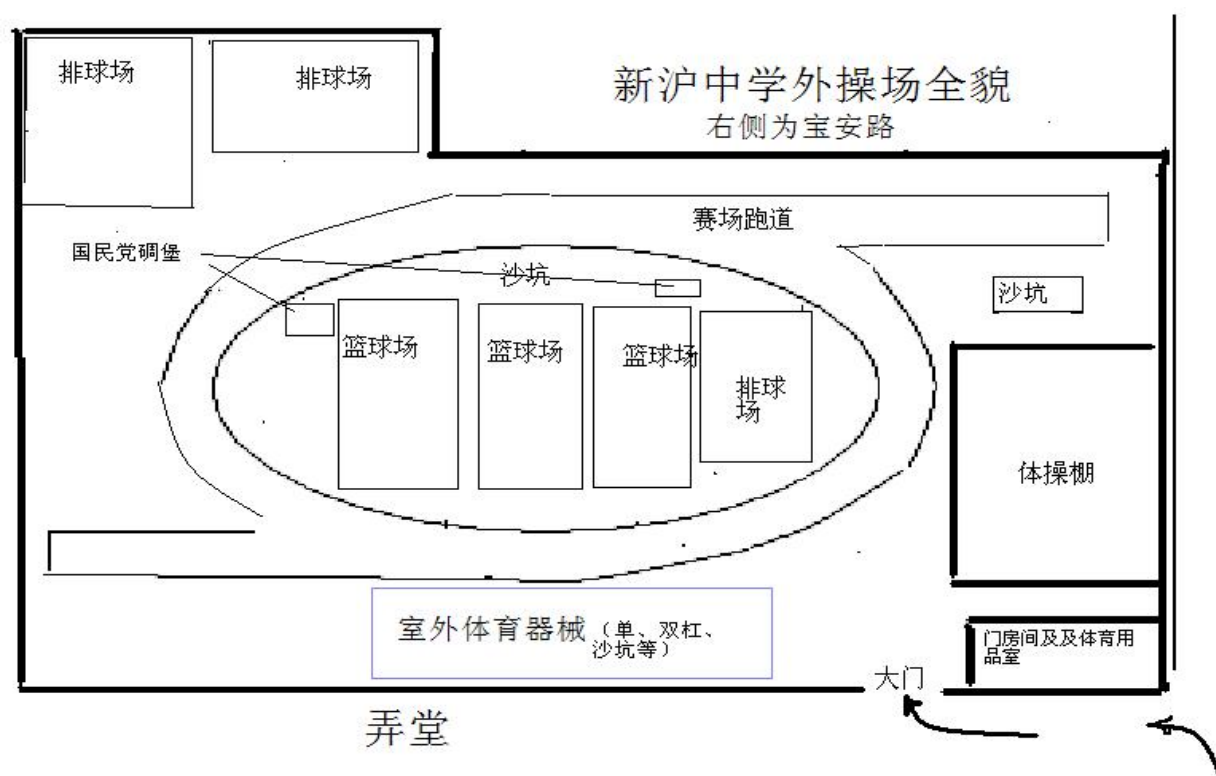


下图是南大楼侧面图，（迁校前所摄）右边是教学楼，包括四个教室、卫生室、美术室、生物标本馆。左侧与南大楼相连，是阅览室兼舞厅，有相当考究的地板。阅览室那一侧有巨大的阳台和大花园（生物园），照片再左（画外）南大

楼又与南后楼庞大的图书馆相通。

新沪中学（本部）不但占地三十五亩，还有一个面积十四亩的校外操场，地处离开总校约一百多米的宝安路边。因此学校总面积加起来相当于当时两个复兴中学的面积。新沪操场的看门人兼体育器械管理员是个山东人，我们都称呼他“老刘”，长脸、额头上一排排皱纹，满脸胡子拉杂。极其负责而且严厉得不留情面，经常骂骂咧咧的忙碌着收拾被人乱扔的体育器械。所以，年轻的体育教师和调皮的学生都挺怕他。

大操场边有一个室内体操棚，三百五十米跑道、三个排球场、三个篮球场、田径、沙坑场地。西北、东北角各有一个国民党时代阴森森的钢筋水泥大地堡，一个上半截已经炸毁，另一个里面黑洞洞的。暑假期间，一下雨，除了操场跑道，百草疯长，几乎齐膝高，一片片青翠翠的巨大草地，虫吟蛙鸣，生机盎然。由于我家就住在新沪操场对面，从小就常常去那里捉蚱蜢、蟋蟀，捕知了，捞蝌蚪。新沪大操场是我和小伙伴们童趣的乐园。但迁校前后，外操场一再被蚕食，最终被剥夺。根据教育局规划外操场旧址建成后来的两座学校，即溧阳中学和宝安路小学。（下图：是我根据粗略回忆绘制的位于宝安路西侧上的新沪中学外操场示意图。）论四十年代的中学操场规模，可谓相当庞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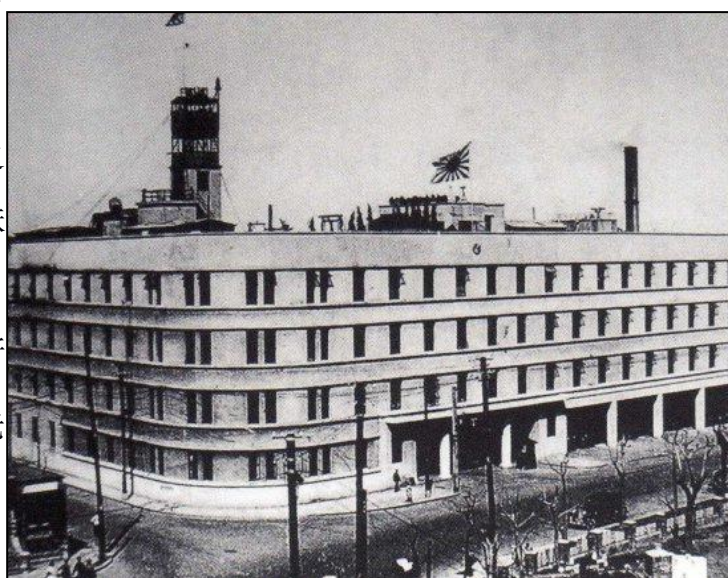


解放前后，新沪中学的排球队与棒球队在全市中学中非常有名，屡屡夺冠。直至 1956

前我校男、女排球、男子篮球一直雄踞虹口区冠、亚军宝座。优秀的棒球、排球教练有**朱光汉**、**董健**（女）、**林秀峰**等。林秀峰，男，韩国籍，他在改革开放后回韩国，我在“参考消息”上曾经看到过关于他在韩国奥运会上热心做中文翻译义工的报道。我们学校还有一位体育教师**郭启达**老师（我的隔壁邻居），是旧上海很有名气的棒球教练，曾经当过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孙科的陪练。1957年郭启达老师被打为右派后，开除教籍，削职为普通员工。七十年代，尼克松访华后，政治形势稍微开放，他的一位学生（已经是香港大商人）来沪看望恩师，请他吃饭、还请他去打羽毛球。球场上，年近六十的郭老师也许百感交集，过于激动，突发心脏病，当场救治不及去世。在我的印象中郭启达老师是我们弄堂里出名的好好先生，谦谦君子，一家三代人都非常有教养。他怎么可能向党“发动猖狂进攻”？对此，我至今始终无法想象。

新沪中学的生物标本室是我学生时代印象极深的地方，它在南大楼侧面有一条单独的入口阶梯，很少对学生开放。我当学生时，曾经为生物老师黄秋容搬过几次生物标本。目睹其规模之大，简直是个小型博物馆。共两、三层，而且室内装潢考究。一进门，光线昏暗，就觉得阴森恐怖，神秘莫测。顺着铺有地毯的深红色精致楼梯盘旋而上，至少能看到两具真正的人体骷髅骨架站在那里凝视着你，使人毛骨悚然。珍贵的金丝猴、小熊猫、猢狲标本、以及难以计数的动植物标本、模型。以及浸在福尔马林玻璃瓶里的许多正常和畸形胎儿标本，可以说应有尽有，我常常看得流连忘返。这些都是初创京沪私立中学时**黄树滋**校长不惜工本购置的，即使与那些公办的各中学相比也堪称豪华。经过两次迁校，上交给虹口区教育局的教具已经无法计算。

北大楼和北小楼之
小型水泥旧建筑，厚铁
锁。这是个神秘所在。
是1945年前日本人所
水泥地道的入口，据老
面的水泥地道宽四米，
摩托车可以并排行驶，
宪兵司令部，（如图：即



区教育局
间有一个
门终年紧
后来知道
造的钢骨
教师说下
两辆双斗
直通日本
今天四川

北路、黄渡路口、“天兴”百货商场对面一排灰色大楼，曾经为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地道长约一公里多。

老一辈教师告诉我，1957年反右运动之前，新沪中学民主党派成员极多，占教师总人数30%以上，民盟、民建、民进、民革、九三学社、农工民主党，几乎包括所有的民主党派支部，是不可小觑的一股政治力量。大鸣大放时，一大批资深的优秀教师纷纷抨击党员校长陆鼎丰【见16页注】根本不懂教育，纯粹是“外行领导内行”，致使新沪中学的教学质量滑坡、高考升学率逐年下降，影响了名牌中学的声誉。

于是，当时大鸣大放辩论会上一大批对教育现状焦虑不堪的民主党派教师大胆提出主张：把南大楼一块（约三分之一地盘）划地而治，由他们来管理，实行“一校两制”。用事实来比一比，看看到底谁治校的教学质量高，可谓书生气十足、政治上极端幼稚。正如中共已故开国元老王某所坦言的：“老子挖的坑，怎么能让你来拉屎！？”

反右后期，这种与党“分庭抗礼”的主张自然大逆不道、罪不容诛。反右运动结束，开始收网抓鱼，新沪中学里“揪出”的右派分子、“历史反革命”的数量之多在上海的中学中名列第一，成为反右斗争中的“重灾区”，与另一个“重灾区”复旦大学一样高居榜首，在当时是路人皆知的。于是，反右运动清算时，大批教师或戴帽、或开除学籍、或入狱、或押送外地劳动改造、或沦为打杂的工务员。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也不相信，那个年代，只要党支部书记签个字，公安部门就轻易可以将一名员工以某种罪名拘押起来，甚至劳教。当时，单单“右派”竟然占教师总数四分之一，共计三十余人，几乎都是民主党派成员，还不包括所谓“历史反革命”。其中包括知名的大右派有罗海沙（民革负责人），黄寿同（新沪中学工会主席）、郑保定（上文提及的著名教师）、薛彬、徐则文等人。（徐则文，民盟负责人，因为他的“右派”言论加上解放前入过三青团，就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判刑三年，发配甘肃劳改三年。徐则文至今健在，前几年曾经在《南方周末》上发表过《新沪中学‘反右’纪实》一文。）据他在《纪实》中说，尤其可笑的是：在当时“为党整风”辩论会上的张世琳老师（女）仅仅是大会主持人，甚至连一句“右倾”的话也没说过，后期居然也一起被划为“右派”，蒙受莫名之灾，真是可笑而可悲。无异于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反右往事不堪回首。同学勾文海曾经告诉我，在号召“百家争鸣、为党整风”前期，

她的母亲赵克文（新沪中学高中语文教师）既没有写大字报，也没有上台发言。于是教导主任王康德（党干部）特别找她促膝谈心，进行动员：“你也是老教师哦，我知道，你心里一定也有不少委屈嘛。谈出来为党整风嘛，大家都有责任敞开心扉，希望你说说心里话，不要有顾虑嘛。”语气恳切、目光和蔼，充满了真诚的“期待”。而他母亲警觉性很高，状如惊弓之鸟：“没有，没有，党对我很好。”她以各种理由婉言推辞，故没有轻易上当，侥幸逃过了一劫。而他的父亲（民盟、九三学社骨干、市府高级干部）却在市府慷慨陈词，对我国高中数学教材中全盘照搬苏联教材提出质疑，包括不同意删去高中教材中“解析几何”部分等。于是，运动后期他被带帽右派并且受到民盟严重警告处分。英国诗人拜伦说：“他们经过千辛万苦达到了陆地，或许会发现那陆地原来是一块礁岩。”而对所谓的右派分子而言，他们直言不讳地“帮助党整风”后，发现的恐怕不是什么礁岩，而是一个大大的捕兽夹。由于“右派分子”多数为教学骨干和名师，使新沪中学的师资队伍受到致命性的打击，教学质量一落千丈，沦为二、三流中学。

俱往矣，政权未立之前，M对知识分子尊敬有加，百般笼络。可新政权初立没几年，就立即翻脸，六亲不认，甚至横加迫害。最厉害的是，迫你开口，又不让你分辩解释，却让你不断地自我羞辱，即所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外国人形象化地称之为“洗脑”。）哄你开口，名曰：“为党洗脸、帮助党整风”。嗣后，又罗织罪名，说你是阴谋，他却是阳谋，即所谓的“反右运动”。这纯粹是六十年代版的大型“钓鱼执法”。呜呼，独裁之下，安有公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记得我在62年读初二时，教我们班的几何老师姚祖焕先生就是劳教后侥幸回校的“右派分子”，做人低调，但教学风格严谨，水平尤其了得。初中几何相当难教，但是他的教学思路清晰，语言简练。而且他是一个很有师德的老教师，在养成初中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方面诲人不倦，并迅速地提高了我们的逻辑分析能力。单单他上课的板书就令人惊叹不已，脸盆大的圆，他拿起粉笔一挥而就，从来不用圆规。但他只配教初二，当时，这已是属于相当“宽宏”的安排了。

【注】：陆鼎丰，解放前是苏南游击队干部，五、六十年代，他担任新沪中学校长、党支部书记长达十多年。我的印象中，每次全校大会上他的发言总是“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帝国主义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说教空洞，冗长乏味，毫无文采可

言。而且一口浓重的崇明普通话，说话错别字特多。比如，他在历次大会上一直把帝国主义的核讹诈读成“核化诈”，从来没有改正过，当然也没有人敢于纠正他。平心而论，尽管陆鼎丰憨愚无能，也算不上是恶人。但他忠实执行了我校“反右”运动和文革前期打击知识分子的政策。另一方面，他在文革中、后期也受到过政治冲击。四人帮打到后，他也参加或主持了几次受迫害教师追悼会。最近听说，他随女儿移居美国，在“帝国主义国家”享受了多年社会福利之后，前几年因老年痴呆症去世。



如图是 1963 年新沪中学毕业生团体照的局部：中排右一为**施勿秋**校长，右二为支部书记**陆鼎丰**，右三为教导主任**王康德**（就是那位反右前期“苦口婆心”动员赵克文老师向党进言的党员干部）右四为副教导主任陈序，右五为校办主任魏玲雅，右六为团委书记**林钧凤**，右七为全国优秀大队辅导员**李承昌**（改革开放后曾经担任过虹口区集体事业局局长。）

张诚一老师是一位慈眉善目，脸颊白皙，温文尔雅的人。而且，在我学生时代和回新沪任教的漫长岁月中，在我印象中的张诚一老师始终是一个低调、谨慎、勤勤恳恳的教导处职员，他奉命书写的教导处通知（无论是钢笔字还是毛笔字）都是可以临摹的标准行楷，书法极有根底。后来我才知道他曾经被打为右派分子，革去教籍，才沦为普通职员。我也亲眼看到他在六十年代曾经成功地培养出一支庞大的新沪中学民乐队。（那时我正在新沪中学念初中，听过这个乐队演奏的“金蛇狂舞”、“旱天雷”、“紫竹调”等难度颇大的名曲）现在，我又在网上看到 67 届的校友们对他众口一词的称赞，他们的回忆文章中说 he 是一位循循善诱、才华横溢的音乐老师。摘录如下：

“我跟张老师学的是二胡，由于这一类兴趣小组的指导老师大多数也都是某一门课的任课老师。因而有一天学琴，我曾问张老师教哪个班、哪一门课？他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了，但仍然很温和地回答说：“我是犯过错误的人，暂时还不能给同学们上课。”我

的心一惊，隐隐产生一种同情。”

“…也许领导（指施纫秋校长）觉得只让他在总务处打杂实在可惜，由他来组建指导这个课余文艺团体确是‘慧眼识珠’。民族乐器的‘十八般武艺’，张老师真是样样‘来事’，而琵琶是他的最爱。他独奏的琵琶曲‘十面埋伏’使我们所有的乐团队员大为倾倒…”

但万万没有想到，另一场更大的浩劫很快就会接踵而至，他又重新沦为政治运动的重点打击对象。以后我才知道，实际上他是一位长期对共产党绝对信任和抱有殷切希望的知识分子，历经磨难而痴心不改。否则，就不会由于真诚对共产党“进言”而成为右派分子，这真是一段可悲的历史悖论。

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2000年，已经退休多年、年近八十的张诚一老师竟然又向党支部递上第N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书，使得党支部颇为难堪、举棋不定。以至于党支部书记曾经专为此事找我这个民主党派干部征求看法（我当时也可以算“老新沪”了），使我们这些比他小一辈的教师大为诧异，深感这位受过几十年委屈的张老师在政治上超乎想象的执着，这样的大好人恐怕连“史记”中也绝无仅有。

据67届校友说，六十年代的新沪中学校徽的题字是他的墨宝，但我看完全不像他的



端庄凝重的书法风格。也有许多人说，这是文化大革命中自杀的名师张友白的手迹。依我看从政治角度推断，两人题字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这只不过是如今新沪老校友们对恩师崇敬而产生的美好猜测而已。因为，无论他们两人的书法水平在新沪中学如何出类拔萃，共产党的中学怎么可能让右派分子来题写校徽呢？（见图）果然，据我最近多方了解才弄清，题写校徽的乃是当时新沪中学政治舞台上煊赫一时、翻云覆雨的姓应的大人物，应氏兄妹（已患癌症死了）是1957年决定右派名单的主要幕后人物。本文避讳，不屑于提起任何政治运动健将。

我们的体育老师是朱光汉，体育教研组长兼校排球队教练，身体壮实，古铜色的肤色，目光炯炯逼人，俨然一位武将的形象。然而他的书法底蕴不浅，写得一手好字。他对学生的严厉在新沪中学是出了名的。记得一次，由于我们在体育课上“引体向上”做得不认真，他罚我们几个在单杠上吊了五分钟，引得同学哈哈大笑。1978年，我回到母

校老新沪任教，居然发现他依然没有被“解放”，（他解放前曾经担任“前进中学”总务主任，为曹聚仁的得力助手，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关系密切。文化革命中他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还在干扫地、冲厕所的清洁工。十多年的老同事都对他形同陌路人一样，从不打招呼。世态炎凉，莫过于此。

当我一眼认出他时，忍不住一阵悲凉。偷偷把他拉到中大楼后面一个阴暗的甬道里，紧紧地握住他戴着工作手套的右手，轻轻地安慰他“保重。”他穿着一件旧兮兮的工作服，拎着一个锈迹斑斑的铁桶，却一句话也不说，木木地看着我，全然没有了当年豪爽的风度。我常常私下诧异，为什么那个时代人的形象往往会有那么大的落差，今为座上客，明为阶下囚。形同冰火两重天。（注：直到八十年代初朱光汉老师才被“解放”）

但是反右运动之后，我校仍有不少“硕果仅存”的优秀教师。如化学二级教师**尹凤玉**和**毛天锡**、（内行人都知道当时的二级教师相当于现在的特级教师，整个虹口区没几个人。）此外还有数学教师**张友白**、**浦新墨**，语文老师**纪民**、**谢寅生**、**林得连**、**胡秉诚**，化学教师**许经**，物理老师**许悻和**，**黄益治**，生物老师**徐蕴玉**，以及培养出不少高足的美术老师**黄昌元**、外语老师**郑保定**、**史济美**、**薛彬**、历史老师**葛彦初**（音同，具体名字记不住了。）体育老师**朱光汉**、**林秀峰**、和蔼可亲的音乐老师**祁屹**、**张诚一**老师以及初中骨干教师如：**胡忠民**、**郑士俊**、**周建勋**、**关锡鸿**、**陆秀君**、**张象碧**、**章云裳**、**胡俊声**以及慈母般的语文恩师**艾侠**老师。他（她）们中的许多人至今健在。（请谅解，我可能会遗漏许多优秀的老教师。）

六、七十年代以后，新沪中学教学上后起之秀的年轻教师有：**黄渭风**、**曹群**、**赵蔚庭**、**孙佩芳**、**潘裕倩**、**黄世海**、**何坚康**、**赵立人**、**崔乐美**、**郑杰**。等等。这些年轻教师后来相继担任教研组长、虹口区学科带头人、区教研员、教导主任、校长、虹口区教育学院教务长、区长秘书等。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新沪中学师资队伍遭到的毁灭性打击，80%的老师“靠边站”，甚至遭到惨烈的批斗，许多优秀的老教师纷纷受到种种攻击、迫害、凌辱。而老教师**林得连**、**郑保定**、**薛彬**（女）、**张世琳**（女）、**黄秋容**（女）、**毛天锡**、**董健**（女）、**张友白**、**浦新墨**、**朱光汉**、校长**施纫秋**（女）以及**张振华**等人成为重点批斗对象。批斗形式包括戴高帽子、游街示众、抄家、集体站在北小楼平台面对全校师生挂牌子接受所谓全校批斗、甚至剃“阴阳头”（如职员**徐水仙**等等）等等。尤为不可思议的是**董健**老师

家的四、五只宠物波斯猫被红卫兵一一处死、悬挂示众，使她痛不欲生。高二的一位语文老师（据说是唐学增老师）因为曾经留学法国而被抄家，他藏起书房钥匙，甚至跪在红卫兵面前百般求情，但根本挡不住抄家风的洪流，最终他的大量珍贵藏书依然被付之一炬。张友白老师绝望地自杀了，毛天锡、校长施纫秋等人被长期“隔离审查”几年后忍辱抱病而死。（下文中第十五、十六、十七章我将详细叙述。）

文革前期，幕后拼命抛出教师档案“黑材料”并暗中操纵者就是党支部的材料组。到文化大革命中期，天下大乱，连迫害人的人也开始“受迫害”了，甚至包括党支部书记陆鼎丰。在此不表，老新沪人最清楚。总之，历次政治运动就像宇宙“黑洞”，卷进去的不仅是千万冤屈受难者，也包括少数历史罪人。

根据四人帮的审判，可知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有 **34800** 人，而根据巨著《毛泽东的最后革命》的作者罗德里克和迈克尔预测，有 **150** 万人。

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工宣队进驻新沪中学，所谓的“工人阶级”开始走上教育领导舞台。那时的校长就是力车胎厂里的造反派头头，至于他们如何治校，那就更加不值得我在这里浪费笔墨了。

新沪中学的教室数量之多，在文化大革命中出过名的。七十年代，正值青、少年人口高峰期到来，中学入学人数猛增，为了容纳众多学生，长征中学并入新沪中学。教育局要求新沪中学大规模增加招生班级数目。于是，新沪中学也采用了其它中学一样的方法：上课班级是两班倒，一半班级的学生上“早班”，下午两点钟放学。另一半上“下午班”。于是，新沪中学一下子竟然扩充到 **108** 个教学班，学生人数达五千多人。这也是中国式的革新。当时有人戏称，新沪中学成了“远东最大的中学”，此言并不为过，可见当年新沪中学的教室数量之多。

直至我在 **1977** 年回校任教高三物理时，单单七七届高三年级就有十八个班级（全部安排在新沪中学分部的一幢三层大楼内，即后来的宝安路小学。）。由于文革后，教育局早就取消了入学考试，完全按街道划块分配，学生的文化基础相差极为悬殊，以至于高中毕业考试竟有三分之一内容是考小学知识，其中有一道数学填空题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中国人口有 **6** 亿，**6** 后面有（ ）个 **0**。”

由于 40% 的学生来自像东交通路、梧州路一带的棚户区，从小就不会说上海话。有几个班主任为了便于与同学平时交流，练就了一口字正腔圆的苏北话。尤其是**杨其杰、吴忠民、刘寿保**老师，在办公室里经常教那些一点儿也不懂苏北话的男女老师，他们的“业余培训”既生动又幽默，常常引得老师们捧腹大笑，可他们自己一点不笑，标准的冷面逗哏。由于我们这些年轻教师接受能力比较强。所以，至今我模仿苏北话依然 **NNOU**。尤其是十八班（双差生班）学生是清一色的苏北话，老师上课必须用苏北普通话授课，否则学生们会齐声大叫：“听不懂！”教室里满墙的痰迹、足球印和涂鸦，这个班的班主任、各位任课老师都是治班能人，班主任挑选班长不得不启用“道行很深”的江湖掌门人，否则根本“镇”不住十八班的英雄好汉们。我这里毫无褒贬苏北人的意思，但这确实是真实历史的重述。

文化大革命后，1977 年恢复高考制度。当时极为风行的一套七、八本的《**数理化自学丛书**》，言简意赅，深入浅出，例题、难题的解释详尽，极易自学速成。被当时老三届和应届高中生毕业生奉为高考复习的“圣经”，而且市面上此书经常脱销。甚至连当时“参考消息”报的欧美报道中，都有对这套优秀丛书的特色加以赞扬的评论。当时，老教师关锡鸿指着该书的编委名单，如数家珍地一一告诉我，其中有六、七位都是反右前后出自新沪中学的名师。后来都成为外地及上海各大学的教授或学科专家。

八十年代，由于新沪中学地处四平路、溧阳路口的黄金地段，成为地产商馋涎欲滴的一块肥肉。1985 年，虹口区政府出于经济利益考虑，声称新沪中学校址将用于“外商开发”，教育局一帮领导浩浩荡荡开到新沪作大会宣布，指令新沪中学尽快搬迁。退休的老教师闻讯后，有的甚至潸然泪下，他们几次联名申诉教育局未果。

期间，即将退休的虹口区人大主任 **Lu** 女士为了新沪中学这块土地的买卖洽谈、频频往来于香港、新加坡之间三、四次。（八十年代，能够出一次国那可是风光无限的美差。尤其是按当时出国条例，每次能够免税带回一、两件外国大型电器，如电视机、冰箱等。而国内当时是要凭大量外汇券供应的，不但价极为格昂贵，还得要通“路子”。）但旧校址地产买卖几度落空，多次搁置或易手，一会儿听说是卖给新加坡地产商，一会儿又说与法国人谈判。十几幢楼已经统统拆光了，地基也挖了，可是造房却遥遥无期。大片空地闲置长达近十年之久，成为超级的“烂尾工程”。老新沪旧址只见一片黄土荒

草以及一堆堆臭气熏天的垃圾山，还有几个深深的大面积深坑水窪，引得大量蚊虫滋生。夏天一到，周围居民（包括宝安路上我的家）晚上睡觉被叮得苦不堪言。我想，假如老新沪的地产属于私人所有，一拖就是十年，那么早就资金链断裂、不得不宣布破产了，而在中国却是司空见惯。我相信，这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丑闻在民主国家必然会遭到公众的弹劾、问责和追究。而在中国则司空见惯。教育局叫你搬就得搬，如果胆敢抗命，连校长也得撤职。



老新沪在拆除过程中，人们发现，中大楼、南大楼一楼地板下的通风夹层在日本人建造时曾经不惜工本地使用了大量十几米长、横截面大如月饼盒的优质进口美国红松，（我亲眼所见）而且二十多年来木料一点也没有变形，木质几乎完好如初。拆房承包商因此而大发横财。更不用说几棵非常值钱的高达几层楼的广玉兰树、雪松等至今无人知晓其下落。据说，单单是承包拆除中大楼和南大楼的楼梯铜嵌条的个体商人几个月内就一下子成了“万元户”。请读者注意，那时上海的人均月工资不到百元，八十年代初的“万元户”，那可是暴富的代名词啊。

遥遥十年之后，新沪中学旧址才终于建成所谓的“喜临门”大酒家以及周围的豪宅。（见照片：“喜临门”大酒家。摄于2008年。）至今，许多新沪老教师每次经过此地都唏嘘不已。有时我晚上经过此地，只见夜色中这座几十层楼大酒家的客房灯火寥若晨星。显然，该酒家的客房入住率不到5%，经济效益可想而知。名校老新沪在地球上消失了，只留下这座高耸的建筑物宛如老新沪的墓碑一样凄然屹立在溧阳路口、四平路口上。国外有问责制，但老新沪的房地产买卖的不透明内幕却被长期“和谐”了。我坚信，历史总有一天会还原老新沪易址时地产买卖的真相。

自从1985年新沪中学高中部搬迁至延风中学旧址，在地处四平路桥下的天宝路“下只角”局促之地苟延残喘。（仅10亩地，而且处于棚户区包围之中。）改名为“新沪高

级中学”。初中部被解散，许多骨干教师如**王频**、**熊圆明**、**李梦麟**、**吴忠民**、**周建勋**等统统被分配或自谋出路到四川、广灵、长风、溧阳等几所初级中学。

新沪中学在虹口区居民视野中已经消失，甚至许多市民误以为新沪中学已经解散，就是知道的人也认为新沪中学是一所棚户区中学。不言而喻，以后新沪中学的高一入学的招生分数线自然是一落千丈，学生质量也今非昔比。自此进入“第三世界”。

1988 年，教育局作为安抚，新沪中学高中部又奉命第二次搬迁。从天宝路搬到地处虹口区东北角、当时相当偏远的密云路 481 号，（见照片）占地也仅十八亩。而且新校舍的设计原来是打算建造一所初中校舍的构造，根本不是为补偿新沪中学而造的。所以教室既少又小、没有大礼堂，操场面积又小。（由于教学活动难以展开，后来又建造了一座四层楼的大楼。）至于高考升学率始终在 15%到 20%之间的低谷徘徊。然而，新沪中学在九十年代作为市级“依法治校”示范性学校的美名却在虹口区校长中却被传为笑柄。



校长**杨明楷**（见照片）担纲

下，由于他不媚上、务实，又采取重奖高考教绩优秀的教师等一系列措施，新沪中学高考升学率明显上升，连续四、五年达到 90%以上的高考升学率。（其中本科生接近 40%）能把基础一般、能力平平的学生教到这个水平，这真是连内行人也看不懂的变化。搞教育的人都明白，这类学校的脱颖，全体高中教师化出的巨大心血和精力、时间远远大于那些重点中学的老师。记得九十年代几次上海市物理竞赛决赛，我辅导的学生获得市二、三等奖的有八、九名，还有一名获得一等奖。2005 年，虹口区高考模拟考，我执教的高三

（8）班的物理平均分超过两个区重点学校，使区物理教研员大为惊讶，坚持要我上台介

绍教学经验。（关于我的教育生涯将在第二卷“从教篇”中叙述。）

然而，新沪中学高考教绩的最后几年“振兴”犹如人之将死前的回光返照。最后几年，后台很硬的新党支部书记上任了，她是一位 74 届初中生，与虹口区教育局最高层人物是同学。插队落户回沪后由居委会干部经过短期培训，提拔上来成为政工干部。（而且九十年代居然还被上面提拔为“高级政工师”）每次我和她一起听课、评课时，我惊讶地发现，她对高中课程，尤其对数理化的基本常识和概念居然一窍不通。

由于她和一群不学无术的政治“幕僚”们旷日持久的折腾、上告、与校长的多次正面冲突后，（主要罪名是校长杨明棣竭力排斥党的领导）校长责任制的一元化领导摇摇欲坠。教育局最后庄严决定，一了百了，新沪中学解散，并入钟山中学。原校长、党支部书记调出新沪中学，另行安排。2008 年，新沪中学终于“被自杀了”。



面对新沪中学的再次沉沦，在学校拆并之前半年，我几乎是绝望地离开了几十年不舍得离开母校，被聘请到占地 180 亩的上海外国语实验中学任教高中物理。当时胡锦涛的弟弟、复兴中学刚退休的校长**胡锦涛星**担任该校校长。尽管

学校设施相当现代化而且又是享受高薪，董事长和校长也极为器重我，学生们又特别喜欢我的物理课。但我依然牵挂着母校的命运，遥闻着它临终前的呻吟。（如图：我虽然沉浸在上外实验中学学生的爱戴之中，但难以忘却对老新沪临终的哀思。）

半年后，新沪中学有将近一半教师面临自谋出路、被动员待退休或“规劝”转校，剩下的教师统统并入比新沪中学规模更小、教师人数更少的钟山中学，沦为“亡校奴”，真所谓小鱼吃大鱼。同年，移交校产，我校依然有不少珍品尚存。除了一大批如“四库

全书”之类的珍贵典籍、图书和大量仪器之外，余下的许多陈旧的书籍、画册统统堆积在两间教室的地板上。钟山中学领导决定，任人选购，一律五毛一本，捷足先登者收获颇丰，一些非常具有收藏价值的古书、画册、书法拓本、辞典等等被抢购一空。听说，其中有一本陈旧的摄影画册，内容都是解放初期镇压反革命、公审枪毙地主的现场照片集，被一位独具慧眼的老师买走。据我估计，这种极其罕见的史料在古董市场上转手肯定能卖上几千元。听说还有一具珍贵的金丝猴标本有些霉变，可那无知的钟山中学校长陆某某在接收新沪中学“遗产”时居然打算扔掉。这真是：“崽卖爷田不心疼”。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新沪中学终于悄无声息地无疾而终了。

一所学校就像巨轮，要建造好这艘船，不知道需要花费多么巨大的财力、物力、精力和漫长的岁月，而且还必须有一位深得人心、善于掌舵的好船长，才能绕开暗礁、乘风破浪。可惜，在新沪中学的历史上能够留下浓墨重彩的好校长屈指可数。但是，要让这艘“泰坦尼克号”迅速沉没却易如反掌。罪孽啊，你们毁掉的是几代人的心血。



在中国，历次运动打击的对象多半是知识分子。实际上，解放后所谓的“地、富、反、坏”基本上属于“死老虎”，早已不可能积聚任何有效的政治力量。而具有独立思考、判断能力的知识分子阶层则成为执行独裁统治的最大障碍。反右运动实际上是一种欲擒故纵的政治陷阱。那时“引蛇出洞”策略的受害者多半是那些敢于仗义执言、底气十足的知识分子精英人物。从此以后，中国的科学界、艺术界、思想界折戟沉舸，万马齐喑，噤若寒蝉。政治上扫除了一切阻力，于是，“莺歌燕舞”、气象万千。领袖一声号召，全民人人响应。种种荒诞不经的所谓大跃进、大炼“钢铁”、文化大革命等等政治运动得以通行无阻地大行其道。有非议者无异于螳臂挡车，自取灭亡。据说，我一向崇敬的中国鼎鼎有名的留美大物理家钱某某在大跃进中也曾经从光合作用利用率 20%的“科学角度”论证过：不要说亩产粮万斤，即使两万斤也是完全可行的。呜呼，指鹿为马已经成为群体思维，还有什么事是不可思议的呢。

至于文化大革命更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惨绝人寰的浩劫，红色恐怖把中国大地变成一片暴力的屠场、文化的沙漠、经济的沼泽，文化革命是历次破坏性政治运动的登

峰造极之作。正如当时政治宣传机器反复鼓吹的那句名断言：“要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社会的剧烈动荡日复一日，它带给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苦难罄竹难书。凡是经历过这场“大革命”的人，无论是受迫害的人或者曾经迫害过别人、自己也终于受到迫害的人都终身不会忘记这整整十个年头的岁月。它的严重后遗症至今没有得到清算和消除，而拥有公器力的人希望中国人永远忘却这段记忆。尤其是中学历史教科书，历届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叙述基本上是一笔带过。文艺界及媒体、互联网只谈“辉煌的六十年”，至于“总结中国历次政治运动的历史责任”被刻意边缘化，成为忌讳的敏感词，否则将被和谐、被屏蔽、删除或封杀。

政治运动的绝活是折腾、整人、再折腾、再整人，表面上是意识形态斗争、路线斗争，归根结底都是一个单词——权位。为了“权”，可以视友为敌、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可以睁着眼睛说瞎话、可以以神圣的名义残暴。甚至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动用一切非法的手段，哪怕三千万中国人活活饿死，哪怕国民经济濒临彻底崩溃的边缘也在所不惜。老新沪中学的两次搬迁，最后因为政治原因而“自尽”。它由盛而衰亡的历史在中国仅仅是沧海一粟而已。

我是目前唯一在新沪中学就学和从教长达四十余年的目击者，亲睹了母校的兴衰存亡。披露新沪中学的辉煌和劫难，申诉已经亡故的和依然健在的恩师们所受的冤屈，真实地的还原这段史实，这是我多年来的夙愿。网上的校友们同情地哀叹我是“母校的守墓人”，他们感谢我在做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不过我觉得，自己正在努力做的是别人无法做而我能够胜任的事。当历史回归真实时，无数平头百姓的亲身经历、回忆和民间大量的统计资料就会把颠倒的历史还原成原来的真正模样，那些企图掩盖真相的人将成为历史罪人。但正如哈姆雷特所说的：“事实总会升起到人们的面前，即使用全世界的泥土压住它也是枉然。”

一个民族要进步、要振兴、要获得世界的尊重，回避或掩盖历史、让下一代根本不知道近代史上血的教训终究是徒劳的、卑劣的，而且也是极端愚蠢的。

回忆录说了一些真话，罗列了一些事件，但意犹未尽。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有的话现在不能说，只能点到为止。这不是胆怯，而是假如被封杀后就什么也不能说了。

鲁迅先生说过：“世间实在还有写不进小说的人物。倘写进去而又逼真，这小说便被

破坏。譬如画家，他画蛇、画龟，画果子壳，画字纸篓，画垃圾，但没有谁会画癞头疮，画鼻涕，画大便的，就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本文不屑于描画那些新沪中学历史上的那些无耻的政客和小人，如反右运动中的 YING 氏兄妹等一帮政治弄臣、文化大革命中此起彼伏的无数“英雄豪杰”、以及新沪中学最后临终几年里上下折腾、唯恐天下不乱的一批跳梁小丑，道理如上所述。

歷任 校長



覃 英



李 興 民



陸 鼎 豐



施 綬 秋



戴 寶 森



張 幼 圃



鄔 顯 良

以上是新沪中学 40 年校庆时发布的历任校长的照片，不包括创始人黄树滋校长和末任校长杨明棣先生。当然，也不包括文革中的那批“革委会主任”们和所谓的校长。

(回忆年代：1963-----1977 年)

一. “沙龙”轶事

高中时代，在我们六六届（一）班，同学程本宁的家是我们男同学常常光顾的“社交中心”。也是我们这群青年人思想启蒙、发酵的“沙龙”。

他的家住在多伦路一条僻静曲折的胡同里，日本式的两层楼，独门独院。他的母亲和姐姐凯蒂对我们许多同学都非常好客，他的广东籍母亲非常慈祥。虽然她一句上海话也不会讲，也听不懂我们说的是什么，但老人家总是端坐在客厅沙发上，笑眯眯地瞅着我们手舞足蹈、高谈阔论。尤其是对我的不拘小节不但非常宽容，反而觉得饶有兴趣。

我最惭愧的一件事，就是我居然两次踩坏了他家客厅饭桌下面的两根横档。最终，使得他家的老饭桌摇摇欲坠。第一次是他家留我吃饭。饭间，我正在眉飞色舞地讲话，侃到精彩之时，脚下一踩，只听到“砰”地一声猛响，饭桌震动下面成十字交叉的一根横档被我踩断。当时，他的母亲和姐姐凯蒂非但没有表示丝毫惋惜之意。相反，朝着我哈哈大笑。使我大为谦疚：“啊呀，只剩一根了，对不起，对不起。”“mouguanhei, mouguahei!”他母亲却笑着用广东话对我安抚，我根本听不懂广东话，心里想多半是原谅我的话。第二次，大约是在他家举办同学聚餐，不知怎么神使鬼差的，我又一次把脚搁在他家饭桌下“硕果仅存”的一根横档上。这次，那根独木难支的横档就愈加强不禁风了，“啪嗒”一声，终于，我彻底地、历史性地制造了他家老饭桌几十年一遇的非自然性灾害。以后，每当我去造访程本宁家，总是不由自主地凝视那张依然屹立、身残志不残的老饭桌。

2008年某夏夜，我和勾文海逛马路，又特地去“瞻仰”了一次程本宁家故居，人去楼在，曲巷依旧。昏暗的路灯下，我们俩久久徘徊，“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

般滋味在心头”。回想四十多年前的学子时代，无限感慨。他的慈母如果能天国有知：看到我们这群沙龙好友今天依然亲密相处、活得滋润。老人家一定会感到欣喜。也使得我们这些大多数功成名就的后生堪以告慰前辈。

当时社会舆论闭塞、“左道”猖獗，纯粹是一片文化艺术的沙漠。在他家，我们一帮好友欣赏、谈论的都是与当时的政治潮流格格不入的中外艺术作品和“小资产阶级情调”，他的家人都能容忍、理解。而不是以避祸的小市民心态把我们拒之门外。文化革命中，这绝对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做到的。现在社会人心不古，能够这样好客而又能够以弘毅宽厚的态度理解下一代的家庭已为数不多。

由一群各有所长、志同道合的朋友自然形成的沙龙，如芝兰之室，同学之间彼此优势互补，具有良性循环的“混生林”效应。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然，我们对于那些才疏德薄之辈，是绝对排斥的。

二. 音乐启蒙-----文化沙漠年代

程本宁是我高中时代最好的朋友，也是使我最初受到系统西洋音乐启蒙的引路人。儿时，我的家庭兄姐众多，音乐气氛浓厚，但接触的多数是民歌和时尚音乐，如苏联歌曲、黄河大合唱、满江红、春江花月夜，如此而已。我也听过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舒曼的“梦幻曲”，不过从来没有产生过强烈的共鸣。

但是，与程本宁为友。我常常为他丰富的西洋音乐知识折服。虽然他的嗓音并不是特别出色。然而，当他给我介绍某首外国民歌时，每每具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感召力。受

他影响，我学会了许多欧美歌曲。记得最使我感动的是一首墨西哥民歌“燕子”，他对我吟唱着、半闭着眼、双手作流水状波动，他那种自我陶醉的样子我至今难忘：

“…我像你一样，到处流浪和飘荡。夏天的时光，依然明媚，但那充满幸福和回忆的地方，现在是一片寂寞、一片凄凉。

啊，什么时候我才能像你一样，在蓝色的天空唱着嘹亮的歌，在那天空自由地迎风飞翔，但命运



没有给我一双翅膀。”

歌曲旋律极其苍凉、委婉，诉尽人间辛酸。他那种唱歌的神情仿佛面对着情人、充满激情和魅力，使我既兴奋又仰慕不已：世界上居然有如此动听的民歌。

当时，他家的那两本“外国民歌 200 首”几乎被我们翻阅得破破烂烂。他的现身说法使我耳濡目染、迷恋上许多外国歌曲。同时，我也开始对经典的西洋音乐渐渐产生共鸣。当年，在他家我还听了不少世界名曲的唱片，（那时离 CD 碟片的出现还有二十多年）他仔细地介绍什么是主旋律、什么是和声、变奏、主题、序曲、以及各种乐器象征的角色。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鲍罗廷的交响诗“中亚西亚草原上”和亨德尔的“绿叶青葱”（慢板）。尤其是后一曲，正当文化大革命中狠批“封资修”的风声萧杀之际。

那天晚上在他家客厅，他的家人都纷纷上楼睡了。他脸带神秘地悄悄对我说：“让你听一张嘍唱片。”然后，把客厅里所有的两层窗帘都拉上，（因为他家客厅一面临街）他把沙发灯拧到最暗最暗，灯光几乎像萤火。于是，昏暗中，亨德尔的“慢板”开始深沉地悠悠升起，神圣而恢宏，充满客厅，余音绕樑不绝，使人回肠荡气。我们两人面对面，斜倚在沙发上，闭着眼静静地欣赏，我仿佛像喝醉了酒一样被彻底慑服了，深感灵魂的净化、肉体的升华…

后来才知道，就在多日前，程本宁的家人为了避免惹祸烧身，曾不得不在自家大门口当众焚毁了一大批唱片以示与资产阶级思想彻底决裂。（因为他家外国唱片数量之多，文革时在居委会里是挂上号的。）因此，那晚上请我欣赏唱片，程本宁是冒着相当大风险的。

程本宁吹得一手好口哨，尤其是高音部分，难度极大，接近专业水准，完全可以灌制唱片。即使年过花甲，他的吹奏水平依然完美动听，完全不受假牙的掣肘。

在成功人士的成长道路上，除了父母的启蒙。在青、少年时代，良师的点拨，益友们的滋润都功不可没。各位具有不同才能同窗、朋友的交替影响能够让你终生受益匪浅、没齿不忘。因为，相比于父母、良师，同龄人之间不存在代沟，更加容易受到高尚情操的熏陶、激发思想上的强烈共鸣。

在那个狼突豕奔的文化沙漠年代，西洋音乐的旋律对我们如同甘露一样，带来一种天堂般的宁静、洗涤我们的灵魂，体验真善美的境界。而在荒蛮的文革中，反反复复灌输的只有八个样板戏，无论电视台、电影院、工作单位里、甚至马路上到处是样板戏那种高亢而使人疲惫的轰鸣，令人大脑不得不被动地接受、挥之不去。偶尔有几部“社会

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的影片就使我们这些年轻人趋之若鹜，虽然内容还是革命、革命，但毕竟还有一丝欧洲音乐优美的旋律，使人聊补于无、依然陶醉不已。如“宁死不屈”“第八个是铜像”等一些阿尔巴尼亚影片和苏联的“列宁在 1918”，我们都不止看一遍。甚至连许多台词都能够背得出来。（三十年后才知道电影“列宁在 1918”和“列宁在十月”等等都是斯大林集团精心炮制的彻头彻尾的电影“秘史”。）



这张旧照片是我们 1968 年在街头为程本宁所摄，弥足珍贵。（图中是阿尔巴尼亚电影“创伤”的海报）在照片中程本宁那种失落、向往、无奈的情绪表现得那么真切，也正是我们这些同龄人当时内心感受的真实写照。它留下了四十年多前的难忘追思。

三. 师生轮回（忆艾华澄老师）

高中，教我们高二、高三数学的是艾华纯老师，五十多岁，前额高耸、金丝边眼镜后面一双瞪大的眼睛，俨然一副学者风度。他是一位从不发火、相当平和的老教师。凭心而论，他的水平不错。据我以后所知，他是施绉秋校长器重的老教师之一，就是年纪大了点，略现木讷，即时反应迟钝。我是他的几何课代表。（按当时惯例，数学分立两部分，几何和代数。所以每班设有两名数学课代表，我分管“立体几何、解析几何”富双印同学分管“代数”。）这是我高中时代唯一做过的算不上干部的“干部”。

1963 年，由于经过初三毕业时十二个班级筛选，缩编为三个高一班级。我们高一的

学生群英荟萃，是新沪中学将来高考脱颖而出的希望。而程本宁是我们班级学习成绩总分遥遥领先的领军人物，除了作文他和我相差一大截，我们俩的俄文都傲视群雄。至于程本宁的数理化成绩都胜我一筹，我只得甘拜下风，总分屈居前五、六名之列。只记得我的最高名次是在高二上学期，曾经达到班级总分第三名，那是我高中学习上崭露头角之时，自以为可以腾云驾雾一番，但依然只能望程本宁之项背。

程本宁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和敏锐度总是比我们快一拍。他酷爱数学，而且特别勤奋用功。他有一个很好的学习习惯，就是注重预习，而且课外阅读了许多数学参考书，这是他步步领先的关键。记得高三的一堂数学课，艾老师在黑板上推演一道数学题，也许是由于他备课不周，艾老师的解题发生了逻辑错误。全班同学除了数学尖子张华（化名，以避嫌。）和程本宁，竟然没有任何人发现黑板上的问题。张华比较圆滑，自己不出面，却回头频频向程本宁示意，“挑他上山”。当时我不懂内中蹊跷，只是觉得他们两人有点古怪。突然，程本宁举手要求发言，他站起来，手里拿着一张早已演算好步骤的纸片，对着黑板指指点点，说明演算推理有问题。由于他的论据明确，解题又简洁，部分数学基础好的同学一听就懂。顿时，教室里一片寂静，出于尊重，对老师的出错同学们谁也不敢笑，课堂场面处于一种物理上的“临界状态”，只见艾老师站在讲台上瞪大眼睛、呆如木鸡，极其尴尬，足足有十秒钟说不出话来，我心头顿生一种恻隐之心，觉得老人家那副样子真是太可怜了。只有张华埋着头吃吃地笑。从后，不知哪个多事之徒给艾老师起了一个缺德的绰号“艾不楞登”。（上海话：有“呆头呆脑”之意）

四人帮打倒之后，艾老师曾经执教于复兴中学。不久，突然死于脑溢血。

我回到母校从教后，晚上同时应聘兼职虹口区职工余夜校的高三物理教师。（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薪酬是七毛钱一节课。而当时最好的大闸蟹是每斤一元二。）七十年代末，那时候百废待兴，社会上读书成风，业余夜校如雨后春笋、生意兴隆。而夜校学生基本上都是在职的老三届，甚至还有比我年纪更大的学生。正巧他的女儿艾国棣（六六届初三毕业生）是我执教班级的学生，她非常诚服我的教学能力。于是，她多次恳切请求我，对她就读于师大附中高三的女儿物理高考进行家教个别辅导。于是，我又成了艾老师以下两代人的老师。这真是师生缘分的一段轮回。

凭心而论，艾老师的数学教根底是无可厚非的，伶牙俐齿的老师未必都是优秀教师。可悲在于他年纪大、反应比较迟钝，又遇到一个高材生，而且不留情面让他当场出彩，算是他的劫数。

自从我当了高中教师后才理解，哪怕再优秀的良师，也总有几次出错的时候。从教后，我本人也经历过一次类似的场面，我的反应就是向全体深表歉意，同时表扬那位敢于批评的同学“青出于蓝”。并当众许诺，今后如果谁发现我的错误，可以不举手，站起来当场指正，我将视为一种追求真理的表现。于是，课堂效果迥异，不但学生诚服，而且体现了教学民主，同时对于我警示自己努力提高物理教学业务能力、督促自己认真仔细备课具有强烈的促进作用。

四. 金之光

程本宁既是一个极为外向的人，性格开朗。但也有他讳莫如深的一面。比如，他从不向我们任何人吐露他的家史，但我们都隐约感到他的家族曾经有过烜赫的过去。在读高中语文课文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时，他私下告诉我，他父亲曾经是司徒雷登的好朋友。（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载于毛选第四卷。司徒雷登，解放前最后一任驻中国的美国大使、著名的“中国通”教授。现在才知道，在闻一多的名篇“最后一次演讲”中曾高度评价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他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可是，在我们当时初中语文教科书上闻一多的《最后一次演讲》的课文中，这句话赞扬司徒雷登的话被教育部门全部删去。



【注】司徒雷登（1876-1962）基督教徒。（图为司徒雷登在1946年任美国驻华大使之前在燕京大学燕园留影）

他作为燕京大学首任校长、校务长和学者，本人朴素到甚至衣服打补丁还在穿，但对中国爱得那么痴情，他从海外募捐资金帮助几十个上不起学的穷孩子。他用了不到10年时间，便把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烂摊子，办成一所闻名世界的综合性大学，获得哈佛大学的认可。他提倡学术自由，广罗人才、（邀请了周作人、张东荪、冯友兰、俞平伯、谢冰心、钱穆、顾颉刚、钱玄同、埃德加·斯诺等担任燕京大学教师。）同时，辛勤地从国内外多方筹措捐赠，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解放后作为教会大学的燕京大学解散，校址成为现在的北大的一部分。晚年，这位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姓的老人家常常悲伤地望着中国的方向，哪怕这个国家如

此故意地误解他、甚至恶毒地伤害他，他依然身在美国、内心却期望着自己的遗骨葬回他深爱的燕京大学原址。近年，浙江电视4集大型人文纪录片《司徒雷登先生》一经播出，引起社会轰动。才使人们认识了别样的司徒雷登。几经波折，2008年11月，司徒雷登骨灰安葬在杭州半山安贤陵园文星苑，但仍然没有满足他的最后“遗愿”-----安葬在原燕京大学的未名湖畔。

而在我当时高中语文课文《别了，司徒雷登》中司徒雷登却被毛讥讽为“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被定型为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分子。

程本宁家客厅中央挂着他父亲遗像，可是，他对自己的父亲从来讳莫如深、只字不提。从他开始练书法时，我才知道他的舅公**李天马**是当时上海的知名书法家。1967年的一天，他悄悄地告诉我，他在美国的四舅**李卓皓**（生物学家）因为在世界上第一个合成人工激素，当年获得拉斯卡最高国际医学奖。至于程本宁的老母亲，举止端庄得体，一眼就看得出是大户人家出身。我们对她家庭的了解不过如此而已。

金之光是他的外甥，从小就寄养在他家。我们念高中时，他刚进初一。这是一个天资聪慧又讨人喜欢的孩子，身材修长，少年英俊，性格文静。在一个非常和谐的家庭里，对金之光气质的养成是一个极好的环境，也完全弥补了他从小失去父母之爱的空白，这也是他的福分。他的外祖母、阿姨凯迪都极为疼爱他，但他从不任性。他的舅舅程本宁对他文化素质的熏陶和学习指导，是他一生成长道路上不可或缺的催化剂。所以，他对舅舅非常佩服和亲近。

金之光手很巧，常常看到他在桌上静静地拨弄一些诸如半导体的小制作。每次我们一帮同窗朋友来访，金之光总是笑咪咪、非常有礼貌地对我们以“叔叔”称呼，然后干他自己的事。当我们谈锋正浓、妙语连珠时，他也会抬起头来哈哈大笑。但从不插嘴，很有教养。

金之光的寄养之谜，我是在二十年后才从侧面知道点滴的。金之光的母亲，也就是程本宁的大姐姐，解放前是个绝色的社交名流。解放后因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入狱。近日，程本宁才把他大姐姐的旧照片给我看，依我评价，长相与老演员王丹凤属于同一类型，但是没有王丹凤那种妖艳。金之光的父亲是静安寺有名的“百乐门”爵士乐队的创始人，金之光的祖父是国民党中将。听毕，我建议是否能把他大姐姐的旧照片拷贝附入本文，程本宁黯然地拒绝了。

文化大革命后，金之光回到昆明，后来又考取大学，攻读化学系，以后情况不详。

当我有一次突然想起而询问程本宁：金之光现在近况如何？程本宁说，金之光现在澳大利亚工作。去年，程本宁去澳大利亚旅游，曾去看望过他。他混得相当不错，从事大宾馆的高管工作，还有一幢私人豪宅。（以金之光从小的气质和智慧，丝毫不出乎我的意料。）说罢，程本宁摇头叹息、感慨万端。我理解他内心的百感交集，毕竟，他们的舅甥关系非同一般。往事不堪回首。人生是一种上帝安排的机遇，亲情是一种难以割舍的纽带。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不用说程本宁，即便是我们，对金之光也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怀旧情愫。

时间的磨砺把无数人的珍贵记忆埋葬在遗忘的长河里。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往往容易忘记许多琐事、许多隐痛、许多感悟。但这些琐事值得品味，弥足珍贵，是我们人生中不可或缺的财富。这也是我决心把这篇回忆文章继续写下去的动力。

五. “娘子” -----成功处世的启示



高中时，程本宁身高一米八二。在那个食物匮乏、青年人多数营养不良的年代，男同学身高大多低于一米七五，他的身材海拔属于姚明级别。正面看，他脸颊瘦长，侧面看，他脑袋前后尺寸很大。如果以脑容量来衡量，在灵长目中，无疑，他所具有的高智商是经得起考古生物学家推敲的。当我们都发育不良、乳毛未曾脱尽时，程本宁唇下和下巴上的胡子早已茂盛异常，下巴颏两天不刮，就草皮丛生。由于其长相特别、肤色又像阿拉伯人，被我戏称“苏丹王子”。在我们男同学中间，他和李兆钟的外貌都显得比较老成。不到二十岁就像个小爸爸。（左图：程本宁高中毕业照，是年十九岁。）

1964年，奉贤下乡劳动一群中年村姑围着我们唠嗑闲谈，问起我们几岁。我们让她们猜，我们中间谁的年龄最大，她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肯定是程本宁，其中一个村姑还特别好奇地问程本宁：“侬能度格（你这么大）年龄还来下乡劳动，侬娘子阿要（是否）想侬？”话音未落，大家哈哈大笑、乐不可支。

其实，程本宁在待人处世上也的确比我们“开化”得早。即使至今，他依然比我们这些性情中人的老朋友们成熟得多。他的情商极高，其涵养和我们绝对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他善于交际，极易与人相处，但是又非常注意分寸。交际圈内他善于“弹钢琴”，

比如有许多新老朋友同时在场，他不仅不会冷落任何一个人，而会选择“扬长避短”的话题跟你聊天。他的知识面广，但他绝对不会和一个五音不全的朋友谈论肖邦而使他难堪。而在一个体育爱好者面前，他却会把姚明分析得丝丝入扣、双方都会感到沟通顺畅，以至于使对方大有相见恨晚之情。

老朋友有难，他能够不计个人安危地伸出慷慨之手。但当朋友中间出现重大分歧或矛盾时，他却又往往退避三舍或保持沉默，绝对不轻易表态。他这种“和为贵”和“不该介入的坚决不介入”的处世哲学，使得他的朋友众多，一些女同学都与他合得来，甚至到他家做客。（当时社会习惯，男女同学一般是从不到对方家做客的。）

读书时，老师喜欢他，工作后，领导器重他。从不与人结仇而又有真才实学的他自然仕途一帆风顺。七十年代《解放日报》甚至头版头条都刊登过长篇报道程本宁的优秀事迹。他是个天生当干部的料，而且最适合当第二、三把手。因为他善于沟通、懂得退让、从不过激而又性格开朗。局外人嫉妒他，觉得他左右逢源、八面玲珑。其实，他绝非那种奉迎圆滑之辈。我认为，这就是一种我们大多数人都都不具备的终极修养。当然，这既有他的遗传基因又有后天的磨练。

好人与坏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是否会算计他人，好朋友与坏朋友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是否自私。但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生存方式和做人准则，无可厚非。

仅凭两件事就可以说明程本宁的为人：第一个例子，**李建中**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李是程本宁的初中同学，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在李建中精神上最难受时，他硬是邀请李去他家吃饭、过春节。李建中被打成“反动学生”后，在同学中被揭发、绝对孤立。程本宁是依然与他来往的仅有的两个同学之一，并且在精神上给他带来真挚的慰藉。包



括程本宁的家人，对李也是不避“嫌疑”，不怕受牵连，如同家人般对待他。李建中现在深情地回忆说：“当时，和程本宁及其家人交往使我感觉自己是个大写的人，而不是低人一等的牛（牛鬼蛇神）。”第二个例子，文化革命中，被错误地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大江越狱逃亡途中邂逅程本宁，他非但不躲避他。相反，他冒着协助逃犯罪名的危险、慷慨地掏出身上所有的钱和粮票接济并非老朋友的大江。（后面十二章“传奇”中我将详述。）

至此，对程本宁的评价完全可以说未盖棺而论定了。

说到人的长相，当时我曾经戏言：当我们都是老头子时，程本宁、李兆钟俩人未必比我们更加老态。今天的事实验证了我的“先知”。他们与当年相比，其实变化并不是非常大。参照牛顿第二定律，其演变的加速度似乎远小于我们中的许多人。翻阅同学的旧照片，当年的我、勾文海和宋谷春的脸相，比起程本宁、李兆钟那可“稚嫩”得多啦。可如今自己照照镜子，简直是惨不忍睹。（图中：时隔43年，看看我们的头狼——程本宁。）在老同窗的旅游中，他穿得红肥绿瘦，是一个什么事儿都满不在乎的乐天派。在我们朋友中，笑声最响、频率最高、感染力最大依然是他。

当年号称“拉链包”的大腹客程本宁，今天雄风依旧。旅游时，他能够一顿用餐连汤带水吃四小碗饭，廉颇不老，尚能饭矣。目前，在我们中间，他是个人生活安排最科学，心理、身体最健康的“常委”。

退休后，他每天听三小时欧美古典和现代音乐，然后骑自行车往返于莘庄与徐家汇之间锻炼一小时。每次聚会，他从徐家汇“横渡”大半个市区到虹口区，却从来不乘地铁，总是骑一部“老坦克”（上海人对破旧的自行车的称谓，实惠的上海人一般不爱骑新车，怕被偷掉后引起不必要的无奈。）先到虹口区的碟片市场兜一圈，“淘淘”音乐碟片，会会音乐发烧友，然后姗姗赴约。

想当年，他体质较差、肺结核、肾下垂，整天腰上带着“肾托”腰带，当时被我戏称“腰缠万贯”。鉴于他的疾患，高中期间他是被学校允许免修体育课的。

六. 拿破仑

陈万程，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高头大马，体格健壮，为人随和，乐于助人。本质上是个热心热肠、又相当合群的大好人。他的唯一缺点就是喜欢“扎台型”。（上海俗语：喜欢自我表现或故意显摆之意）工作后，八十年代，他当上了手握大权的大公司百货供销社供货员-----一个朝南坐的位子，他常常会把老同学请到家里，用拇指翘翘，指着大橱顶上一排排高级香烟，自豪地说：“你看，这都是客户送给我的，我是一支也不抽的。”言外之意，他的地位如何受人追捧。

高中时，他的体育成绩优秀，田径、球类样样出色，下乡劳动中他是重体力劳动力，但他的其他学科成绩平平。那时我、程本宁和他的座位都在教室后面两排。但学习上他常常喜欢不懂装懂。

一天，俄文课，老师介绍一篇新课文，指着一个俄文新单词“Неаполь”（那波里，即那不勒斯），问道：“谁知道这个单词的意思？”当时绝大多数同学是不知道的。但我和程本宁都知道这是一个意大利著名的港口，（而且我们俩会唱著名的意大利歌曲“那波里之歌”。）我轻声嘟哝了一声“拿破仑”，故意引诱陈万程上钩，而且我马上向程本宁使了个眼色。“对格，拿破仑。”程本宁马上心领神会地轻声附和道。陈万程吃准我们两人都是俄文尖子，肯定双保险。说是迟，那是快，陈万程马上举手，腾地一下站起来：“拿破仑！”于是，全班一片哗然。“坐下，坐下。”老师摆摆手。他的回答使俄文老师大失所望而又啼笑皆非。

拾人牙慧者鉴。

上述是我们对他仅有的一次恶作剧。凭心而论，陈万程本质憨厚，为人极其热心。虽然体格异常“伟岸”，但从不欺负和作弄弱小同学，所以在同学中人缘相当好。记得那年，我在崇明插队落户，突然病倒，一天半夜里我无力下床上户外的茅房，他从梦中被我的呻吟声惊醒，马上一骨碌就从被窝里爬起来，背上我就去茅房如厕。那时已经是深秋，在农村，夜里很冷，他还穿着短裤。可见其人相当真诚厚道。现在回忆起作弄他这事，虽然已是隔年老皇历了，但依然觉得十分愧疚，尽管那时年轻、又好胡闹。

六十年代，陈万程的母亲是个乐呵呵的胖妇人，一位居委会小干部。类似于电视剧里忙忙碌碌的马大嫂式的热心公益活动的人物。（文化大革命时，由于是“资产阶级分子”身份，不能再担任里弄干部了。）依我看，他的乐于助人的为人和遗传基因多半来自于他的母亲。

七. “巧克力” -----奋斗与机遇

巧克力，这是我们同窗好友陈荣彪的绰号，他内向寡言，韬光养晦，对同学彬彬有礼，成绩中上，并不冒尖。不过后来文化革命几年中，他攻读英文的记忆力之超群和极其刻苦的精神令我们对他刮目相看。

他的父亲是当时国内泌尿外科领域里著名的“四把刀”之一。（国内号称“三陈一马”）不过，他父亲的心脏病严重，每次我们去他家总是蹑手蹑脚的，不敢大声说话。只是，桌子上原版的图文并茂的最新美国医学杂志，往往是我们特别好奇的东西。尤其在文化革命中，居然能够允许让他父亲个人订阅外国刊物，可见他父亲的医学地位。

他父辈兄弟三人皆为医生，而且都名气不小。他曾经非常坦率地告诉我们，他的父辈

三兄弟并不聪明，但都是极其勤奋，还加上机遇都好。他的大伯伯在医科大学刚刚毕业时，正逢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军队里外科医生奇缺，他就被日本人抓去，到战地军医所主刀动手术。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医科大学生，他毫无临床手术经验。他伯父说，由于日本兵负伤极多，他给日本伤兵开刀就只能当作解剖牲口一样，一天十几个，从不考虑死活。当然，日本军官也是外行，完全听他的。几个月下来，使得他的开刀手法变得如同庖丁解牛一般炉火纯青，以至于后来成为外科名医。须知，无论是解放前后，按大医院历来的等级制度，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只能干递递手术刀、钳的活，想要主刀做手术，不吃八、九年萝卜干，根本没有任何机会，这就是机遇。他的另一个伯父是上海 411 医院眼科专家，军衔大校。解放前，有一种眼病，没有任何医生能够治愈。他伯父突发奇想，试验把牛奶打入眼内，竟然产生意想不到的疗效，从此一炮打响，名声大振。（由于我当时是立志学医的，所以对此印象特深。）

他的父母与他在美国的伯父母是两家三兄弟与三姊妹配对婚姻中的两对。事有巧合，1967 年，他的父亲因心脏病长期服用巴比妥类药物，导致肝功能衰竭，才五十多岁就去世了，而此时他的伯父也正好鳏居多年。于是，他的母亲决定改嫁伯父。此事费尽周折，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谈何容易。他的母亲多次去上海市公安局申请出国，公安局有关部门对她的回答非常干脆：“这个事你想也不要想。”

由于他的伯父在美国上层很有名望和地位。为此，他伯父在美国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事情真相，谴责我国违反人道，引起社会反响。当时外交部长 JPF 也态度强硬，依然压住不放。自然，公安部门也长达几年不批准他母亲出境。

爱德华·肯尼迪来华，曾经对周恩来提起此事，周恩来指令 JPF 放人，他母亲方得到出国批准。于是，陈荣彪作为亲子，两年后也获准赴美。期间，原来在中学读俄语的陈荣彪闭门夙夜苦读。他的英语从零开始突飞猛进，每天竟然能够背出并且记住四十多个英文单词，令人咋舌。

作为与我们的老朋友，他去美国后，竟然从此石牛入海，与我们完全断绝了音讯。即使改革开放之后，和他最要好的陈利华，也没有收到他的任何来信。八十年代末，我班的同学刘大为（历任华师大、复旦教授）赴美国访问，偶尔打听到陈荣彪的下落。我们才间接地知道，他早已取得美国医生执照，称子承父业。

据说，在美国，能够取得正式医生执照比考博士还难。我的朋友告诉我，他的一位大

学同学去美国，居然花了八年时间才考出牙医的执照。而且美国医生执照不是终身制，即使发生不大的医疗事故就会被吊销执照，还要面临没完没了的法律诉讼。更不要说“医商勾结”，简直是大逆不道，会弄得身败名裂、倾家荡产。而在中国，医商互相“挂靠”却是人人皆知、见怪不怪的社会常态。

作为和我们“七常委”朝夕相处、相濡以沫的“巧克力”陈荣彪，竟会与我们断绝往来，这使我们简直难以理解。况且，大家现在都已年过花甲，哪怕他有千条无法启齿的理由，几十年的同窗重叙旧谊，毕竟是人之情。相反，我们聚会时，倒是常常提起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我们一直无法理解他的心态。

最近，由于我们高中班级一位女同学在美国亲戚的偶尔原因，我们与他取得了联系，当时正好同窗聚会，大家和他通了长达半个多小时的长途电话。知道他在美国的处境并非相当如意，甚至觉得还是中国好，估计他没有顺利融入美国社会，所以感到很孤寂，很想退休后回国。

【注】所谓七常委，是我们班各项活动的核心人物。也是我们同窗老朋友的几年来的自我戏称。包括程本宁、勾文海、陶仲林、我、李兆钟、陈利华、宋谷春七人，凡是聚会、旅游等等大事，常委半数通不过，这事就被否决了。以下旧片：1967年摄于程本宁家。左起：“巧克力”、“拿破仑”、勾文海、陈利华、程本宁、我。



八. 顽童勾文海与“厚黑学”

勾文海，我的高中同学，也是我好朋友之一。绰号“勾太”，此雅号来自于他的初中时代，由于年代久远，无从考证其源头。不过，他给我们班级中众多同学所起的绰号则不胜枚举，如“玛丽”、“刘大麻子”（其实刘大为脸庞白皙英俊）、cos（数学课代表）、“老太婆”、“花花”等等。有的绰号，甚至连他本人也无法考证自己灵感的发祥处。

勾君，属猪。不过，他的面相与猪八戒相去甚远。倒是与孙悟空颇为雷同，大眼、猴腮、呲牙咧嘴，动作敏捷，口齿伶俐，表情丰富，怪语连珠，充满了黑厚学的深刻哲理。此君虽有立地成佛之心，却无改恶从善之举。下面是两张他的旧日“倩影”。左图为四大皆空的禅师，右图为眈眈虎视的阿拉伯海盗。形象地代表了他前半生在心理上、生理上痛苦挣扎而无从取舍的绝妙写照。



（右边这幅用床单、浴巾化妆的作品 68 年摄于勾家，是我与程本宁的成功合作的产物，也成为勾文海几十年怡然自得的自画像。他自名曰：“给我萨姆-3 型导弹！”）

勾文海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生活条件非常优越。却并无纨绔子弟之恶习。虽然语言常常尖刻，但极富对不幸者之同情。纵然常常说话得罪人，但常有反思自省之心。本质上是个好人。在我们老朋友圈子中，他以慷慨好客，高朋满座为快事。生平最讨厌猥琐无知的小人和俗不可耐的女人。大有咬牙切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痛恨。

他插队落户到崇明种过田、也当过农场机修工、建筑队底层苦力、读过大学、当过工程师、也曾经升迁为上海肥皂厂广告部主管。（实际上他并不适合当官。）但是无论在何

种岗位上，他的本色不改，幽默尖刻、不畏权贵、往往令小人退避三舍。他的口舌伶俐，锋芒毕露，这既是他的长处，又是他弱点。前者使他在厂里三教九流的朋友众多，干部不敢轻易招惹他。同时又使他得罪了不少人，甚至包括在领导中为自己树敌。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他有许多名言怪语，其特色就是讲人所不敢讲、想人所不敢想之话。他高中情窦未开之时，便当众自诩为“好色而不淫”；遇见别人（尤其是女士）请教他尊姓大名，他回答姓勾，追问什么勾，他就故意大声回答道：“就是勾引的勾。”参加工作后，正当经济匮乏年代，人们纷纷习惯于偷拿厂内生产物品回家私用或送人，他把此种行为定性为“依靠组织”。结婚后，他女儿刚刚牙牙学语，他教给女儿的第一句长句子就是“祝爸爸万寿无疆！”他当工人时，经常越俎代庖为苏北师弟写情书：“我亲爱的妹……”竭尽煽情之能事，全然是老道精深的情场杀手的文笔，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用自己的文化为工人兄弟们作无私奉献。

他喜欢舞文弄墨，尤其沉溺于繁体字写作、以考证生僻字、怪字为乐事。他的文笔诙谐幽默，就是常有错别字，比如，把“趋腐逐臭”写成“驱腐逐臭”，意思变得南辕北辙。我指出时，他能够虚心接受，不过他不会忘记提醒对方：“人生识字糊涂始。识的字越多，错别字也就越多，而文盲是没有错别字的。”这是非常典型的“勾式”逻辑，令人无法不臣服于这种黑色幽默。

一次，他出差到北京，正好本厂另一个部门的一位漂亮女同事也在北京出差，路上两人居然邂逅，于是，两人边走边谈了半小时。想不到回沪后，不知道怎么老母鸡变鸭，此事变成了桃色新闻，（世界之小，令人惊叹。）全厂传得沸沸扬扬。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勾文海自有他独特的处理方式。当那些喜欢打听绯闻的中年妇女同事前来向他询问“核实”时，他干脆脆地回答：“对的，阿拉两个人的确是在轧朋友呀。”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当别人如果用最坏的猜度怀疑你，不用千方百计为自己辩护或者详细解释，否则越涂越黑。索性反其道而行之，干脆大大方方认可这种恶毒的猜度，以充分满足这类人的“好奇心”。反而使他们真假难分，无所适从，偃旗息鼓。于是，谣传不攻自破。

灵感所致，他往往会蹦出一连串出人意料的话，使人开怀大笑。



近年，一次同学聚餐，席间，陈利华调侃勾文海，说他高中时曾经挺喜欢某某女同学，勾居然丝毫没有羞涩的反应。相反，在席间他马上回过头，以玩世不恭的口气对那位已经做外婆的女生说：“咱们这辈子是没戏了，下辈子吧，不过你下辈子变成母鸡，一定要通知我，否则我变成公鸭，那就麻烦了。怎么样？说定了。”一个六十岁的老头，幽默感如此泉涌，实属异类。（上图：他的神态表明，他仍将坚定秉承“黑厚学”衣钵，别指望他洗手不干、改邪归正。）

他从不忌讳说“不吉利”的话，也从来不顾及别人的感受。比如，他准备了大开本的记录本。每次老朋友聚餐，（基本上每年四、五次以上。）除了记录时间、地点、主题，每人都要签上自己的大名。他声称，随着岁月流逝，大家都将陆续升天，这个本子上的签名会越来越来少，到哪一天本子上只剩下最后一个人时，这本记录本就归那人了。

“大家努力吧。”他说。“等到天堂里人聚齐了，我们继续开会。”（我们一向把朋友聚会称为开会）他无法容忍同窗老友聚会时有人缺席。一次，李兆钟因为工作脱不开身，打算请假。他在电话里对李大肆发飙：“你一定要来！就当作是出席我的大殓，总不可能不来吧？”话说到这份上，可见其说服力之强劲。姜太公在此，所言百无禁忌。这段话属于勾氏语录中的极品经典。

他心细手巧，做事效率高。年轻时，他能自制相当精致的大尺寸照相册；别出心裁地装修美化房间；他从来不在外面花钱修自行车，都是自己动手；八十年代，他甚至于能够拼凑旧木料，自制成套的新式家具（尤其是难度很大的三门玻璃酒吧柜、立柜、壁式多宝柜等等。）我亲眼看过他制作许多精巧的木头“调羹脚”，其专业难度被内行人赞为至少达到五级木工水平。

我受到他的影响，也曾经做过一个当时视为时髦的捷克式书柜。为此，我自己设计尺寸，并对照木工书籍学锯、刨、开榫头、调胶、上底色、油漆，忙乎了两、三个月。然而，书柜最终的工艺水平与他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他爱整洁，衣着简朴，经济条件很好，却从来不穿名牌，老是喜欢穿工作服。唯一一次穿西服是他女儿结婚那一天。（也是临时借来的）他喜爱收藏，书房、档案井井有条，保存了大量我们年轻时代的老照片、游览门票、车票、月票、船票、检讨书、工资单、发票、书信、高中各种证书、品德评语、甚至包括意外

捡到的某同学的情书。这秉承了他父亲的特长——收藏癖和洁癖。但他没有他父亲的极端。据他说，他父亲的洁癖曾经过分到拿钞票也要戴上手套。

表面上，他极为张扬、无所顾忌、大大咧咧、肆意游戏人生。实际上，他极富感情，尤其对独身的我和宋谷春的老年境遇极为同情。私下甚至多次黯然泣下。（这是他近来向我吐露的。）步入六十，他常有周期性的极度悲观厌世之意。独自一人时，他极为自闭。独自在家编写图文并茂的回忆录，在书房写得不思茶饭。动情处，他竟会趴在电脑上老泪纵横，以至于悲切呜咽，不能自己。当他夫人告诉我此事时，我大为诧异。由于我们彼此住得很近，关系又情同手足。所以，每当一人有心理困惑时，都会把对方叫出来，边走边谈，竭力化解、分担对方的忧患。

当然，不同处境的人，在解释同一问题时，会有完全不同的视角和想法，这与每个人的逻辑方法与个人阅历有关。正是这个原因，当他发生心理困惑时，他常常比较主观，我要说服他相当困难。而当他要说服我时，尽管内心并不认同，但是我基本上以首肯或容忍为主。因为我知道他那种不得理时也不让人的脾气，须知他那剑拔弩张、强加于人的黑厚哲理是从来是敌友不分的。

他告诉我，在家中，他的感情常有周期性的火山喷发期，有时甚至摔盘砸碗。但他有一个好妻子黄玉兰，沉稳、乐善、精于理财、又擅长交往。而且黄玉兰还是他们社区妇女的领袖人物。但她对勾文海的喜怒无常却具有令人惊叹的宽容度。我们几次目睹勾大人对她毫无理由、不顾脸面地大声斥责，她都是毫不动容地全身而退，就像母亲对待乖张不羁的幼童。国庆夜，他的妻女邀他一起到外滩去看灯，他愤然回答道：“你们想要看灯吗？我把家里所有十几盏灯都打开，效果不是一样吗？”你说此话有理也对，无理也对，反正有点不近人情。勾文海总是郑重警告他夫人：一天当中，当他洗碗筷之时是他心情“极端恶劣”的时间段。于是，他夫人此时此刻便基本上处于半聋哑状态。

老实说，勾文海一生中面临的许多大大小小的窘境，（无论是他单位里遇到的麻烦还是个人麻烦。）多数由他夫人出面斡旋而逢凶化吉的。所以，黄玉兰女士被我们老同学一致公认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老婆。这是勾太师一生最大最大的造化。

他相当情绪化的执拗脾气有时也表现在对待老朋友身上，爱时欲置膝，恶时欲弃渊。有时独断专行，咄咄逼人喜欢人人顺着他，容不得别人持有与他不同看法。有时却会对老朋友异常温顺，言听计从，表现得如同学龄前儿童一样的依赖。这就是他心理上的极端双重性。用“老顽童”来形容他并不过分。

“勾太”那种丰富多彩得令人眼花缭乱的独特性格，为我们的同窗朋友圈子增添了全色谱的快乐、全方位的思维视角。他的现场感染使我们沉浸在忘却了退休年龄的精神境界。年过花甲，大家相聚在一起时，依然是顽童般的嬉笑怒骂，互相调侃，揶揄、高谈阔论。每次聚会，勾文海总是当然的召集人、调度员。他那种令人无法抗拒的感召力使得我们的朋友圈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而且不断地壮大。毫不夸张地说，他家每年用于勾文海“调兵遣将”的额外电话费支出相当于他一个月的退休金。幸亏他的殷实家底使他还不至于入不敷出。

九 宋谷春列传

宋谷春，我的同窗好友。初中当过少先队大队长，那时我俩同校不同班。我最初认识他是在四十八前，当时正在念初中，学校南后楼只有三张乒乓桌的乒乓房里，大家拥挤着，想打乒乓就得老老实实排队，想多打一会儿就必须“摆大王”，输七个球就靠边站。那时学校乒坛的烜赫的“山大王”之一就是宋谷春。他身手不凡，你看他打球的神韵，从不跳来跳去，只动上半身，两脚几乎不移动，却应付自如，稳如泰山。与其他高手大相径庭，别具一格。而且最使人感到怪异的是，他的直拍乒乓球拍的柄被他锯掉一半，只有一寸多长，但他居然用得得心应手。打球时毫无表情，却是个冷面杀手。

高中时，我们成了同班同学，那时实行男女同桌，我的同桌是团支部书记。文化大革命前就是个极左分子，为人阴险，但始终面带笑容，功课又极差。由于我的各门功课成绩都不错，但是喜欢顽皮调侃。于是，思想左倾的班主任也许考虑到：既能够让她管住我，又让我在学习上能帮助她。算是“优势互补”吧。但是这种安排让我这个天生好动的人极为拘束，又无可奈何。幸亏宋谷春坐在我后面，都是非团员，能有个男同学讲讲悄悄话，成了我的唯一安慰。宋谷春的同桌是**杨倩华**（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配音演员**童自荣**的夫人）。上课时，他们俩的低声聊天，或者我回头和宋谷春的窃窃私语，往往成为成为团支部书记的关注点。（宋谷春的高三毕业照）



宋谷春在班级里是一个很内敛的人，不喜欢抛头露面，成绩一般，但美术天赋超群，是美术老师**王昌元**的宠儿。他画的石膏像素描堪称一流，线条流畅，几何比例准确，色块明暗掌握很好，因此作品立体感特强。所以，深得王

老师青睐，视为得意门生，并放心地把美术室的钥匙交给他一人保管，【注：新沪中学的美术室里保存有一百多个石膏像，在虹口区名列第一。】这既是对他的偏爱，也是一种特别的信任和眷顾，希望他能经常有时间去练习。（实际上他的素描水平已经超过了王老师）这也为他日后临摹油画名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假如文化大革命没有取消高考制度，假如他是红五类子弟，他肯定能考取美术院校。而现在的他却是没有假如的宋谷春。这就是中国解放以后长期政治制度扼杀人才的结果，也是使我们这代黑五类老三届——受毒最系统化、学习最刻苦、受害最彻底的一代学子的终身悲凉。

四十年来，我们老同学都叫宋谷春“谷谷”，这个绰号既亲切又顺口。至于谷谷绰号的来历是这样的：宋谷春平时稍有些口吃，一次外文课，宋谷春被俄文老师突然提问，被问的俄文问题应当回答的是第一个单词是：“К о г д а ...”（俄文意思是“当…时候”。发音是“嘎戈达”）由于宋谷春本来就有些口吃，加上俄语老师的提问猝不及防，他顿时非常紧张，于是运足丹田之气痛苦地挤出“嘎…嘎…嘎…咯——达”的声音，惹得全班哄堂大笑，此后，有人取笑他像老母鸡下蛋难产，给他取了个“咯咯”的绰号，由于宋谷春平时人缘不错，从不招惹任何人，同学们照顾到绰号不雅，取他名字中间一个字，习惯叫他谷谷。宋谷春接受了这次惨痛的教训，从此以后，他放慢了讲话的频率，说话变得慢条斯理，字斟句酌，反而给人一种稳重的形象。而且卓有成效地改掉了口吃。至今说话也是如此，是我们老朋友中最文雅低调的一个，不像我们大多数老朋友那么张扬外向、锋芒毕露。除非他三杯酒下肚，胃囊中 PH 值超标，宋谷春才会出言不凡，醒世骇俗，惊动四座。

宋谷春青年时代是个美少年，眉毛微微上翘，身材匀称，体格清瘦健壮，一米七六，为人宽厚低调，从不议论别人。喜欢古典音乐，也喜欢唱歌，只不过从来不在人前声张。记得有一次联欢会前，不知道文艺委员邵乐恩从什么人哪里打听到，我和宋谷春都唱得不错，于是死缠硬磨，我们两个不得不同意一起唱了一个新疆的歌曲，名字忘了，只记得前四句句是“吹散了天上的乌云，扫清了地上的灰尘，我们的心像甘露一样清纯，毛泽东的时代多幸福…” 歌词与当



时政治背景脱不了干系，但是旋律极其动听，我们两个人虽然都是第一次当众表演，但是在双重唱时，宋谷春反而比我镇定得多，嗓音刚健有力，我倒是颤音频频，幸亏有他打底，居然也博得了大家的热烈掌声。

宋谷春家住海伦路上的一排西式小洋房里，海伦路儿童公园对面。他家与中国著名的顶级书法家沈尹默家（海伦路 504 号）是邻居，两家相隔不远。

【注：沈尹默，浙江湖州人（与鄙人同乡）是中国杰出的学者、诗人、书法家。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同办《新青年》，为新文化运动先驱。】

文化大革命时，沈尹默家被红卫兵团团围攻，老头无奈之下被迫写“认罪书”。真佩服他别出心裁，危难中仍不乏幽默和张扬的本色，居然用斗大的毛笔字酣畅淋漓地写出巨幅的行楷“认罪书”，从三楼墙面一直挂到底楼，占了整整一堵墙，围观者甚众，与其说来看沈老的“认罪”态度，倒不如说是来欣赏沈老的书法风采。宋谷春见后大悦，匆匆忙忙告知李兆钟，（李也是我班同窗好友，他们两家只隔一条马路）李兆钟灵机一动，立刻建议说，何不今天晚上去把这幅墨宝偷偷揭下来，岂非成了稀有收藏品了。以当时前途未卜的严酷社会现状，李兆钟的想法的确非常具有前瞻意识。宋谷春本来就酷爱书法，这个鬼招对他正中下怀。虽然此类行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绝对是大逆不道之举，用当时的红卫兵语言来说是“贼胆包天、罪该万死”。一旦被抓住，后果不堪设想。何况两人又皆出身黑五类子弟，（一个是留洋“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一个是洋人“买办”后代。）

但是年轻人做事是不会考虑后果的，两人一拍即合。私下商议，决定当天晚上半夜以后就动手。不料，捷足先登者大有人在。夜深人静，当他俩偷偷摸摸地靠近沈家大墙时，抬头一看，“认罪书”早已不翼而飞，使得他们白白熬了一个晚上。沈尹默于 1971 年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沈尹默“认罪书”原作在香港拍卖，引起巨大轰动，居然拍到一百万港币。今日言谈中，李对煮熟的鸭子竟然会飞掉大为沮丧，宋谷春却坦然道：“有啥啦，说明我们没有噱头、人家比我们有魄力嘛。”

文化大革命中，宋谷春的美术才能被红卫兵相中，黑五类子弟被我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部”委以宣传重任，画画、文艺表演频频出镜。这使宋谷春后来的毕业分配受益匪浅。当时我们同学中只有极少数留在上海工矿，大多数去和泥土对着干了。而宋谷春被分配到上港四区当了一名码头工人。干了没多久，他的美术和乒乓才能又被领导相中，当上码头工会的干事。还作为干部培养对象被选拔到北京全国总工会开过会，差一

点成为全国总工会成员。因为当时文件规定：不是中共党员不能当选，因而被发现而排斥在外，于是上级不得不临时把他从北京召回。要不，没准今天他还不是一个小角色呢。

宋谷春酷爱美术，审美能力相当强，而且他的古文物鉴赏和石膏雕塑水平也不一般，他模仿龙门石窟的佛祖头像的雕塑作品惟妙惟肖，当年成为我们几个同学结婚时争相预订的装饰品。几乎成为批量生产的仿古物。至今，每当我们在勾文海家聚餐，客厅的壁龛中宋谷春的作品**卢舍那祖佛**的头像依然傲视群雄地看着我们嬉笑调侃。（见右图）据勾文海回忆，当时他看到这个头像，不管宋谷春是否同意，硬是把佛祖头像捧回家，宋谷春妻子对此大为不满，朝着巧取豪夺的勾文海怒目而视。



中年后，宋委员长嗜酒如命，一日不可无此君，而且经常喝混和酒。聚餐一开始，他总是先喝闷酒，如果他开始打破沉默，力排众议，观点独树一帜之时。那就是他的酒力接近“临界点”的标志，如果他仍然寡言，说明酒力还不够。这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我们常常劝他少喝一些，注意健康。他却不以为然地说：怕啥，死不了，即使死，又有啥了不起呢。

宋谷春妻子是一个长得很甜的小美女，比他小十一岁，也许和美术家都喜欢娶模特型的女人做老婆有关吧。但十年前，他的妻子由于机遇去美国打工，一去不回，虽然常常寄些钱回来。多年来，他孤身留守，操持家务。他对生活质量并不挑剔，但大男人一个，也相当辛苦。儿子未婚，混得也不理想，看上去整天忙忙碌碌，但家务活显然是没法指望儿子帮忙。处于亚鳏夫状态的“谷谷”处境孤寂，但相当豁达。

也许为了排遣寂寞，宋谷春养了一条脸长得酷似马克思的狗，这条狗寄托了他不少心血，每次聚餐，他总忘不了把吃剩的肉骨头收罗打包带回家中，孝敬他的爱犬。可是，每次我们去他家，他竟然把爱犬关在笼子里，我们很诧异，他解释说，这条狗特别喜欢发“人来疯”（也许是家里很少来客的缘故）会把家里搞得一团糟。于是，我们只能隔着笼子和满腹牢骚的“马克思”寒暄。

他和爱犬感情笃深，每当我们邀请他去外出旅游，他的唯一要求就是“不能超过三天！”，否则他无法照顾爱犬，大家都不以为然地说，你就不能让你儿子照料狗吗。他说自己实在不放心。的确，养狗的主人一般都是这种心态。如果我们再继续劝下去，他就会冒火：“你们懂什么？我和你们出去只去玩三天，可是这狗一年要陪我三百六十天呢！”这话让我们听着既同情，又体味到一丝淡淡的酸涩。



年岁不饶人，昔日的美少年如今已中年谢顶，英姿不再。去年退休后，一向满不在乎的他索性剃了个光头。第一次亮相，锃光瓦亮，众人大惊：活脱脱一个蒋委员长。（见照片）

和程本宁一样，宋谷春酷爱音乐，无

论是西洋的现代音乐还是古典音乐。两个发烧友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他们聚在一起，有聊不完的话题，肖邦、比才、多明戈、交响乐，哪些碟片质量好，哪里有卖，同样的碟片哪些正宗，哪些碟片太差劲，等等。有时候，当他俩正滋滋有味、一边欣赏一边对比时，陈利华会凑上去说：“在我听起来，还不是都一样嘛，”他们俩立马把陈利华拉到落地音响前，耐心让他再仔细分辨一下两种碟片配器效果和左右音响，陈利华还是听不出所以然，说道“我听听差不多嘛。”对这个乐盲，宋谷春和程本宁俩人相视愕然，无言以对，干脆把陈利华撂在一边，“你根本就不懂。”

陈利华的音乐细胞天生严重缺损，年轻时，我们圈子里的几个“资产阶级思想成问题”的同学都喜欢翻翻“外国民歌 200 首”、哼哼小夜曲，陈利华也是我们的圈子中人，耳濡目染，也附庸风雅，觉得学歌没什么了不起，（这是他一生难改的不甘服输的倔脾气）陈利华回家对照音乐简谱勤勤恳恳地学了一支托赛里小夜曲。有一天，当几个好朋友聚在一起的时候，他开始蛮有把握地哼唱起来了，大家特别意外、开始洗耳恭听，起先，

大家根本分辨不出，以为他唱的是我们从未听到过的歌，所以既惊讶又好奇，因为他唱歌的节奏像进行曲一样铿锵有力，彻底阉割了小夜曲抒情柔美的情调，等到他唱了一大半后，人们才如梦初醒，恍然大悟，众人几近喷饭。尤其李兆钟笑得前合后仰。

宋谷春写得一手好字，他的字隽秀，就像他的为人，不露锋芒。而且他写字的手势也别具一格，如同雕刻小型玉器一般慢条斯理，滋滋有味。就像他的性格，无论做什么事，总是含而不露，力求完美。虽然年过花甲，但他对新事物懂得很多，什么电脑升级、数码相机行情、运动赛事、汽车知识等等，他总能讲出许多道道，使人听得津津有味。在我们好朋友中，他的处事最为随和，从不轻易争强好胜，除非聚餐会上他的酒精含量越过临界状态时，一旦听到不同意见，他才会一反常态，顿显“狰狞”面目，非得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大有慷慨陈词、万人莫敌的雷人豪气。而平时，他判若两人，凡事都是不慌不忙，随遇而安，俨然是心平气和的长者风度。不管遇到什么大事，他总是看得很淡泊，天生就是“大风大浪不在乎，香烟屁股慢慢呼”的性格。文化大革命后，他的哥哥曾经平步青云，就任北京高等法院刑事庭庭长之职，按理，当时作为码头工人的他大可借此鸡犬升天，但是他从不求助于兄长的荫护。“凭自己本事吃饭”是他一以贯之的处世之道。同时，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折射出他哥哥的为官清正廉洁。

作为四十多年的老朋友，我们深知他的许多长处，与世无争，从不揭人之短。尤其他对艰辛生活安之若素的态度使我深得领悟。

十. “玛丽”



李兆钟，待人真诚，古道热肠，尤其在老朋友遇到困难时，他能特别热心地出点子，并能不厌其烦地为之从中调解、斡旋，而且基本上都是马到成功居多。（左图：李兆钟高中毕业照）

他出身山西名门，祖父李尚仁，国民党时代历任山西省阎锡山手下的财政厅长、教育局长，抗战逃难后退出政界。父亲李杜留洋英伦，回国后被任为上海电缆厂总工程师。由于家庭的耳濡目染，加上他又相当善于结交名门之后，所以他是我们“常委”中的西洋掌故通。他酷爱音乐，更是美食家兼厨艺高手。你从他的嘴里能够知道许多闻所未闻的新奇知识。

高中时，从未开窍的我们从他那里知道了红房子、乳酪、搅奶油、法国鹅肝、布丁

制法、西式餐具用法、一直到哈代、勃拉姆斯、“那波里之歌”等等。加上他的记性好，叙述能力强，西洋人的种种规矩趣闻往往使我们听得津津有味。至今我还记得高中时他带我们第一次到红房子餐馆“领世面”时点的几道菜名：维也纳牛排、乡下浓汤、牛尾等等。至今，大家依然一致盛赞他当年对开拓我们眼界的无量功德。

我的儿时家境不错，特别喜欢吃乳酪，尽管别人认为有些异味，比如曾经吃过内蒙古带来的未加工的奶酪，散发出强烈的发酵臭味。但我感觉味美无比。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世界上乳酪还有那么多的品种。有一次在李兆钟家，他拿出一个像半个排球一样的东西，切成一片片，请我们品尝，刚吃，觉得淡而无味，就像无味的肥皂。李说，你们多嚼嚼，不要咽下去。果然，越嚼越有味，那种乳酪奶味隽永纯正，唇齿留香，是我至今吃到过的最为上乘的乳酪。“这种 cheese（乳酪）是国外带来的。”他介绍说。不言而喻，这种舶来品奶酪一定价格不菲。但李兆钟却极为慷慨地拿出来，好客地让大家长长见识，并且耐心地启蒙我们这些“巴子”。（上海俗语：乡巴佬）

他的厨艺极佳，每次同学聚餐前，我们总是要苦苦哀求他露一手，可是他总是“搭足架子”。（也许是精细厨艺太累、太繁琐之故。）我记得高中时在陶仲林家吃过他做的“托尔斯泰蛋糕”“法式布丁”、“香酥鸭”，在程本宁家吃过他做过的“八宝鸭”、“德式牛排”、“珍珠肉圆”……件件美食做工考究。那时年轻胃口好，加上李兆钟的厨艺出众。餐席上，七条饿狼个个眼睛发绿。那个肚内填料极为丰富的八宝鸭仅仅在五分钟内就被我们消灭殆尽，当时看表计时人是程本宁。尽管如此，此举却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头狼程本宁撕嚼填料的速度。

李兆钟还有一种对女性长辈的特别亲和力，每到一家同学家，他总喜欢与同学的母亲促膝谈心、问寒嘘暖。因此，往往受到母亲们的格外青睐。别看他胡子拉碴，长相老成，颇有阳刚之气。但是他的言谈举止颇有些“性别异化”之嫌。因此，勾文海给他起了一个女性化的绰号“玛丽”。

出于家族渊源，李兆钟具有出色的遗传基因，良好的智商。但是在学业上他毫不出众。这源于个人的发展取向不同，人各有志，每人各有所长。李兆钟善于理通人脉、乐于处理人际关系，加之爱好广泛，善于结交名流，并介绍给我们同学。这占据了他在大量时间和精力。山西地杰人灵，山西人一向以豁达开放、精于理财著而称，历代晋地富商名闻遐迩。如果不是时运不济，今天的他绝非碌碌无为之辈，完全可以创出一片不小的天地。

如今，李兆钟“能度格年纪”，已经退休了，还在发挥余热。现在照样可以每天“横渡”市区，往返三小时，而且一个星期只休息一天，精力依然充沛。每次聚餐，在餐桌上他一边咀嚼着满嘴的美味佳肴、一边总喜欢不断地嘟囔着他的至理名言：“不怕吃死，就怕饿死。”那副埋头苦干的样子，仿佛多年漂流在荒岛的鲁宾孙刚刚回到伦敦大酒店。

下图为 2009 年我们同窗在勾文海家西餐怀旧聚会上品尝到李兆钟厨艺作品：

据李兆钟称，此乃他的关门之作。菜谱及食品如下：

土豆红肠色拉、地中海蔬菜色拉、加拿大熏肠、杏仁布丁、培根蛋饼、菲利炸猪排（旁边点缀着土豆泥和番茄沙司）牛尾汤。草莓酱、西班牙 YBARRA 橄榄、法国 PRESIDENT 酒、意大利马爹利、澳大利亚干红、青岛啤酒、白脱片、切片面包、冰块、果汁、英国雪茄。



十一. 道德楷模



我的高中同学张行，共青团员，为人正派、真诚，富于同情心，对待任何同学都能主动伸出援助之手。在我们的心目中，他几乎是个圣徒。举几例：据勾文海回忆，有一次到农村下乡劳动，勾在河边洗碗，不慎把一枚不锈钢调羹掉入河中，由于河水深，他只得放弃了打捞。张行见状，不听勾文海的劝阻，挽起裤腿，赤脚下到冰冷的河水中，帮他把调羹捞起来。毛天锡老师骨折后坚持上课，张行主动地每天把身材高大的毛老师背上北大楼三楼。同学陈利华得了严重的肝炎，他不怕传染，去陈利华家询问有何经济困难。等等。他的助人事迹多多，不胜枚举。用“雷锋”这个模版来比喻他似乎文不对题。我认为，他处处在实践着“低调、谦虚、真诚、正直”的处世准则，如果用一个虔诚基督教徒的标准来评价他，那倒是比较妥贴的。因此，他是班级里人气很高的团支部书记人选。

当时，政治现状正是中苏关系刚刚决裂之时。于是，班主任周老师在主题班会上含沙射影地大加抨击“资产阶级的个人奋斗思想”，致使他落选。虽然他本人毫不在乎是否当选，但从此，他在团支部里无形中处境极为孤立和郁闷。尽管他是副班长，班主任却对他十分冷淡。但班级里的非团员同学都非常同情他、尊重他的几乎完美的人格。

(上图：我的照相册中张行同学 66 年的毕业照。下页照片是他近日从澳大利亚回沪，我们为他举行的接风宴席上的近影。二者时隔 43 年。)

每天清晨，他独自在操场自觉地坚持锻炼长跑。所以第一节课前，他总是满头大汗。由于空腹锻炼，以至于最后练得胃出血。下乡劳动，体力劳动消耗极大。但是，我记得特别清晰的是，并不强壮的他挑着沉重的一担稻谷，背几乎被压驼了，同学们几次劝他别挑得这么多，他每次都淡淡地一笑：“还可以，还可以。”第二次又是重重的一担稻谷。晚上回宿舍，由于出汗太多，他的衬衫后背上竟然泛出一层白白的盐花。使我隐隐感到，他时刻在以小说“牛虻”中的主角——坚毅的亚瑟在默默地苛求自己。



张行轻易不与人争论，凡事也从不与人计较，但并不代表他没有主见、是个默默无闻的“螺丝钉”。他富有正义感。一次下乡，依照惯例，是班集体自己料理饭炊。炊事班打饭，班主任周老师总是亲自站在打饭的炊事员旁边督阵，轻声提醒炊事员每碗饭少盛点。周的目的是尽可能克扣上级补贴给学农学生的粮票，上交学校，以示他治班的“政绩”。这些都被当时的副班长张行看在眼里，他觉得同学们已经体力消耗很大了，这么做很不好。

正巧那天我吃得最多。一则因为农村新米好吃、又没有“涨性”，一斤新米烧出来只有平平的一大碗；二则是我当时劳动后实在饿得有些“急吼吼”。（现在想来，可能就是后来患“甲亢”的早期症状——食欲亢进。）按碗数计，我居然吃了 23 两饭，（老秤：十六两制）名列全班第一。周老师在班级上公开对我痛加批评、指责我浪费粮食。于是，张行私下对周老师说：“钟恕尧吃这 23 两的数字是不对的，因为每碗饭不到 4 两。”古人云：“直木必伐”，周因此对张行怀恨在心，在学农的三人领导班子里提议以“煽动学生不满情绪”的名义整治张行，但是遭到领导小组其他两人的否决。其中一人是校团委书记李承昌，一人是赵蔚庭老师。因为，主持公道的团委书记李承昌早已经专为此事调查过张行，知道事情的由来。（注：李承昌八十年代曾任虹口区事业局局长。）

风波过去四十年。近日，在老同学聚餐会上张行才披露事情真相，使我如梦初醒。既感激张行的仗义执言。又颇为沮丧，原来我一生饭量的辉煌纪录根本没有这么高过。

电影“牛虻”堪称前苏联最为成功的一部经典杰作，改编自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的同名小说。描写为祖国独立奉献生命的年轻意大利烧炭党人，尤其是男主角亚瑟的深沉表演和著名音乐家肖斯塔柯维奇的电影配乐，更加衬托出作品的感人至深。亚瑟（绰号“牛虻”）作为一位悲壮的英雄，曾经使无数中国青年流下过热泪。老实说，我们这群同学中很少有人只看过一遍“牛虻”电影的。

张行极其崇拜亚瑟。不过，能够身体力行、如此认真自我修炼的人，堪称我们的道德楷模。

十二. 停课反省----六十年代学农纪实

高中时，我们的班主任周老师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虽然他的家庭成分并不好，（这是我们在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的大字报上才知道的。）但是努力表现进步、思想比较左倾。

他挑选的班、团干部多数是红五类、爱打小报告的极左分子。高一时，程本宁是正班长，有人反映他只专不红、资产阶级情调严重。尽管周老师厚爱程本宁，但第二个学期他依然被贬为学习委员。

话说高中每年都要参加两次农村劳动锻炼，一次是“三夏双抢”，一次“三秋”。那次“三夏劳动”，周老师和团支部宣布，为了学习贫下中农，十天学农中，每天三餐一律吃素菜，不许吃任何鱼肉。至于睡觉，全体男生被安排睡在一个大仓库里，地上只垫一层厚厚的稻草，直接在上面铺上被单，人挤着人，权作宿舍。几天下来，许多同学被稻螨叮得浑身奇痒，抓痕累累，还要起泡流脓水。

条件虽然艰苦，天气湿热，体力消耗极大。由于蚊螨叮咬，晚上睡眠也不好。记得有一次，某同学怕热而睡到室外，全身裹紧毯子，只露出鼻子，可蚊子的猖狂进攻使他的鼻子在早晨变得像马戏团小丑一样红亮可爱。那时的劳动与现在高中学生的舒舒服服的“学农”完全不是一码事。与当年相比，老实说，现在高中生的学农无异于变相的夏令营。可是，农村的集体生活也有乐趣。尤其是勾文海，顽皮捣蛋、笑料特多。一天晚上，勾文海一个人打着手电筒去农村的简易茅坑拉屎。不料，光柱正好照到周老师也在拉屎，吓得他屁滚尿流、逃回仓库。勾文海进门第一句话就是：“周老师屁股瞎白！”（上海话“瞎白”：形容白得不得了）众人大乐。

当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周老师突然宣布，全班紧急军事集合。由于黑灯瞎火的，排队排得相当慢。周老师一边恶狠狠地扯开尖利的嗓子大发脾气，一边用他那支强光手电筒乱照，使人睁不开眼，最后照到我脸上，还停留了几秒钟。（因为在他心目中，我是调皮学生之一，他从来不敢收拾调皮捣蛋的勾文海，因为勾文海的妈妈赵克文是他同事、我校的高中语文教师。周老师唯恐投鼠忌器，也是常理。）我立刻大为不满地抗议：“用手手电筒照人面孔是不礼貌的！”“你说什么！再说一遍！”我又说了一遍，他气得无言以对，勃然大怒，立马让我出来，到一边罚站，我依然强头倔脑，坚持认为自己说得没错。回校后，周观旗当众宣布我停课一天，在家反省。

老实说，停课我倒不在乎，我能自学。最难受的是在家倾听六十岁老母的哭诉和眼泪：“…你爸爸死得早，我让你读高中容易吗？你在学校里还这么不听老师的话。…”虽然母亲哭泣的声音很轻，却让我肝肠寸断，深为内疚。因为家道中落，又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同父异母的兄姐对我们弃之不顾。母亲是家庭妇女，我们母子三人告贷无门，仅仅靠典当和舅舅、表哥（母亲养子）的微薄接济生活，当时属于上海最低生活线上的

人群。而姐姐的学习成绩远不及我，所以我是母亲的唯一指望。

高二期末，周老师在我的品德评语上赫然写着使我触目惊心的这么十个字：“说话刻薄，比较自由散漫……”使我预感到，这些话对我今后高考的政审将产生极其不利的负面影响。（对同学陈利华的评语就比我更惨了，周写道：“…不关心政治，不要求上进”。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纵然他不是黑五类子女，也是绝了他考大学的后路。何况，他的数理化在班里是尖子。）

文化大革命后，我回到母校任教物理，而且干得挺出色。三年后提升为虹口区各中学中最年轻的物理教研组长。周老师逢人便夸，说高中时候我多么聪明，而且经常告诉他老师，他就是我高中时的班主任。俨然成了未卜先知的伯乐。

我担任民主党派支部主任后，他是我们支部的一员，但我们的关系一直保持融洽。毕竟，他既是我同事，又曾经是我高中的班主任。他经常向我打听：你们同学经常聚会吗？我完全懂得他的言下之意。于是与“常委们”商量，2002年我们请他参加了一次我们在“鑫旺府”饭店的全班聚会。席间，勾文海倡导，每个同学捐赠50元给班主任，勾文海让我负责收款。当时，陈利华就对捐款极力反对，他对勾文海说：“你要考虑考虑有的同学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好啊。”实际上，我最清楚，陈利华旁敲侧击，为了发泄不满，故意借题发难而已。但大部分同学都顺从地掏钱了，我从一半同学眼神中看出，他们对于“报答”前班主任是碍于脸面。这次周老师一共收到1850元。收钱时，他半推半就，终于还是收下了。

2006年在他癌症开刀后，我和勾太、李兆钟还带着礼物去看望过他。毕竟，他是执教我三年的老师，尽管并非恩师，而且当年对我乏善可陈。毕竟，平心而论，他执教我们的高中俄语，是一位教学上相当敬业认真、又一丝不苟的称职老师，涌泉相报也是应该的。

近几年，教育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教育局文件规定，根据“人文主义”精神，所有各类学校，高考的品德评语一律不准出现负面词句，即使是“希望今后改正……的缺点”或“希望今后注意克服……”等等规劝性词句也不许出现。班主任的评语要经过教导处、校长层层审核把关，否则一律退回重写。一旦“用词出轨”漏网，被虹口区“高招办”查出，将进行全区点名批评。而且高考前，凡受过处分的学生高三阶段必须尽快撤销处分。这使得个别品行极其恶劣学生的品德评语也冠冕堂皇，简直是做假。差生们弹冠相

庆，老师们摇头叹息。这种后遗症使得坏学生肆无忌惮，无后顾之忧，班主任却是进退维谷。师道尊严名存实亡。而且部分文化程度较低的家长无理取闹、极难对付。一次，我亲眼看到一名品德、成绩双差学生的家长在校长室大拍桌子：“为什么我的儿子成绩这么差？！”面对无理的质问，校长依然竭力克制住愤怒、耐心地说服。这就是中国式的“人文主义”，实际上，我们教师最清楚：教育局本质上就是为了提高本区学生的高考升学率，避免学生因为品德问题而落选。以人为本 = 本人以为 = 笨人以为。改革开放前，某些教师能够运用“品德评语”刻意打击不中意的学生。现在，“毕业品德鉴定”一下子又变成一味地良莠不分。中国的教育永远像单摆，振幅总是很大。这正是中国人的思维定型——功利主义。总之，什么好东西一旦与中国现实“接轨”，都会出轨，都会走味道。

以下照片是二〇〇二年二月十七日我们班同学于《鑫旺府大酒店》聚餐时的集体留影。



照片前排左起：戴斐、杨倩华（童自荣夫人）郑婉华、万桂兰、周老师、李武敏、李佩萍、张家干、吴蕴雯。

中排左起 --- 张焕梁、孙国民、李兆钟、钟恕尧（作者）、陶仲林、李沪生、陈利华、胡海章。

后排左起：周元子、程本宁、勾文海、池逸之、陈万程、蒋竞元、王家祥、黄欣。

十三. 柴板（上海话：烧火木柴）

程政奇，这是我常常想起的一位新沪中学的初中同学，脸蛋长得挺英俊，心直口快，机警聪明，筋骨很好，但骨瘦如柴。所以大家送他一个绰号叫“柴板”。他的体操极好，尤其弹跳力甚是了得。那时男孩子们时兴一种单腿“斗鸡”游戏，两队对垒，他居然能够单腿跳起两尺多高，用另一条抓在手上的大腿压住对方的肩膀。所以，他的超强“战斗力”在周围班级是远近闻名的。

由于他的数学很好。于是，初中班主任蒋嗽生老师把他安排与一位数学成绩不好的女同学同桌，以便让他提携后进。一天自习课，课堂里很安静。那时，程政奇正在帮助那位女同学解释一道几何题的推导过程。也许，讲了好几遍她还是弄不懂。突然，他大吼一声：“赤那！依那能介笨啦！”（上海话：妈的！你怎么这么笨啦！）引得全班哄堂大笑，那个女同学伏在课桌上哭了起来。

高中时，班主任也出于同样的目的，安排我与成绩极差、思想又极左的团支部书记同桌。自修课上，她问我的题目往往极其简单，几乎套一套公式就可以做出来。不用说比较复杂的题目，更是浪费了我许许多多时间。有时我私下非常恼火，我常常想起“柴板”，真想骂她一句：“赤那！依那能介笨啦！”但那时我绝对不敢，因为当时政治形势完全不同了。我只得忍气吞声，耐着心致一遍又一遍地解释。班级的政治氛围极左、思想压抑，团支部书记的权力几乎与班主任一样大。为了不惹事生非，反而倒是我如履薄冰，小心提防，生怕这个笑里藏刀、很有心计的团支部书记向班主任暗进谗言，给我扣上什么“骄傲自大、自私保守”或其“鄙视劳动人民子女”等等资产阶级思想的帽子，以至于在主题班会上成为班主任不点名抨击的对象，更怕班主任在我品德评语上狠狠地写上一笔，使我高考无望。

那时提倡学生必须艰苦朴素、热爱劳动。某天，坐在我旁边的团支部书记突然吸了一下鼻子，她头也不转过来，正色问道：“你的衣服是你自己洗的吗？”“是的。”我回答。其实，我妈从来不让我洗衣服，她迷信地认为，男孩洗衣服将来会没有出息，“洗得不干净，还有一点肥皂味道。”她冷冷地评价道。

又如，我常常回头和后座的宋谷春的窃窃私语，（那时的惯例是一男一女同桌）往往成为这位团支部书记的关注点，表面看，她像是在听课，实际上她在不动声色地倾听我们的谈话内容，作为向班主任汇报班级思想动态的材料。所以，除了她学习基础差，智商极低之外，一心两用、专事窃听也是她成绩极差的原因之一。

窒息的政治空气对学生的压力可见一斑。对现在的学生来说，这几乎是天方夜谭，他们绝对无法想象、无法理解这种芒刺在背的感觉。但这确实是真实的历史。

今天想想，他妈的，算个什么玩意儿，狡兔鹰犬，小人加笨蛋一个。

高中毕业分配，正值插队落户。我们班的同学80%以上都是插队落户、与地奋斗去了。作为红五类，她理所当然地优先分配到上海港务区，后来她又入党当干部。据说，八十年代她再次飞黄腾达，当了上海港务局外事处头头。我们听说后，个个面面相觑。以她那种几乎是一穷二白的外文水平，真不知道她翻译的究竟是苏北话还是哪门子外国话。

近年来，我们经常进行同班同学大聚餐，但从不邀请她，（因为她的出席会使一半以上的同学食欲不振。）她得知后极为羡慕，又不好意思直接问我们，于是她偷偷打电话问胡海章同学：为什么不通知她参加？胡海章倒是个直肠子，反问她的：“你以前是怎么做人的，你自己也应该清楚呀。”不知道电话那头的她是否血压骤升。不过，当胡海章同学眉飞色舞地告诉我们时。众人都不约而同翘起大拇指：“爽！”

我母亲生前常常对我说：人要心善，不可以暗中阴损人，否则会有报应的。不是“现世报”，便是“后世报”。人老了，见得多了，现在想想，我觉得母亲的话也不全是迷信。从道理上讲，天地事物之间确实存在环环相扣的因果关系。阴损人太多，总有真相大白的一天。败露之时，他（她）将不齿于众人，在周围环境中处处碰壁，落得个孤家寡人，也没有朋友可以倾诉，（古人云：小人无朋。）非常容易引起长期的心理极度郁闷，导致免疫力急剧下降，非常容易得大病，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或癌症。

说来也怪，新沪中学某位元老级的老教师陆女士（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曾经扳着手指一一统计过，在老新沪，凡是在历届运动中阴损、迫害过教师的人（多为干部）得癌症而亡的居然占了相当大的百分比。我也纳闷：他（她）们怎么会多数不得善终？天意乎？自然乎？因果报应乎？

想想那些导致新沪中学被解散前一帮不学无术又折腾不休的政客、小人，他们多数不是高血压，就是脑血管出问题，迷信吗？还是报应？偶然巧合？实在发人深省。

十四. 郁闷之夜-----66年取消高考

高三时我们的班主任S是一个猥琐人物。四十岁不到，据说成分很好。上语文课时，他说话疙疙瘩瘩，嘴角堆露白沫。因为高二执教我们语文课的是“扬州才子”纪民老师，所以相比之下，听他的课简直犹如一场场“噩梦”。

然而，每当他看到女同学时总是眉开眼笑，遇到男同学时却老绷着个脸。所以，我私下里给他起了个绰号“德宣皇帝”。1966年，正值我们高考复习紧张之时，而且高三全体同学已经通过高考体格检查，填过高考报名表格。可是，当时社会的政治气氛也层层加码，报纸、电台“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文章连篇累牍，高三洗脑主题班会一次接着一一次。主题班会上，德宣皇帝发言慷慨激昂，唾沫四溅。大谈“好儿女志在四方”等等，搞得人心惶惶。我们班里一个功课极差、高考无望的激进极左分子马珠（化名，以避嫌。）提出“到新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甚至上台发言，号召大家报名到新疆去，使得班级里人人自危，精神压力空前。事实上马珠后来根本没去新疆那个“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毕业分配时，就是凭着她那一颗“红心”表态的政治资本，她甚至连插队落户也没去，而是分配到上海一家钢铁厂。几年后，又靠着她那张巧舌如簧的嘴，加官进爵，步步高升，后来赫然位居工段党总支部书记。

那时文化大革命正向“纵深发展”，大字报铺天盖地，“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不能让资产阶级长期统治无产阶级教育领域的局面继续下去了”之类的政治宣传甚嚣尘上。此时，离我们高考已经不到一个星期了。学校里，高三早已经不上课了。大家都回到家中，茶饭不香地挑灯苦战，进行最后的冲刺，积极准备温课迎考。

一天，突然接到紧急通知：晚上七点钟，全体高三学生必须准时到校，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的重要消息。我有一种凶多吉少的不祥预感。果然，晚上七点，教室喇叭里传出我们熟悉的中央电台播音员的凝重的声音：“…经中央研究决定，停止一切高校考试…”其他我什么也没听到，只觉得脑子“嗡”的一下，一片空白。

在北大楼三楼昏暗的灯光下，大家都低着头、心事重重地陆续下楼，彼此谁也不说话，尤其是我们这些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者，个个如丧考妣，犹如被打当头一棒似的眩晕。我更觉悲凉。家道中落、成分又不好，何去何从，完全茫然。

此举违天悖理，糟蹋了整整一代学子的宝贵青春，不但浪费了他们十二年寒窗的努力，而且使处于含苞待放的一代莘莘学子深造的前途毁于一旦。

文化大革命的废黜百家，独尊左道。使国家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尤其是废止高考，使国家人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这种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充分显现出来。例如，十年后我回到母校执教，已经近三十岁。可是学校里三十二岁到四十二岁年龄段的教师一个也没有，形成师资的断裂层。由此推论其他领域，毋论科技、文艺、学术界等，各行各业后备人才都捉襟见肘，文化大革命运动比反右运动更进一步耗竭了民族文化、科技

发展的元气。

反复折腾了几十年，似乎是“政治路线”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字：权。

那时的青年，绝大多数同学的理想都是想有一番成就，报效祖国，报答父母养育之恩。今天，不能讲多数青年人的理想吧，相当多的高中生企盼的是：将来能有一个薪酬不菲的“白领”职业、或者成为待遇优厚的公务员，或者能够出国“深造”。

五十年代儿童的理想是想将来当一名科学家、艺术家；

九十年代儿童的理想是想将来做老板；

今日报纸上爆出一条令人目瞪口呆的消息：南都网的“广州一年级小学生的理想”调查的视频中有这样一段发人深思的对话：

“你长大了想做什么？”

“想做官。”

“做什么样的官呢？”

“做……做贪官，因为贪官有很多东西。”

(这段在广州完全真实的视频引起网民的轰动效应。在调查问卷投票中，10 %的网民选择了“童言无忌”，而有55 %的网民认为“折射了社会现实”。)

十五. 张友白之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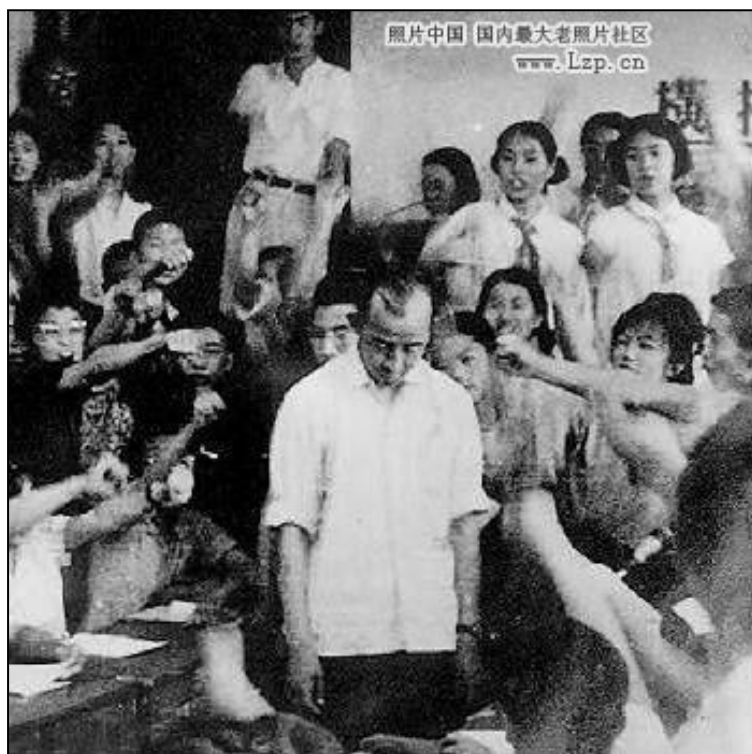
我们学校有许多名师，张友白是其中之一。我们读高三时，他是高二的数学教师，是毕业于交大数学系的高材生，还是所谓的“脱帽右派分子”。他为人非常和蔼，总是面带微笑。他的才气和教学效果全校闻名。我参加课外活动数学讲座时，曾经两次面聆过他的教学风采，他的讲座妙趣横生，旁征博引，非常具有吸引力和说服力。深受高中学生崇敬和欢迎。

66年的文化革命初期，凡是“伟大领袖”的每次“最高指示”登报，教师每人都必须要写大字报表示热烈拥护，以示个人“政治表态”。张友白老师也写了一张，也许他过于匆忙，用黑笔书写，但最后自己的签名却是糊里糊涂用了红笔。于是，在有人暗中挑动、唆使下，某学生写大字报，指控他用黑笔书写毛主席的名字乃是恶意诅咒。大字报在全校引起轩然大波。事实上根源是材料组暗中向学生抛出了他的右派分子身份的底牌。

(文化大革命前期，材料组是学校里最阴毒的幕后策动者。)于是，在“中大楼”下，上百个幼稚又“义愤填膺”的高、初中红卫兵在他张贴的大字报面前对他进行长时间的围追指责、推推搡搡，甚至进行人身侮辱，包括如用浆糊在他背上粘贴小字报等等，污蔑他恶意诅咒伟大领袖。当时的场境使我想起仿佛几百只蚂蚁在拉扯着一只垂死的蟑螂，使他体力不支，人格上受到莫大的耻辱。

如聋似哑的校领导也故意不出面劝阻。张友白老师又是个四十多岁单身未娶的“右派”光棍。事发后，同事们个个对他疏而远之、唯恐避之不及。真所谓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者有之，鲜见同情相慰者。他心中的冤屈无人可以倾诉，致使他心理崩溃、痛不欲生。于是，当天晚上，(1966年7月12日夜)张友白老师在音乐室楼上教师宿舍里，躺在自己的床上，把两个电线夹分别夹住自己的左耳和右脚，然后按下电键自杀。第二天早上，当同室的老师发现时，他的尸体已经僵硬。

第二天白天，当火葬场的两名运尸人用担架抬着裹着白床单的张友白老师尸体，走过长长的校园大道时，全校的师生都惊呆了。(不知昨天围攻他的学生们此时作何感想。)我们高三全体同学都拥到三楼窗口，默默目送着这位令人仰慕的老师走向他的最终归宿……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担架上那白色床单下凸显的张老师瘦小的身形。

(如图转载的是文革中一张“批判”教师的老照片，看上去形式还是属于相当“文明”的)

印度圣雄甘地说过“萌自杀之念易，而行之则难。”不难想象张友白老师当时走投无路、最终决定结束人生前的锥心之痛。

这件事发生距今已经四十多年，那个无辜的冤屈的生命早已经化成了空气中的尘埃。然而，让人唏嘘的是，现在的人似乎已经丧失了对于此类沉痛事件的追忆，什么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已经化为历史长河中无足轻重的沙粒和

烟尘。似乎过去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现在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将来也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甚至于连文学界也开始装聋作哑。

文化大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对每个中国人灵魂的拷打，一些人更麻木了，一些人更怯懦了，一些人更残忍了，而更多的人由盲从开始反思，由单纯开始觉醒。

文化大革命也是大浪淘沙。尤其对于我们这些处于价值观逐渐成熟阶段的老三届青年，接受过十几年系统的共产主义“革命教育”。但是在残酷的岁月中，许多人的思想终于倾覆了，犹如凤凰涅槃。

在以后的改革开放年月里，四百万“老三届”中，有些人学会了独立思考，如王安忆、易中天等；有些人从困境的磨练中学会了奋斗与创业，如张艺谋、姜文、姜昆等；有些人开始思索历史脉络与社会变革，如王小波、何亮亮、北岛等；有些人则学会了远远地躲避政治；有些人则企图千方百计地与文化大革命摆脱干系而不能自圆其说，如大文人余秋雨；然而，有些人却变得更加冷酷奸诈、甚至张狂得肆无忌惮。例如为富不仁、声称“只为富人造房”而广受网民声讨的房地产大鳄、“优秀共产党员”任志强。他们都是老三届，可思维走向各不相同。

而我不希望人们忘记，在几百万个被暗算、被蒙冤、下场悲惨的孤魂中，有一个与世无争的优秀的教师叫张友白。他的杰出才华曾经启蒙过无数个学子，使他们在学上顿悟、成功。甚至改变了许多年轻人的人生轨迹。实在是功德无量，功德无量。

忘记历史，耻谈劫后教训，历史终将重演。

十六. 悼念名师毛天锡

恩师毛天锡是我们全班一致公认的最为优秀的老师。当年，他五十不到，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身材高大，步态矫健，倜傥潇洒。上化学课风趣幽默，非常生动，讲课析缕条分、简明易懂。他是二级教师，虹口区很有名气。（凡是教育内行人都知道，六十年代教师是大、中学统一规格的，中学的二级教师凤毛麟角，相当于今天的特级教师。）因为他的讲课感染力之强，所以我们班级中酷爱化学的同学甚多。毛天锡老师对教学极为认真敬业，堪为师表。高三总复习，他的脚骨折。他硬是一瘸一拐坚持上班，还要撑着拐杖上三楼。使许多同学非常感动。尤其是张行同学，每天坚持要把他背上三楼。后

来，一些身高马大的同学也争相效仿，我只记得陈万程也是其中一个。毛天锡老师身高一米八左右，要把他沉重的身躯背上三楼，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足见学生们对他的深切爱戴。今天的学生，对优秀老师能够如此体贴入微、涌泉相报者，已经比较少见。直到今天，我们只要一讲起他，有机化学课上他那句风趣的“布特列洛夫先生教导我们…”一直被大家传为美谈。文化革命中，正是这句话被作为他蓄意贬低“伟大领袖”的罪状之一，那时红卫兵发言的第一句就是“伟大领袖教导我们-----”。

年轻时，他曾在美军顾问团当过翻译，英文极佳。与我们班的物理老师许悻和（号称英文活字典）是至交。57年反右之后，知识分子人人自危、噤若寒蝉、互相提防。而他们俩常常用英文交谈，而且，即使懂英文者也不知其所云，因为他们说的英文中夹杂着许多苏格兰方言。大字报“揭发”他曾经私下对朋友说，他的身材之所以高大，就是因为年轻时在美军顾问团吃了不少牛排的缘故。那时，美军顾问团每顿吃饭时除了其他西餐，规定每人只有一块牛排，因为他的胃口好，人又特别瘦。被美国上司特许吃双份牛排。于是，上述种种“污点”，使他成为卖国求荣、崇仰美帝、历史反革命的如证铁山。



以上本人所述均是 66 年文化大革命大字报中“揭露”出来的所谓特大内幕。

因为上述历史问题和“现行罪状”，他在文革中被关进阴暗的牛棚“反省、汇报、劳动”不准回家。长达三、四年之久，直到后期，因为病重，才被放出，重睹天日。由于长期精神压抑，受尽屈辱。出来不到几个月，他就因患晚期肝癌溘然长辞了。（右图毛老师肖像是我在 57 届校友寄给我的毕业照中的局部截图，与 1966 年相比，他年轻得多。但那种

睿智长者的特有风度一直深深埋藏我们的心底，无法忘怀。）

单纯的知识分子正如歌德所说：“他们通晓事理，但都有几分傻气，不知道明哲保身。他们向庸俗之众吐露了自己的见解和真情，只落得在十字架和火刑堆上丧命。”

毛老师的遭遇仅仅是文化大革命中老知识分子一个缩影。这映射出极权下良知的彻底泯灭，一个人的公众形象居然可以被任意扭曲，以至于最终失去人身自由、人格被肆意践踏，直至肉体被消灭。

历史不会自动走向完美，除非有一种具有人类普世价值观的制度去制约强权。 除非

有一种公正的、独立于政府的强势社会舆论去监督它。否则，历史将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悲剧。所谓群众，在本质上是随波逐流的、容易被蛊惑、煽动甚至有时会变得残忍无比。

极其赏识毛天锡才干的老校长施纫秋（一个解放前就追随共产党搞革命地下活动的豪门小姐）由于一贯执行特别器重优秀教师的领导风格。作为一名“阶级异己分子”的共产党员，在文化革命中的遭遇比毛老师更加悲惨。请看下文。

十七. 校长施纫秋之死



我们的校长施纫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是新沪中学的又一个悲剧。根据网上查阅：施纫秋(1921～1970)，崇明县人，一位富家千金。1941年在沪江大学读书时就加入中共。解放前以教书为掩护，曾经担任中共松江、青浦、金山地下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为了革命，她把所得的遗产献给党组织作活动经费。解放初期，她在每月的工资中只留下一小部分钱作为自己生活费，其余作党费上缴，款占全县党费的一半。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却先被定性为“革命的同路人，后来定性为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走资派”。

六十年代初（当时我们刚刚跨入初三）施纫秋来到新沪中学先担任副校长，不久就担任正校长。可以说她受命于反右运动后新沪教育质量极其困顿时。作为多年的教育内行的她，来新沪中学辅佐根本不懂行的陆某。至少在学历上完全称职，更不用说解放前她长期就有担任过教师、副校长的丰富阅历。

作为学生，我们对她的了解不多。外表看，施校长眉清目秀、和蔼可亲。每次全校大会发言，她给人的印象是软声细语、谈吐颇具文采，不说空话套话。

作为几何课代表，我经常来往于教师办公室。时红楼各个教师大办公室是相互串通的，所以我可以穿梭于各个教研组之间。经常看见施校长总是“泡在”教师办公室，和某位教师促膝谈心，而且对象绝大多数是一些深受学生爱戴的优秀教师，如毛天锡、谢寅生、浦新墨、许恽和、纪民、林得连等。施校长深入群众、极其器重人才的领导作风可见一斑。也许正是这种风格使她在教师中享有威望和人气，也许

正是这种人气使某些人自惭形秽。以我猜度，她在文化革命中的悲惨结局不可能与此毫无关联，虽然可能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十几年后，我回母校任教，老教师们对她的评价都相当高，几乎一致认为她是一位干练、务实的好校长，对她的被迫害致死感到极其惋惜。

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执行“反动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当权派和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66年底开始，她被红卫兵长期囚禁，隔离审查，不容许回家，长达两年。据当年曾经看守施校长隔离室的十三岁的初中“红卫兵”（我的前妻）告诉我，施校长对她们红卫兵都挺和气，说话不多，但平时还是比较乐观的。除了写检查，只是埋头看书。据前妻说，工宣队每次对施校长审讯时口气都很“凶”，此时，她天生的一双大眼睛炯炯逼人，表现出一种长者的威严和永不服输的自尊。一次，工宣队在审问她时，放了一段她女儿口述的录音：“妈妈，早点交代吧，交代了就可以回家了…”这显然超过了她的心理承受的临界点，她终于忍不住了，眼泪一滴一滴地淌了下来。

冬天来了，他女儿送棉被来。她激动地趴到窗口上张望，想看看长期不见的女儿。工宣队叫来几个男红卫兵把她硬拽下来，她居然表现得异乎寻常的倔强，即使红卫兵拼命拉住她的头发，她仍旧死死地扳住窗框，后来，为了防止她自杀或逃跑，每天晚上有两、三个女红卫兵轮流值夜班，与她同睡一屋。一次，我的前妻值夜时例事”来了，被施校长察觉了。第二天早上她醒来，发现自己枕头下整整齐齐地放着一叠卫生纸。她没有告诉其他红卫兵，但第一次觉得施纫秋似乎不像工宣队所说的坏人。

在隔离期间，她的女儿到外地插队落户去了，做母亲的更加想念女儿了，她变得郁郁寡言。不久，她终于被从隔离室放出来了，但工宣队仍旧“勒令”她在校监督劳动。一天晚上，疲惫不堪的施校长回家，终于从信箱里拿到居然没有和她“划清界线”的女儿来信。（那时，年轻人与牛鬼蛇神的父母“划清界线”的现象司空

见惯。)她捧着女儿的来信,看着看着,由于悲喜交加,过于激动,引起心脏病突发。

据说,送到医院不久她就气绝谢世了,年仅49岁。

1978年,施绉秋获得平反,游戏结束了。

同一个人,过去是忠诚的战友,一夜之间就被定义为仇敌,何其荒谬?在那个红色恐怖的年代中人性泯灭,丝毫没有人道可言。怜悯就是背叛,荒谬就是正义,愚昧就是忠诚,革命就是暴力。我相信,如果这样的残暴和荒谬发生在马克思逝世之前,马克思本人也会断然放弃“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口号。毫无制约的专制加上暴力,可以违天悖理、无法无天、丧尽天良。

季羨林说过:“我痛恨自己在政治上形同一条蠢驴,对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场残暴、混乱、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蒙羞忍耻、把我们国家的经济推向绝境、空前绝后的年代至今还没人能给一个全面合理的解释的悲剧,有不少人早就认识了它的实质,我却是在“四人帮”垮台以后脑筋才开了窍。我实在感到羞耻。”

文化大革命终于被中国淡忘了,而且人人也不想去回忆,更加不想去总结教训,示警后人。就像一个得过大病、几乎临终但又活过来的人,以后根本不去想想当初为什么得病,以及如何防止第二次临终。呜呼哀哉!一个没有反思、只要“面子”的民族是绝对没有未来的民族。

十八. “战斗小组”

全国学校开始响应中央“停课闹革命”指示,我们学校也不例外。老师的大部分已经“靠边站”, (除了少数成分红五类的年轻教师)班主任周老师也被大字报揭露,说他是大学毕业后不服从分配,不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逃兵”。(一年前,他在主题班会上慷慨陈词、大谈“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神情如今荡然无存。)在无政府状态下,班级群龙无首,学生们纷纷组织了所谓的“战斗小组”,都是自愿结合,当然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剩下几个不被接纳者,往往是成分不好的同学。为了不被指责为“逍遥派”而成为众矢之的,黑五类子女们也不得不凑成所谓的“战斗小组”。我、陈利华、张焕樑、黄玉云、郑琬华五个人本来就是一个小组的同学,也是黑五类子女之列,

均属处理商品。于是，也像模像样地组成一个战斗组，名曰“挺进战斗组”，至于向何方挺进，只有耶和华知道。

我们中，陈利华是在狱的历史反革命的儿子，（他的父亲曾经是解放前有名的“新闻报”编辑、“反动文人”。）张焕樑是大资本家儿子（他的父亲创办了上海某大型机器厂）、郑琬华成分是小业主、黄玉云家庭身份不详，总之也不是什么好果子。至于我，大哥是右派分子，（文革后右派平反，大哥平步青云，加入了把他贬下农村二十年的共产党，当了宝山县副县长。历史真是一本凤鸾颠倒的糊涂账。）据后文化大革命时左派同学翻阅我的档案后，有人私下告诉我，说我大哥解放前是“大学里的三青团”（相当于共产党下的共青团）。幸亏父亲早去世六年，否则，问题就更大了，因为父亲十六、七岁就参加北伐军，标准的国民党早期党员。（如果父亲在世，今年已是 109 岁了，我是他的最小儿子。）父亲甚至当过浦东周家渡地区的民团长。记得母亲告诉我，由于父亲当年在浦东不畏当地恶霸，很有点名气，所以他在浦东的朋友很多。解放后他从不去浦东，怕被熟人认出，惹出麻烦。有一次医院去浦东巡回医疗，他也是带着墨镜，压低帽檐，去了一天，他就借故回浦西了。幸亏他 1960 年去世，否则我们家的遭遇也肯定惨不忍睹。

话说我们这个“战斗组”，设在中小三楼一间教室里，只是应景象征性地写过一两张大字报。基本上非常清闲，也没有人来打扰我们。主要以清谈来打发时间，但也帮帮其他战斗组抄写大字报，而且几乎都是我抄录，这使我两年中毛笔书法大有长进。



（旧照片：摄于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满目疮痍的南大楼下。请看一群表情压抑的黑五类子弟，从左至右：张焕樑、勾文海、黄欣、陈利华、我。）。

至于我们隔壁的“战斗小组”（刘大为、马珠、李佩萍等）她们的战斗组设在中小二楼，尤其是极左分子马珠，仗着自己是红五类子女、左派，往往用鄙视的目光看待我们。有时甚至隔着窗户对我们大声奚落、冷嘲热讽。

改革开放后，陈利华曾经做过工人，也担任上海运动器材厂副厂长，退休前是上海华东理工大学的科研人员。张焕樑曾经插队落户，后来分配在上海城市建筑设计院，通过奋斗，成为一名资深建筑设计师，经常出国考察。这两位数理化尖子可说是得其所哉、功成名就。

我们的“战斗组”里只有绰号“阿娘”的郑琬华时运不济。（她是我们的班级女生中的成绩佼佼者。）她插队落户后，在外地工厂工作，工厂倒闭，待退休回沪，工资微薄，住房简陋，但是他们夫妻相当乐观。一次大热天，我带着礼物和勾文海去看望她时，十平方米的房间里，她和赤着膊的丈夫正在兴致勃勃地打牌，桌子上放着半只西瓜，挖了大洞的瓢内插着一枚调羹。他们在困境中的自得其乐使我倍感意外。她生病时，我也捐过几百元钱。勾文海的妻子黄玉兰（她也是我们同年级不同班的六六届同窗）特别关心我们班这些有困难的插队落户后回沪的女同学，常常热心地多方为她们斡旋，为她们介

绍临时工、为她们的子女找工作、介绍对象，等等，此是后话。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掘壁洞。今天，历史正在以另外一种不同的形式重演。社会上的许多现象，如在大城市农民工的子女入学难、门槛高的问题，十多年来一直杳无音信或者说政府干脆不作为。又比如，有人观察到北大的计算机系大学生，1997级本科生中有一半农民子弟，而到了2001级本科生已经基本没有农民子弟了。这又是龙生龙，凤生凤的新版本。其他问题，更是不胜枚举。

人，生来平等，这个道理不仅在欧美是常识。我们的邻居俄罗斯的国民经济增长远远低于我国。可是，他们联邦的地方政府却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公共领域，从而建立和维持了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让退休、失业、儿童、学生等弱势人群人人都切实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在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伟大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率在各自居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生活质量上显示出多么巨大的反差。



如图是网上刊登的最新照片：你见过这样的小学教室吗？至今，我国有相当多贫穷农村的教育现状就是如此令人心碎。

最近报纸披露，深圳地方政府暗中为金融高管子女的中考加10分投档录取，而且已经实行多年，引发了社会大争论。这种事在封建社会

科举制度中也是无法容忍的行为，即使在现代中国也是触犯法律的丑闻，可见利益集团的触角早已无孔不入地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几年前，我曾随虹口区教育参观团在安徽凤阳考察过一所普通的省重点中学，据我的所见所闻和校长介绍，农村孩子学习极其刻苦。甚至晚上学校十点钟熄灯了，许多学生还拥堵在昏暗的公共厕所里复习功课。但是，由于教学条件差、优秀的中学师资都因为工资收入低而大量外流到大、中城市。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农村学生高考录取分数线又比城市高得多，导致一般的省重点中学的高考升学率也仅30%左右。更不用说农村的一般乡镇中学，普通的农家贫苦孩子想要脱颖而出，简直难如登天。中国的国民经济超乎寻常的增长率举世瞩目，我们城市的面貌现代一流，高楼豪宅如雨后春笋，电视里天天歌舞升平。然而国富民穷，城乡差别、贫富差距之悬殊骇人听闻，基尼指数已经多年超

过了临界值。这难道不值得人们深刻反思：我们正坐在火山上吗？罗曼·罗兰在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中说过：“豪华的表面，繁嚣的喧闹，底下有死的影子。”这话中有深刻的哲理。

然而，在我们国家，房地产国企大亨、年薪七百万的任志强居然极其狂妄地声称：“我们本来就是为富人造房的。”这种寡廉鲜耻之辞简直使人出离愤怒。

然而，此人居然年年都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实在令人作呕。

十九. 有枪必有炮

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所谓的“牛鬼蛇神”被红卫兵纷纷打到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文革用语）抄家、批斗之风盛行于华夏大地，自杀人数不断攀升，单我们弄堂里就有七、八家被抄家，邻里屏息谛听：呵斥、咆哮、嚎哭、抗辩，有时甚至有一些沉重的家当连续扔出窗外，砰然碎裂，殴打的声响惊心动魄。

惶惶不可终日者有之，墙倒众人推者有之，痛心疾首者有之，抄家发财者也有之。尤其是所谓历史上有“污点”的知识分子犹如被鹰犬追杀的兔子一样度日如年。许多“牛鬼蛇神”天天深感危如累卵，当他们感到日暮途穷、生不如死之时只能选择自杀，渴望一了百了。

我亲眼所见的近距离的自杀现场就有两次，一次在人头攒动的上海永安公司门口。当时我正与李兆钟、陈利华、文海在南京路上边走边谈。突然隔壁的上海医药公司（现在搬到永安公司对面了）十几层楼上跳下一名自杀者。只听到很沉闷的“嘣”的一声，那人摔到二楼向外挑出的宽大的厚玻璃平台上。“有人自杀了！”几千名路人都同时驻足仰头。顿时，人们仿佛凝固了一般，熙来攘往的南京路就像定格的电影镜头。

第二次，我到苏州河边的河滨大楼去看一位朋友，正走到一楼与二楼之间的楼梯上，突然听到很闷的一声：“咚！”就像包着厚毯子的西瓜落地的声音，我从破碎的玻璃窗探头出去一看，吓得我大叫一声，原来那位跳楼自杀者正在我正下方两米处，脑袋迸裂，旁边是流出的一滩淡粉红泛灰的脑浆，还冒着热气。如此近距离的亲眼目睹使我怵目惊心，终生刻骨铭心。从此以后几十年，凡是马路上出了车祸，行人纷纷围上去看热闹时，我总是唯恐避之不及、匆匆离场。

那个年头，（66 年到 68 年）“牛鬼蛇神”的自杀事件天天都耳有所闻，司空见惯。几乎每天会听闻谁家有人失踪或自杀：上吊、割腕、开煤气…。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几天，单单上海音协就有四对夫妇由于被政治“追杀”而导致精神绝望自杀。至于全国的资产阶级家庭，则从六十年代文革事起，除了贴上招致迫害的剥削阶级标签，家当资产一律被国家没收或冻结了。

当时，游外滩时人们常常可以看见黄浦江上浮有投河自尽的死尸，这根本不是什么新闻。红色恐怖笼罩中国广袤的土地，而愚昧无知的“革命大众”中广泛流传的一句对政治性自杀者的结论性口头语：——“自绝于人民”。

可是，那些自杀者果真都是自感“罪孽深重”而结束生命的吗？令人无语的是，他们中有许多人甚至在解放前暗中帮助过共产党、有些人为此而坐过国民党的牢；现在，



他们因为被革命的“大众”唾弃而感到极其冤屈、绝望。也有的人因为解放前在国民党政府里担任过职务、参加过党团而获罪，如今则更加被穷追猛打、有口难言、自尊心太强的人更容易失去苟活下去的勇气。

现在，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早已为人们所渐渐淡忘，甚至被一笔带过，主流舆论也有意无意地掩盖文化革命的血腥历史。有些年轻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 1966 年到 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对于老百姓、尤其是知识分子究竟意味着什么。现在有些青年人甚至无法相信我们所说的一切，或者干脆怀疑我们的描述得是否过于夸张，有的年轻后代对长辈们在反右、文化大革命、插队落户等等亲历中辛酸的回忆付之淡然一笑：他们觉得难以置信！世界上哪会有如此荒谬的事？对 80 后、90 后的青年来说，中国的近代史多数是文盲。

这种对昨天历史完全麻木的社会现状，乃是一种跨世纪的中国式悲哀。

不过，那个年代，“牛鬼蛇神”中也不乏心理素质极好的人。（请注意：这是极个别的例外。）我们弄堂里有位好好先生，姓俞，五十多岁，宁波人，带着一副深度近视眼，在工厂里当一名普通会计。他不仅是弄堂里的象棋大王，而且满腹经纶。但不管遇到大人小孩，他都会非常和气地打招呼。他的三儿子和我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67年夏天的一天，造反队到俞家“抄家”，声称根据档案他解放前许多年前曾经当过国民党区党部书记。而且在抄家撬开他家地板时又找出几粒旧子弹壳。于是，把他押到弄堂口，让他站在高凳上，颈脖上挂上大牌子，进行群众批斗。围观者几百人，气氛空前紧张。手持长矛的工人造反队不断喊打倒俞某某的口号。可是他一点儿也不紧张，微微低着头，态度依然相当谦和平静，仿佛面对子孙的纠缠。

“你是国民党头子吗？”

“是的，是的。”他点点头。

“你杀过共产党吗？”

“kimmegou.!”（宁波话：那是没有的哦。）

由于他语气平静又相当诚恳。几百名围观者都被大大地逗乐了。

显然，他的“良好”态度使造反队员处境非常尴尬和被动。造反队员们一阵更加激愤的口号后，一个造反队员又质问他：“那么，你家的子弹是哪里来的？”他又换用宁波普通话回答：“大概是我欧子波仔强捡来地。”（翻译：大概是我儿子靶子场捡来的）众人哄笑声一片。

一个造反队头头不甘罢休，蛮横地大声断言：“老实交代！有子弹就一定有枪！”紧接着，我站在后排大叫一声：“有枪就一定有炮！”听到我故意捣蛋式的反嘲，众人有的笑痛肚皮、有的起哄，有的为我的大胆担心。造反队员们顿时大窘，开始端着长矛拼命寻找谁在捣蛋。于是，我飞快地逃进弄堂里，幸亏居委会主任丁阿姨拼命用双手拦住造反队员：“小孩子，不懂事，算了，算了。”

事后回想起来那段经历的确非常后怕，要是造反队员真的抓到我，那磨得尖尖的长矛可不是吃素的道具。细细思量，那可怕的下场至今使我不寒而慄。

其实，这也是托我父亲在天之灵的福，使我逃过一劫。因为，五十年代丁阿姨生重病要开刀，她家经济困难。幸亏我父亲在公济医院很有名望，在医院“社会福利科”中为她多方斡旋，（这个部门文化大革命后就被取消了）所以医疗、手术费用减免了一大半，

丁阿姨对我们家一直感恩不尽。所以，她的竭力阻拦造反队员追赶我，完全是出于对恩人后代的护犊之情。

我的父亲一向乐善好施，曾经帮助过许多邻居，弄堂里的“老娘舅”，口碑颇佳。60年父亲因癌症去世，追悼会大灵堂里，单单邻居就来了几十位。有好报，时候未到，先父积德，子得报。但事后我想想后果，依然觉得恐怖。

至于前文所述的俞老先生的“耐压”能力如此之大，仅仅是“牛鬼蛇神”中的特例。不能视为饭后茶余的笑料，而是“革命”制造出来的一段欧·亨利式的黑色幽默。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往往是胜利者的历史，历史书上对事实的材料如何取舍，什么应该掩盖，什么可以文过饰非，甚至于什么可以颠倒黑白，都带有极大的政治取向性。所以，历史书的不可靠程度要远远大于文学作品。纪实文学怎样才能够做到可靠呢？我认为，知识分子、尤其是历史学家要学习司马迁，秉实写真，不要企图粉饰、淡化什么，更加不要故意歪曲、遮盖。这样，反映在文字中的历史生活就比较真实可信，才具有警示后人、避免历史重蹈覆辙的作用。今天，为了使我的纪实文字能够做到准确、可靠，我的良知告诉我，亲历目睹者，有义务真实地用笔再现“文化大革命”的亲历史实。我们老三届这些人已经大多年过花甲，“新三届”人们又忙于维持生计、多数也缺乏文字叙述能力。我深感历史之沉重落在自己一代身上，我们这些人应该乘退休后精力尚存、记忆未泯之时，用自己的笔，让子孙后代了解我们所亲眼目睹的一切。再现真实的历史，留下昨天的教训，这是一件义不容辞、功德无量的善事。

直至今天，已经近三十年了，巴金老人倡导的“文化大革命历史博物馆”迟迟没有建立，也许政府丝毫没有打算建立。当局的沉默和不作为，说明了什么，回避？忌讳？毫无意义？还是时机尚未成熟、留待后人评说？实在令人费解。然而对身临其境的人们来说，这的确确实是一段血腥的历史。回避和总结历史教训是一种道义上的犯罪，不可原谅。

任何回避粉饰、故意让下一代遗忘这段历史的人，都是对被虐待者、含怨而死者的亵渎，对暴政的宽恕。

文革期间部分著名人士自杀名单:

（以下摘录的仅仅是最有名气的人物，不包括受辱后致病而死其他名人。如：彭德怀、刘少奇、贺龙、田汉、潘天寿、盖叫天、周信芳、郑君里、章伯钧、赵树理、邵荃麟

等。)

邓拓 人民日报总编辑，杂文家。1966.5.17 服毒致死。

吴晗 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1968.10.11 狱中自杀，死前头发被拔光。

范长江 名记者，曾任人民日报社长。1970.10.23 在河南确山跳井身亡。

翦伯赞 历史学家，1968.12.18 与妻子戴淑婉服安眠药致死。

上官云珠 著名电影演员，1968.11.22 病中跳楼身亡。

容国团 世界乒乓球男单冠军，1968.6.20 北京龙潭湖畔槐树上吊自杀。

姜永宁 乒乓球国手，1968.5.16 在拘留室上吊自杀。

傅其芳 国家乒乓球队总教练，1968.4.16. 在北京体育馆自缢而死。

熊十力 国学大师，1968.5.24 绝食身亡。

顾圣婴 世界著名女钢琴家，1969.1.31 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

严凤英 著名黄梅戏演员，1968.4.8 服安眠药死于医院，传死后被解剖，在体内找发报机。

老舍 著名近代文学巨匠，1966.8.24 跳北京太平湖溺死。

储安平 前光明日报总编，大右派。1966.6.7 传跳海自杀或被红卫兵打死。

李翠贞 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1966 开煤气自杀。

沈知白 音乐理论家，1968 自杀。

傅雷 著名大翻译家，1966.9.3 与妻子朱梅馥双双上吊自杀。

金仲华 老报人，上海市副市长。1968.4.3 在书房上吊自杀。

陈梦家 新月派诗人，考古学家，1966.9.3 自杀。

叶以群 文艺理论家，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等。1966.8.2 跳楼身亡。

李立三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1967.6.21 服毒身亡。

萧光琰 著名化学家，1968.12.10 被拷打后服安眠药身亡，妻女随即同日服药自杀。

杨嘉仁 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1966.9.6 与妻子程卓如开煤气自杀。

刘盼遂 北师大教授，时间不明，被打死后，尸体浸水缸诬为自杀。

闻捷 著名诗人，1971.1.13 用煤气自杀。

言慧珠 著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菊朋之女，梅兰芳之徒，俞振飞之妻，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 1966.9.11 在浴室上吊自杀。

田保生 国际法学家，时间不明，不堪凌辱与妻子双双自杀。

高仰云 天津南开大学党委书记，1966 被红卫兵毒打后跳河自杀。

俞大因 北大生物系教授，丈夫曾昭伦，时间不明，不堪凌辱自杀而死。

周瘦鹃 鸳鸯蝴蝶派作家，1968.8.12 在苏州周家花园跳井身亡。

张宗燧 物理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张东荪二子 1969 清队时因对毛的物质无限可分有异议被迫害，北京中关村中科院宿舍中上吊身亡。

顾而已 著名电影导演，1970.6.18 了解蓝苹历史而备受迫害，上海天马电影厂工具棚上吊死。

刘绶松 武汉大学教授，1969.3.16 批斗后与妻子杨嘉仁自杀身亡。

罗广斌 小说《红岩》作者，1967.2 跳楼自杀，另一说是他杀。

冯大海 作家，时间不明，跳楼身亡。

许政扬 文史学家，南开大学教师。1966 不堪凌辱自沉住处旁小溪。

田家英 毛泽东秘书，1966.5.23 在毛泽东书房走廊上吊死亡。（有文披露为“他杀”）

饶毓泰 南开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1968 上吊身亡。

李广田 云南大学校长，著名作家。1968 跳河身亡。

李达 哲学家，中共一大代表，1966.8.24 自杀。

谢家荣 地质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时间不明，自杀而死。

赵宗复 太原工业大学教师，时间不明，跳楼身亡。

姚溱 中宣部笔杆子，1966.8 被康生秘书李鑫恐吓后上吊死。

陈笑雨 文艺评论家，笔名马铁丁 1966.8.24 游街后跳北京龙潭湖自杀，另一说为投永定河。

王重民 史学家，胡适弟子，北大图书馆学系主任，1975.4.16 自杀。

海 默 电影剧作家，1967 在地下室陈尸 7 天后，被指自杀。

陈又新 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1968 跳楼自杀。

小白玉霜 著名平剧演员，时间不明，毒打后吞食安眠药自杀。

李平心 历史学家，1966.6.15 自杀。

周小舟 前湖南省委书记，1966.12.25 在广州被批斗后服安眠药自杀。

杨 朔 著名散文作家，1968.8.3 服安眠药而死。

郭世英 郭沫若之子，北农大学生 1968.4.22 说毛泽东思想也应该一分为二、八个样板戏未必没有值得改进的地方等等。导因是他跟女朋友打电话时用了英语，当时是为了练习英语口语，被同学听见，说他里通外国，把他抓了起来关押在学校里，遭批斗后从关押处跳楼身亡。

郭民英 郭沫若之子，音乐学院学生 1968 郭世英死后不久自杀。

远千里 诗人，河北省宣传部副部长 1968.6.22 关押时用刀片割颈动脉而死。

刘克林 《大公报》名记者 1966.8.6 在中宣部堕楼死另说是他杀。

孟秋江 作家，前《大公报》名记者，1966 在上海跳楼自杀。

姚启钧 华东师大教授，1966.8.4 日 跳楼身亡。

舒绣文 女影星，1968 年在监狱中自杀身亡。

黄绍闾 著名民主人士，1966.8 自杀。

张琴秋 中国纺织工业部副部长，1968.4.22 被诬蔑为叛徒，跳楼自杀。

郭兴福 南京军区步校教员，“郭兴福教学法”创立者，1969.1.30 杀死三个孩子后，与妻子双双自杀，获救后被判死刑。（据说现在还活着）

阎红彦 云南省委第一书记，1969.1.7 服安眠药自杀。

赵慧深 著名表演艺术家，在《雷雨》中成功饰演繁漪闻名，1967.12.4 含恨自杀。

马连良 京剧表演大师，1966.12.16 在天津着全副剧装服毒自杀。

应云卫 电影艺术家，1967.1.26 自杀（另一说是猝死于游斗的车上）。

陈 璘 蒋介石大秘书陈布雷之女，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全国妇联执委，胡耀邦为她题写过“家庭叛逆，女中英豪”，1967.11.19 从十一层楼上跳楼自杀

张宗颖 天津社会学家，张东荪的三儿子，1966 妻子吕乃朴遭到“斗争”后一起自杀。

陈同度 北京大学生物学家，1968.8.28 “清队”中被折磨，服毒自杀了。

国 璋 陕师大地理系主任，1966.8 与妻子范雪茵双双上吊自杀。

陈昌浩 原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四方面军总政委，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1967.7.30 服大量安眠药自杀。

张绍昌 著名药理学家，曾执教哈佛，演员陈冲的外祖父，时间不明，自杀。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最近讲话中说：“青年人对过去这段大清洗的往事所知甚少”他还说“更为重要的是，让年轻人不仅掌握历史知识，还要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能够共同体会和感受俄罗斯历史上这次巨大的浩劫。”

对比中国，历史根本回避过去。我们有时在朋友见面时谈到一些政治运动的往事，在场的年轻人便表现相当惊奇、怀疑：“能有这样事么？”、“有这么残酷？”、“他们为什么这样？”，表现得非常幼稚。而惊奇之后，这事也就不再放在心上了。



二 十. “病退”与勾家纪 事

1968 年夏，我和勾文海、李兆钟等同班十几名六

六届高中男女同学分配到到崇明新海农场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还是属于比较幸运的，而其他同学被分到安徽、湖南、黑龙江边境等地，则更加艰苦。至于红五类同学，只要有些理由，就都分配在上海工厂。

农场实行宿舍制，与贫下中农场员混居。一个十二平方米的空间挤着六个人，基本上四个学生、两个农民，三张上下铺的铁皮床。根本没有浴室，酷热天也只能端盆水擦擦身。也没有厕所，十几间宿舍只有一个臭气熏天的简易茅草棚权作厕所。所谓马桶就是仅有的一个一尺多高的门字形木头架子，下面就是大粪坑，大便时我们仿佛是一架不俯冲的轰炸机，如果“坠弹”动量过大、过猛，溅起的极品农家肥难免会使我们“自作自受”。

(照片：六年前我们重访旧地，这尊茅厕在我们离开三十年后依然如故，只不过那根横档已经油光瓦亮，简直是茅坑界高寿的奇迹。只不过现在茅草棚盖上了厚帆布，比过去现代化了。)

当我们背着沉重的行李走进狭窄的宿舍时，等待我们的是几张锈迹斑斑的旧铁皮床，而上级刚刚发下来给我们插队落户青年的崭新的铁皮床已经全部被农民兄弟们捷足先登、占为己有了。这就是我们亲身体会到的第一次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以上 1968 年旧照片是在刚刚到达崇明新海农场场部的我们班级插队落户的男同学留影；右起是池逸之、我、李兆钟、吕林根、陈万程、张焕樑、勾文海、吴大中。从

照片可以看出大部分同学的表情极为郁闷。以后的许多年，他们理当深造的宝贵年华都被埋在栉风沐雨的田间劳作之中。

我们老一队的党支部彭玉贤书记每次大会一开腔那口地道的崇明话实在让人忍俊不禁：“sou xie (首先)，敬祝 nli (我们)心中 zai hong zai hong (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va sei va sei vava sei (万岁，万岁，万万岁)!”使我们这些听惯了老师普通话的高中生们低头拼命捂住嘴巴，竭尽全力不敢笑出声来，而且最要命的是我们还得要跟着一起喊。而李兆钟、徐渤一些男同学故意大声模仿彭书记崇明腔的响亮口号声那么惟妙惟肖，更加使我们憋得肚痛、差点没得背过气去。

我的身体本来就不强壮，繁重的体力劳动、抑郁的心情使我半年后突发“甲亢”（甲状腺机能亢进），静坐时心率经常高达 180 次—160 次/分钟。饭量猛增，但体重却急剧下降，浑身脱力，无法从事稍重的体力劳动。然而，那些无知的农民无论当面、背后都大声地嘲笑我“只会吃、不会做。”，使我郁闷的情绪雪上加霜，病情加重。

最严重时，每天半夜里会突然发生四肢瘫软、根本无力下床小便。同室的同学陈万程、蒋仲嘉几次不辞辛苦地背我去茅房解手。（后来查阅医学书后才知道是甲亢引起的晚间“阵发性血钾过低症”现象。）然而一到早晨，四肢又渐渐恢复能力了。这种奇特的现象进一步加深了同室农民的怀疑，使我愈加有口难辨、深感委屈。而农场又根本没有医疗条件。

由于病情加重，几经周折，经农场批准，1969 年我被作为上山下乡的“病退”人员，回沪治病休养。完全脱离了与农场的组织关系，成为待业青年。经过一年多中西医治疗，我慢慢得到了恢复了。但文化大革命后期，国家经济面临崩溃，工厂纷纷处于半停产状态。社会失业现象普遍严重。以后四年多我遥遥无期地等待分配工作，一直闲赋在家，日复一日地参加里弄组织的政治学习班。

虽然我与农场的同学们分开了，但我们来



往不断，而且大家经常聚会。自从勾文海到崇明插队落户，他的家庭发生了许多变故。哥哥因私装短波收音机入狱，婆媳矛盾又极为紧张。我的家离开勾文海家很近。作为老朋友，他从崇明来信托付我，希望我经常去看望并帮助他的两位年老的双亲，我一口答应。于是我基本上每个星期都去他家一、二次照应两位老人。（旧照片：左图为72年我在勾家花园门口，我手推的是勾文海留在家里的旧自行车。右图为当时勾文海的父母。）

他的母亲是我校的高中语文老师赵克文，退休在家。他的父亲勾适生是上海市政府高级干部。夫妇俩都是天津南开大学毕业，与周恩来是校友。他父亲是九三学社民主党派成员，解放前一直追随共产党、周恩来。解放后曾经担任市府高级干部，与周恩来之弟



为好友。反右时，因为他对中学数学教材全盘苏联化提出异议等问题，被打成右派，贬为市府参事。以后常常赋闲在家，很少上班。文革后又受到冲击，每月只能领到区区的生活费。但是，毕竟家底尚在，况且仍旧住在花园洋房，他家的生活水准显然高于平头百姓。

对于勾文海的拜托，我理当出力相助，何况二老已经年过花甲。所以每次去他家，我总是帮助他俩干一些体力活，如背米买油、跑腿寄信、有时陪陪他父亲去医院挂号配药。他那慈祥的母亲赵老师对我非常客气和感激，常常留我吃饭，而且经常是一大锅鸭汤，那个年代可说是待客的很大礼遇了。实话说，他的父亲对我也不错，就是政府的大干部做惯了，所以，我总是觉得他未免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执拗。喜欢对我随意呼来差去，视为理所当然，而且毫不考虑对方的感受。

他们家喜欢养猫。一次，我刚进门，他父亲就拿出一个铁簸箕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家猫的尿盆里煤灰用完了，你快去给我找点煤灰来，别忘了顺便带点稻草来啊。”我顿时大窘。那时，周围人家都使用煤气，煤灰难找，稻草更是难觅。再说，我一介书生，又不是家庭妇女，拿着个铁簸箕到处转悠，成何体统？他的母亲看到我极其窘迫的样子，也在旁边开始用天津话轻声埋怨丈夫。他父亲依然坚持着不改初衷：“行的，行的，这孩子挺机灵的。”这使我觉得进退两难、极其尴尬。于是，我不得不说：你给我几张旧报纸吧。

那时，我心里着实有点窝火，心里想：“我是你儿子的朋友，完全是尽义务帮助你们的，你怎么能把我当成你家佣人看待呢。”但是，父辈之命又不得不从。于是，我只得拿着报纸出门，但又不敢往宝安路方向找，（因为那里是我家附近，给人看见多丢人。）只能一路向长春路方向寻找，总算在长春路上一个垃圾桶边找到两个燃尽的煤饼渣，用报纸一包，飞快地往勾家跑。

以后一个星期，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感到莫大的耻辱。我再也不想去勾家了。

但是过了几天，人静下来，气也平了。又想，勾文海是我多年老朋友、老同学，我不能失信于友。于是，第二个星期我硬着头皮又去了。不过，此类事情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也许，他的老母是中学教师，懂得读书人的心理，肯定为此责备过他父亲了。这事，我一直没有对勾文海提起过。近年，才当作笑料说起过。

如今想来，也算是“天降大任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韩信当年落魄时忍辱胯下，日后官拜淮阴侯。如果没有勾父当年对我的触动，说不定还没有我钟恕尧今天的成功呢。不做人下人，焉为人之师。愿他父亲老人家天国安宁。

人近老迈，有时的想法往往会执拗得令人无法理喻。反思自己将来，但愿我们老态龙钟、鸭步鹅行之时，依然有平和、体恤之心。

辛稼轩有名词云：“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年轻人的窘迫愁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愁苦，仅仅是人生道路上必须承受的一个个磨练插曲，因为他们还有希望，还有通过奋斗取得成功的时间、空间和种种可能性。

只有那些既丧失了体力、又失去希望的老人的窘迫愁苦才是最为悲哀的，就像目前农村中、城市里某些孤寡老人的生存现状，劳累了一辈子，但难以享受到社会物质进步带来的正常福利。

二十一. 扬州才子（纪民老师）

恩师纪民老师是我们的高二时的语文执教老师，语文教研组长。是深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之一，也是得到施纫秋校长特别器重的优秀教师。

纪老师在新沪中学人称“扬州才子”，他对逻辑学、诗赋、书法、篆刻历史无一不精。他的上课风格沉稳、吐字抑扬顿挫、不慌不忙。表面上看，仿佛毫无表情。但给人

一种感觉好像老夫子一边讲课、一边在独自津津品味经典、仿佛已经忘记了学生们的存在。他的语法、逻辑学根底很深，上课在分析课文中的“名篇”中常常能够找出不少病句和逻辑错误，甚至对鲁迅、毛泽东文章中的语法错误也敢于直言不讳，后来这成为他在文化革命中被攻击的一条罪状。纪老师的教育方式独特。比如有一次，为了锻炼我们语言的概括能力，他挂出一块小黑板，上面写足足三十多个字，大意是“一位六十多岁的男人，晚年时死了妻子，他和什么人都不来往，也没有人来关心、看望他……”等。要求同学们用尽可能短的文字浓缩上述文字内容。我不记得，自己是第几个举手站起来发言，我站起来回答：“孤独的老鳏夫”，是在几个同学中字数最短的，他大为赞赏，我心中洋洋得意，几乎处于“失重”状态。

他特别喜欢刘大为和我，我们的作文经常被他在课堂里朗读示范。他常常把我们俩叫到“中大楼”他的单人宿舍里，展示他的书法作品和他写的赋，二者的确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准。可惜，对于他写的赋，至今我只记得一句了：“鸛鹤冲天兮临苍穹……”他的赋文文笔古朴，“兮”字颇多，这也正是汉赋的特色。正是受了他的赏识和熏陶，我当时曾经一度立志将来考文史类大学。可是，交通大学刚刚毕业的表哥（我母亲的养子、我心目中的学习表率。）极力反对，说我没出息。他说，只有成绩不好的学生才会考文科，给我当头一盆冷水，于是从此打消了考文史类大学的念头。

如今，刘大为已经成为复旦大学的文字研究的博导教授。而我成为了一名中学的物理高级教师，虹口区高级教师评委。尽管分道扬镳，我并不后悔，但希望成为一名笔耕者的理想至今尚未泯灭。

纪民老师四十多岁，妻子癌症去世，他单身带着一个女儿，平时总是吃食堂。星期天也依然住在学校宿舍，自己烧饭。对于一个大男人，着实相当不容易。外表看他的衣着整洁，但细心的女同学往往瞥见，有时他的衬衫领子似乎好几天没洗。

他的硕壮身材与他极其瘦小的女儿形成强烈的反差。食堂里，他搀着女儿的手去打饭时，仿佛一头大熊牵着小猫。



纪民老师谦和、内向，即使说话也是字斟句酌，明显的不善与人交往。作为痴迷于传统文化的老夫子，显然他是受到那些“政治上要求进步”的教师们冷落的一位。他自己也很知趣，也相当自尊，不愿意、也不屑于屈尊与那些人套近乎。尤其在下乡劳动时，他与那些教师干部总是保

持敬而远之的距离，却会用更多的时间与我们这些普通学生交往。（如图纪民老师的照片是我从 57 届校友那里发来的毕业照中的截图，难以一展他的风姿。）

1969 年到 1972 年，由于我生病整整待业在家三年，正处一生中于最穷困潦倒之时。一天，我在马路上惊喜地邂逅了纪民老师。施礼后，他开口第一句就问我最近在念些什么书，我说最近非常喜欢看看历史方面的书，他的兴致马上上来了：“看过那些书啊？”我说最喜欢《史记》，并且已经通读了一遍古文原版。他马上露出极为意外、又骤逢知己的神色：“好书！好书啊！现在喜欢读这种书的人凤毛麟角了。以后咱们好好聊聊。”由于他当时有事，不便多谈，他当即热情地邀请我改日“光临寒舍”仔细研谈，并且留下他的家庭地址，又约好了时间。

没几天，我按图索骥找到他家。那是一间陈旧的老式公房，的确称得上“寒舍”，从房间内的凌乱无序，可以看出他依然是独身。他非常热情，又是倒茶、又是端椅。

从他口中知道，他现在正在一所初级中学任教，使我顿时极为伤感：如此优秀的语文教师居然会被排挤出高级中学。（文化革命中，批判他宣扬封建文化的大字报为数不少。）可是从他的恬淡的神情和言谈中，我丝毫感觉不出他有怀才不遇之情，依然那么谈兴盎然。然而，当他知道我待业的现状时，他却摇头叹息良久。惺惺相惜，我们内心中都对对方的沦落充满同情。

“《史记》是古籍书，你能够通读，很不容易啊。”他说道。我说大致能看懂，但一些词句根本不理解，只能凭猜测，有时就跳过去看，前后文对照一下，才能知道大致意思。而且书是借来的，看此书的时间不长。“要是《史记》原文在，我就能帮你一把了。”他有些惋惜地说。他又问我，书中印象最深的人物有哪几个，我讲了几个，如蒯通、荆轲、韩信、项羽等。我说，尤其对蒯通劝说韩信的名言“勇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颇为欣赏。



“你的记性不错，到底是青年人啊。”“不敢，不敢”我说，自己有一个习惯，每读一本好书，都要做大量摘记，家里有五、六本厚厚的笔记，反正我有的是时间。“好习惯”他赞赏道。（旧照片：这是我 70 年代在家待业时“穷酸秀才”的写真，）

我说，我还看了不少外国名著，尤其喜欢罗曼•

罗兰、雨果、莫泊桑、哈代、勃朗特姊妹的作品。他极度惊讶：“现在这个时候，你哪里能弄得到这类书？！”

我告诉他，主要是同学中偷偷互相交换，尤其是李兆钟，人脉极广，我们从他那里借到不少好书。其次，文化大革命中，学校图书馆被红卫兵“红上司”占领，各种好书堆得满地都是，有时为了妨碍走路，被红卫兵当作废纸成批卖掉。我们几个好朋友故意与红卫兵套近乎，有预谋地连“借”带偷，弄到一些名著。记得当时，勾文海为了让我们打消道德上的顾虑，有一句斩钉截铁的名言：“记住！我们现在不是偷书，而是抢救文化遗产。”

纪民老师听完以后，我看得出他心情十分复杂，只说了一句：“解放初，我们学校图书馆的藏书量之多，在上海各中学当中，可是数一数二的。作孽呀。”

实际上红卫兵偷盗、霸占的书籍、财物无法计算。比如，我校其中一个红卫兵司令部侧室里就堆满了抄家的物品，一般的红卫兵根本被禁止入内，有人偷偷告诉我，单单他们办公桌上一个两尺多高的明清古董瓷器花瓶里就装满了钱币，那些红卫兵头头每天吃早饭时就伸手往里面掏钱。

中国知识分子一向就是这样善于忍受克己，正如老子所云：“知足不辱”。他们的适应能力比蟑螂更强。只要一点点尊重，一点点慰藉，就安于现状、甚至在忍饥受贫中还能勤勉治学。如果领导稍微赏识一点，甚至于能够殚精竭力地做到“士为知己者死。”

纪老师退休后，我与他失去了联系。地址也不知道怎么也弄丢了，只记得他家大约在广灵路一带老式新村。那时正是我处于结婚、成家、生子、立业的忙碌时期，也是社会变革的动荡时期，纪民老师的暮年生活如何，我杳无音信。如若他至今健在，怕是八十多岁了吧，祈祝他晚年幸福。

其实，在我印象中，我们学校其他年级的优秀语文老师也不少，如谢寅生、林得连、胡秉诚等。在课外活动的讲座中，我们曾经领略过他们的风采。例如胡秉诚老师的“上古文字研究”讲座使我大开眼界；林得连老师的“散文讲座”，我连听两次，他的讲座极其精彩，声情并茂，嗓音圆润而有磁力，剖析散文时引经据典。对我以后作文的提高大有裨益。我至今还记得他的慷慨高论：“熟读《古文观止》，打遍天下都不怕。”文化大革命中，才从大字报中知道，林得连老师解放前曾经担任过“中央日报”专栏编辑。他是早期中共党员，后来脱党不问政治。于是，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定性为“叛徒”、“变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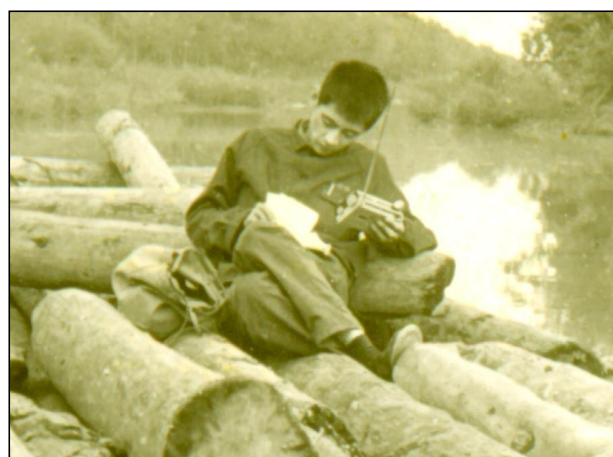
分子”，遭遇很惨。

在成功人士的一生中，一个优秀教师、尤其是高中教师对年轻人的思维成型（包括美学观、辨析能力、社会责任感等等）具有不可估量的言传身教作用。用“人类灵魂工程师”来形容这些优秀教师毫不为过。

二十二. 传奇----政治逃犯

我们都叫他“大江”，他是勾文海的一位亲戚，文质彬彬，与我们同年。和我们几个同学关系相当好，也是我的好朋友。当时，他是一名工厂里的电工，成分“黑五类”子女。勾文海的大哥“私装短波收音机案”之所以“暴露”而被捕，就是发端于他。

大江是一位英语学习的狂热爱好者。但是，六十年代社会上的英语教科书、英语资料中充塞着大量极端左倾的政治语汇，根本不不可能学到真正的英语。多数想要学到正宗美式英语的青年都偷偷地收听美国之音专设的“英语九百句”教学节目。自然，多波段的短波收音机是唯一的收听渠道，而文化大革命中市面上根本严厉禁止生产、出售短波收音机。勾文海的大哥勾文庆是一位无线电厂的技术员，人极聪明，他私下组装了抗



干扰性能颇佳的短波收音机。于是，作为亲戚，大江也得到一台勾文庆私装的短波半导体收音机。这使大江狂喜不已，视为掌上明珠。（图：勾文海左手拿着的就是他哥哥成批组装的短波收音机之一。）

正如巴尔扎克在《欧也妮·葛朗台》中说的那样：“人世间就是这点可悲，没有一种幸福不是靠糊涂得来的。”大江的幸福感持续了没有多久，紧接着，一场与短波收音机有关的“囹圄之祸”降临了。

说来也是劫数，1972年某天，大江的厂里突然发现所谓的“反动标语”，厂保卫科开始排查可疑的作案对象。于是，黑五类及其子女则顺理成章成为主要怀疑对象。当晚，一帮人径直闯进他家，推开大江家忘记锁上的房门，恰逢大江戴着耳机（中央商场买来的、类似于谍报员的那种大型耳机）正伏案在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九百句”节目，而

且还在作记录。这个场面简直是老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里镜头的再版。几个造反队员马上冲上去把他的头紧紧地摁住在桌子上，摘下他的耳机，一听广播内容，即刻“确凿无疑”地认定了大江就是反动标语的作案人。

至于以后如何对待他，我不得而知。反正他马上被捕，暂时拘押在看守所。据大江出狱之后告诉我，侦讯人员软硬兼施、欲擒故纵的诱供方法如何五花八门。（这里我没有必要一一赘述了。）最终，他不得不招出短波收音机来自勾文庆。于是，勾文庆当即被捕，接着公安局又开始排查出一大批与勾文庆来往密切的嫌疑者，基本上都是我们班同学，如程本宁、李兆钟、宋谷春、黄欣等等。

更富有传奇色彩的是，在看守所里，由于大江不堪“船长”的虐待，（据大江告诉我，就是狱霸。被犯人们称为“船长”。新犯人刚进狱，就会被一顿暴打，船长然后掏光你身上的财物，还必须低声下气听命于他的任何要求。据说，这种狱中“规矩”至今依然普遍存在。）一天晚上，大江居然扮装成清洁工，压低帽檐，镇定自若地走出了看守所。

他越狱后，身无分文。现在的青年人根本不清楚，那个年代，即使有钱、没有粮票也得活活饿死。他首先想到，不能够再到任何亲友家去了，毫无疑问，民警肯定在那里等着他。于是，他急中生智，突然想到李兆钟曾经带他去拜访过的一位有名的女翻译家罗玉君的家。（她是中国第一个翻译“红与黑”的著名法文翻译家，1927年去法国留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名女博士。她的译文至今是现在外语大学法文系教科书的范文。）

他进了罗家后，一五一十地讲述了自己的目前境况，据那位老太太事后告诉李兆钟：“那时候我真是吓得浑身簌簌发抖。”尽管，她与大江仅仅是一面之交，罗玉君还是极其慷慨地给了大江十斤粮票和一些钱。（那时候，老年人大约每月25斤粮票。要知道，十斤粮票相当于老太太近半个月的口粮。）于是，大江深深道谢之后，又压低帽檐匆匆离开罗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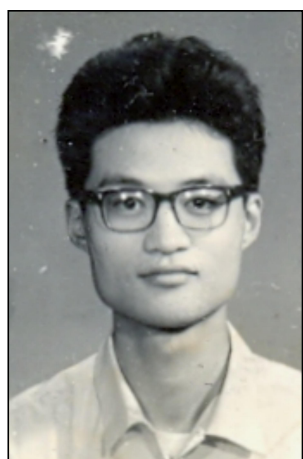
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程本宁（那时他正在上海家化厂当供销员）那天正好到襄阳南路出差，由于厂里出差“饭贴”只有一毛七分钱，也只能到一家小店吃面条，那家生意清淡的小店只有四张桌子。想不到程本宁正对面空桌上坐着的是居然是大江。两人愕然对视，程本宁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是，当程本宁知道大江正被公安局缉捕后，立刻把身上所有的钱和粮票掏给了大江。（要知道，那时程本宁在厂里保卫科里刚刚受到公安局民警的讯查，他非常镇定地矢口否认。他说他与勾文庆仅仅是一般朋友关系，

也否认认识大江，他没有提供任何有效线索，以免牵扯他人、致使勾文庆加罪。）为怕被人跟踪，两人吃完面条后迅速分手。

几天后，大江再次被公安局抓到。由于他已经从狱友中学会了反侦讯能力，他既没有供出女翻译家罗玉君，也没有供出程本宁，而是一口咬定，这些天他是靠马路乞讨活下来的。侦讯人员掏不出口供、明明不相信，也拿他毫无办法。（这些都是他出狱后亲口告诉我的。）

经过公安局调查，最终排除了大江写“反动标语”的可能性。根据他“收听敌台”、“越狱潜逃”两项罪名，大江服刑一年。勾文庆被判三年徒刑。

1977年，四人帮被打倒后，文革后第一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齐燕铭在衡山饭店约见了勾文庆的父亲，勾文海也陪同老父亲前往，他至今清晰地记得，这位中央高官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一双“解放鞋”、手里拎着一只破旧的黑色塑料包。他们见面握手后，齐燕铭的第一句话就是：“共产党对不起您。”交谈中他问勾父



有什么要求，钱是否够用，房子是否够住。他父亲凄然道：“我还有一个不孝之子还关在牢里。”齐燕铭仔细地倾听着，让秘书一一记录下来。

两个星期后，开始审理旧案，以“轻罪重判”之名，勾文庆获得释放。此时，离开他刑满释放只有短短的三个月了。进过“庙”的刑满释放分子即使能够回原单位，也普遍受到歧视。为此，一个很有才华的无线电专业大学生勾文庆经此折腾，被断送了一生的事业。（照片：六十年代的勾文庆）

一个多月后，齐燕铭逝世。

至今，大江夫妇结婚几十年了，他的妻子甚至始终不知道丈夫的这段历史，大江居然也闭口不谈心碎往事，包括对他的儿子也只字不提。想一想，长期以来，他该忍受多么大的内心矛盾和精神煎熬。

非常年代，非常传奇。使我非常敬佩程本宁和那位翻译家老太太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鼎力救助一个政治逃犯。可以设想一下，要是大江顶不住压力，招出他（她）们俩人。那么，尤其是年轻的程本宁，他的后半生成功的历史就可能重新改写。

勾家几十年无法原谅大江，认为大江当初出卖了勾文庆，造成他们家一场难以逆转的灾难。但是设身处地想想，大江，一个文弱书生，从未经历过如此严峻场面，又没有丝

毫在这种场面下如何抵赖的“经验”。况且，当时在中国马路上，也绝对不可能捡得到短波收音机。他要是拒不招供，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等待他的下场，如同捏死一只蚂蚁那么简明扼要。

从此以后二十多年，除了我一人与他有来往之外，我们同学、尤其是勾文海一家都和大江完全断绝了来往。2008年，由于我们同窗好友的撮合，好友聚餐，请来了勾文庆、勾文海和大江，“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酒席上彼此的关系冰释。但近年来，我们多次与他接触，包括旅游、聚餐，都发现大江的性格已经变得比相当内向和寡言了。

人，就是这么脆弱，人，就是这么坚强起来的。

二十三. 恩师许懌和

从高二到高三，许懌和老师执教我们一斑、两班物理课共计两年，他是我们学校的物理教研组长。许老师自幼残疾，但颇具长者风度，对学生非常和蔼，也十分注意自身的仪表与教态，衣着十分考究，来校上班时是总是身着派克大衣、骑一辆当时昂贵的进口“三飞”自行车，常常使我们一批羡慕者围着这辆自行车赞叹不已。因为，在班里拥有自行车的同学不过三五人。不像今天，学生基本上人人都有条件买自行车，而且对旧车、老式车还不屑一顾呢。

他的文化底蕴深厚，学识渊博。虽然上课有欠生动，但讲课逻辑严谨，条理清晰，一丝不苟。他写得一手好字，板书规正、如印刷品一样，从左到右，丝毫不歪。物理课代表陈利华和程本宁与他接触颇多，一次到办公室偶尔翻看他的备课笔记，那简直如同钢笔字帖一样，丝毫没有任何涂改。这就是两代知识分子的不同。

如今不少年轻教师，字迹歪扭潦草，板书毫无章法。记得一个真实的笑话，那是我从教以后，是其他班级的学生向我诉苦，（当时我已是学校中层干部）说他们班级的物理老师字迹极为涂鸦，就像画符。一个极糊涂的女生竟然把他的板书文字误当混联电路“画”在笔记上。读者肯定无法想象，但听闻到此事的老师个个笑得前合后仰。为此，作为分管课堂教育的中层干部，我还亲自去听课，课后还婉言提醒过这位“象形文字”的爱好者。

作为许懌和老师的门生，1978年我回到母校，与许老成为同事，方才更加清楚地了

解他的处世风格和为人之道。他与世无争，好好先生，平时寡言，从不与人红脸。作为教研组长，他对于那些物理水平不高、但自我感觉良好的物理老师，从不背后议论。即使此人解题逻辑混乱，还振振有辞或强词夺理时，他依然耐心开导。只不过使人感到，他的语气略微不同于往常。

我应他邀请，能够和他的办公桌面对面，深感他对我的厚爱。

他的办公桌上一尘不染，就像他的衣着一样整洁。只不过文革后他的衣着朴素，远不像文化革命之前那么考究了。他家住富民路，（解放前就是高档住宅区）上班骑自行车从徐汇到虹口要化一个多小时，领导特例照顾他体弱年老，恩准他可以八点半到校。他进办公室后第一件事就是抹办公桌，洗手之后，他从包里拿出一只方型面包用早餐。打开蜡纸，里面整整齐齐的切成一片片，每层夹有白脱油。我们始终惊奇的一个谜就是：这种一毛四分钱的面包，包装蜡纸极为紧凑，即使不加白脱油，拆开之后，也难以再次包好。他居然加上白脱还能包得服服帖帖，纹丝不乱，真是奇迹。

虽然他做事慢条斯理，但是效率极高。比如，做一般物理选择题，他几乎很少用草稿纸，常常喜欢默默地心算。遇到刁钻古怪、故设陷阱的物理题目，总是喜欢推荐给我共赏，目的是使我见多识广。如果我没有被“忽悠”，顺利破解之后，他会用期待而诡秘的眼光看着我，询问道：“这道题怎么样？”我大呼：“好题目！好题目！”于是两人相视、抚掌大笑。因此，我们师生俩关系极为亲密，文学、历史、音乐、笑话无所不谈。有时还一起到附近咖啡馆喝咖啡。

我还记得，他有一次说了个笑话，那是他大学（他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里一对师生恋爱结婚，婚礼上，某教授送来一幅对联。上联是：“**教育教育**”，下联是“**学生学生**”，横批“**先生**”。先时使我愣了一分钟，然后悟出其幽默的隐意，大笑不已。

许老师是名门之后，这是许老与我成为忘年之交之后他私下告诉我的。他的曾祖父许景澄曾经是清朝慈禧太后的御前大臣，后来被慈禧太后所杀。但是对于因为何事被慈禧所杀的具体细节，他却三缄其口，闭口不谈。以下内容，是我写本书时，为了核实，从网上查找到有关资料，才了解其中曲折事由：

【史载】：1900年春夏之交，义和团作为一种多神教组织，在一些朝廷官员的支持下势力迅速坐大。不仅肆意屠杀许多传教士、教民，而且分尸、火烧、奸淫，手段十分残忍。甚至连与洋人有关的铁路、电报局、电灯、电线等亦在彻底捣毁之列。在这种情势

下，西方列强要求清廷镇压义和团，以保护使馆、传教士和教民的安全，否则，就威胁将组成联军，再次侵华。清廷连续举行了四次御前会议，讨论战与和的问题。主和派与主战派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多次相持不下。主和的大臣有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等。

光绪皇帝心里知道，我方理屈，况且国力不敌洋人，万不可与西方列强开战，否则必败无疑。但光绪皇帝慑于慈禧的淫威，不敢明说，想借“通洋务”的大臣许景澄之口说动慈禧。于是，光绪皇帝从座位上下来，拉着许景澄的手说：“许景澄，你是出过外洋的，又在总理衙门办事多年，外间情势你都知道，这能战与否，你明白告诉我。”许景澄说：“闹教堂伤害教士的交涉，向来办过的，如若杀害使臣，毁灭使馆，则情节异常重大，国际交涉上罕有此种成案，不能不格外审慎。”光绪听了这番话，悲从中来，拉着许景澄的手痛哭，许景澄也随之涕泣。慈禧太后见此情形，厉声呵斥：“这算什么体统？！”最后，慈禧太后还是决定向西方各国开战。做出开战的决定后，慈禧太后对主和派官员进行“问责”。在1900年7月，慈禧太后分别将主和的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等五人处死。

至今，我才恍然大悟，原来，由于在当时中国的历史教课书中，义和团是作为民族英雄被正面歌颂的。所以，当时的许老根本不可能谈及他曾祖父之死的具体细节，以免在政治上招惹是是非非。

即使到近几年，历史学界对义和团究竟是过激的邪教组织、还是保家卫国的正面英雄，依然是争论不休的问题。不过，近来似乎对义和团的评价开始一天天有所突破了，多数历史学家已经倾向于认同前者了。（最近，名嘴周立波对义和团愚昧的无情调侃就很说明问题。）现在，甚至对李鸿章、曾国藩、洪秀全、孙中山、蒋介石的评价也不是一边倒、脸谱化了。又如，我们在旅游中从南京近代史博物馆看到对太平天国的接近中性的历史评价，深感历史界的研究已经日益趋于客观。

许老对老上海的掌故了如指掌，甚至哪座不知名的老楼房、老地名和上海名人，他都能把所有的历史脉络讲得清清楚楚，十里洋场典故的枝枝节节他都能娓娓道来，简直如数家珍。他的记忆力极好有一次，他对我说：“我对你的印象最深的是，你们高二时，

一个德国货的螺旋测微仪在学生实验时被拧紧，无法使用，修理需要五、六元钱，你到办公室里来，主动承认是你不当心弄紧的。是不是？”我说十几年前的事，根本想不起来了。他说道：“嘿，我当时就是被你的诚实行为所感动啊，所以连检讨也没让你写。我自己到总务处报销了修理费。按照实验室条例，你没有按操作规程做物理实验，学生是要赔偿修理费的。”（当时，绝大多数工薪阶层的平均工资在四、五十元以下，那时的五、六元钱就相当于今天的二百多元了。）

许老英语极佳，是学校里有名的“英文活字典”。坐在他对面。我常常看到英语教研组长谦恭地前来请教他，有些英文俚语是什么意思，有些英语句子为什么无法解释得通，甚至包括当时英语辞典上根本查不到的单词，他都能有求必应，（八十年代，英文辞典寥寥，电脑又尚未兴起，更加不用谈互联网了。）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耐心解释。似乎没有什么难得倒他的英语问题。后来我才知道，他就读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是教会大学，全英语教材，上课从来不讲中文。年轻时，他曾经有一个好朋友是犹太人，关系相当密切。凡此种种，决定了他的英语根底肯定非同寻常。他非常欣赏犹太人的睿智，常常溢于言表。他说犹太人非常聪明，而且极其善于理财。他那位犹太朋友最穷的时候，发现上海的欧美侨民如厕时，实在用不惯中国的粗糙草纸，就到中国老式纸张铺买了许多廉价的练毛笔字用的细软的毛边纸。回家后，他按欧美人习惯的式样裁剪、折叠、分包。然后到各个宾馆、洋人住宅一叠一叠兜售，居然赚了不少钱。

三年后，由于学生的好评，学校领导的器重，老教师们的推荐，我 37 岁就当上了物理教研组长。而许老师还有两年退休，主动让贤。那时，教育界依然崇尚论资排辈，不像现在这么大力提倡干部年轻化。所以，我第一次到区里参加物理教研组长会议，那帮五十岁以上的各校教研组长老头们都大惑不解地瞪着我，把我这个三十多岁的“小青年”当作异类。

师生同事，本非罕事。但古人历来“文人相轻、同行不授”，我能够与这位才高气清、提携后生的前辈成为忘年之交，乃是我一生之大幸。至今师恩难忘，师品犹铭。

他退休后，我去看望过他两次，每次总是看到他坐在家具拥挤的小客厅里与两位八、九十岁的耄耋老人（他的丈人、丈母娘）默默相对无言。而他的妻子因为“支内”到贵州，已经十几年与他分居两地。后来听人说，他妻子退休回上海后，他们的夫妻关系不怎么亲近，这也在情理之中。

令人扼腕的是，他本来就身体孱弱，退休两年就因病去世了，享年仅 62 岁。也许，离开了他毕生执教的教育岗位，离开了天天面对的学生们，使他的精神世界骤然失去了平衡。退休后心灵的空虚失落、失去了以往在学校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共鸣，使他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惆怅和孤寂，加剧了他的衰老。他去世后，我很难受。由于相距路远、加上我常年执教高三毕业班、工作极忙，两年中我去看望他的次数只有两、三次。不，这



些都不是理由，弟子每念此，痛悔不已，希望许老在天之灵原谅我的无知和疏漏。

(旧照片：是 1985 年老校拆迁前全体物理老师留影：前排中央是许恽和老师，右一是我，右二是关锡鸿老师，右三是傅正老师，右五黎建中，右六许重辉。后排右一项祖富、右二宋雅芬、右三王汉萍、右四物理实验室管理员伍洁婷、右五沈一霖，壮年患病英逝。)

【 后记 】：

历史最后会把一切安排就绪，即使我们那时已经死去，而且对这一切毫无所知。

-----恩格斯

虽然我是一个物理高级教师，长篇的文学写作还是第一次。不过，年轻时大量阅读的中外文学名著使我受益匪浅。在考虑用什么风格写这本长篇回忆录时，我斟酌过长久。我最喜欢维克多·雨果的作品。但如果学习用他的华彩、悲壮的手法来写我的回忆录，年轻人恐怕容易觉得我写的东西描绘过于渲染。所以，最后我确定用“白描”的风格，努力学习列夫·托尔斯泰写作中那种基督教徒式的恬淡心态，不走极端，在罗列事件真相的过程中，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去辨别。

这本回忆录第一卷的单独撰写编排、图片的镶嵌和敲打键盘、反复修改校对，花费了我这个电脑初级班水平的老贡生整整一年的功夫。由于从来没有学过打字，本文全部是我用一个手指敲打出来的。正如俗话说，六十岁学吹打，何其艰辛，读者可想而知。

写作操作中，我常常面对电脑的发问束手无策，以至不思茶饭，四处请教。十几度的操作失误，有时甚至会丢失刚刚写好的大段文字，只能推倒重来，使我的精神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常常深夜一点钟还在苦苦摸索失败的原因，或反复修改文章，琢磨如何表达，无法辍笔停下，由于我独身生活，以至写作到十点钟才想起还没有吃晚饭。一年中，我写初稿只用了两个月，可是修改、补充资料却用了足足用了一年，单单修改就不下三十次，读者想想，九十多页文章，通读一遍就得两三个小时。所有这一切，全是为了保存这段不能忘却的记忆。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最近讲话中说：“一项社会调查结果显示，18至24岁公民中，有90%的人不知道那些在斯大林大清洗中受难的知名人士。他们的姓名、事业正在被遗忘。”这话出自一位大国总统之口，表现一种高度的重视和深切的忧虑，也体现了一个政府的前瞻的历史责任感。而在中国，只有为数不多的老百姓在网上回忆、统计、呼吁，势单力薄地还原着中国近代历史六十年中许多悲凉而不可思议的惨剧见闻，还要时时刻刻担心文章会被网上删除。这真是对“辉煌说”的莫大嘲弄。

还是那句话，一个死要“面子”、没有反省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

年轻人必须明白：人活着，不仅需要钱，更加重要的是要有社会良知和责任感，因为将来属于你们。

凭心而论，我六十二岁写这本回忆录的过程（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回忆）无异于是一种自虐性的精神折磨过程。固然在写作中我同时也释放了多年来的郁积和青年时代快乐的回忆，但更多的是不堪回首的悲哀、无奈和愤懑。使我写作时常常会感到心情拥

堵、思绪澎湃，以至独自老泪盈眶。

我对往事的记忆力特别好，多数往事历历在目。记得，我在二十岁时曾经问母亲：“妈，我小时候你抱我到欧阳路口去看过解放军进城的坦克车，记得吗？”母亲惊讶得几乎叫起来：“小鬼，记性介好，那时你只有两岁啊！”然而，记忆力太强也正是我们这一类人的致命伤，因为容易遗忘的人往往比前者更加幸福。但我写这本回忆录不仅为了怀旧，我认为自己是在默默地做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

回忆录中个别细节不详之处，经过我同窗好友的补充、提供线索以及我自己在网上苦苦查阅与新沪中学有关的资料，使得文章更加充实、丰满。在此，本人对那些好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本文史实如有遗漏之处，希望老新沪同仁、前辈们多加指点。

巴尔扎克说过：“没有遗忘，人是活不下去的。”如今深有体会。

钟恕尧 写于 2009 年 1 月至 12 月

【补遗】

亡校伤感往事--新沪轶事十八则 钟恕尧

以下，作为我写的新沪中学校史的补遗吧

■ 京沪中学是由**蒋经国**授意，**汤恩伯**组建的一所中学。具体筹办人是著名爱国教育家**黄树滋**，也是第一任校长。旧校址地处溧阳路四平支路口，当地老百姓俗称东洋花园，是原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一所培训基地兼俱乐部。

■ 解放前，新沪中学(京沪中学)可能是上海最大的私立中学，它有最大的面积，(不包括外操场就有三十多亩地)最大的图书馆藏量，最齐全的生物模型标本藏量。它的特色是师资力量强大，但绝对不同于现在土豪子女的“贵族式学校”，而是要凭成绩考进去的。

我的表哥说，基本上是 8、9 个学生录取一个。在学生中有相当部分是江、浙各城市慕名而来。解放前后，新沪中学学生基本都是住读，班主任也必须住在学校宿舍。

■ 京沪中学的学费也相当昂贵，有好几种说法，有的说一个学期学费是一担米，有的说 56 块大洋。我以为他们都对，因为学费是针对不同时期而言。我的哥哥和表哥都曾经

在解放前就读于京沪中学，母亲说学费大致相当于上海一位中、高等职员一个月工资。后来，表哥因为家境不好，付不起学费，一个学期后不得不转学到复兴中学。

■ 解放初，由于许多顶级的高级知识分子被**蒋介石**带到台湾，或避祸出国，大陆的大专院校师资严重缺乏。加上新中国百废待兴，要在内地兴办一批高校。中央教育高层号召学术能力强的中学教师支援大专院校，**师资强大的新沪中学是首当其冲的对象**，于是我校许多名牌教师响应党的号召，应聘报名。以后，他们纷纷成为教授和专家。

这是对新沪中学雄厚师资的第一次重要削弱..

文化大革命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当时极为风行的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被当时老三届和应届高中生毕业生奉为高考复习的“圣经”。甚至连当时“参考消息”报的欧美报道中，都有对这套优秀丛书的特色加以赞扬的评论。当时，**老教师关锡鸿指着该书的编委名单，如数家珍地一一告诉我，其中有六、七位都是解放初出自新沪中学的名师。**

（下图为前辈校友寄给我的毕业照，其中前排右起第五就是新沪语文名师纪民，教研组长，我的恩师，文革以后被贬到一所初级中学，我曾经在文革后七十年代末去他家看望过他。左起第一是毛天锡，我的化学恩师，虹口区著名的教师。下文就会谈到他在文革中所受惨痛迫害而死的轶事。左起第五是我的体育老师**朱光汉**老师，由于他和**曹聚仁**的关系，文革被打成反革命。**曹聚仁**作为解放后的国共谈判密使，可见于我的新沪中学校史（代序）。前排右起第七是**励乃骥**，民国元老，1926年就加入孙文主义学会，曾任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院长，五十年代曾担任新沪中学数理教师，退休后又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注：照片是1957年，照片注明的新沪中学第八届，实际上是指解放后改名后新沪中学后的第八届，其实是1945年创立的。



■ 解放初，新沪中学的教师中有一大批民主党派教师，分属民革、民盟、民进、民建、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支部，几乎全部囊括了所有的民主党派，他们多是各科的名牌教师，是一批不可小觑的精英群体。反右时，他们与党支部展开大会辩论，指责崇明游击队出身的校长陆鼎丰昏庸无能，外行领导内行，致使新沪高考升学率下降。提出要以南大楼为主，划地而治，自由竞争，比一比看谁的教育质量高。反右后期进行彻底清算，姚祖焕被党支部定义为“反党急先锋”，罗海沙被称为总后台。以后，这批教师不是被打为右派革去教师资格，就是到边远地区（青海、甘肃、云南）劳改，有的甚至以追究有所谓“反动历史”为由而锒铛于入狱，总人数占教师的三分之一左右。

这是对新沪中学师资的第二次重大打击。

我的同学勾文海小时候（五十年代）常常去新沪中学看语文教师的妈妈，那时在南大楼和中大楼之间的确有一道墙，还有一扇大铁门，当时的民主棚还是一片草地。此事最近也经过我的同学刘经元儿时的记忆证实。

■ 据许多知情教师提供线索，58年反右清算时，由于校长兼党支部书记陆鼎丰比较无能，所以，敲定右派分子名单的最核心人物，实际上是当时的党员教导主任应YL和他

的妹妹（党支部秘书）应FH两人。

■ 60-63年，我们初中(11)班的班主任是蒋老师，这是一个看上去相当孤高的人。但脸上总是带着令人琢磨不透的古怪微笑，似乎城府很深。作为政治老师，他的言行比较左，对资产阶级出身的学生有一种天生的厌恶。他甚至在班会课上声色俱厉地说：“你们知道吗，共产党为什么养着你们（指资产阶级）还给你们定息？是怕你们造反！懂不懂？”

有一次他特地把我、金晓、沈子良叫到他家里开会，要求我们三个人在班级教室后墙上专门设立一个专栏，用漫画和打油诗讽刺班级所谓“不良现象”，取名“小辣椒”专栏。许诺水彩染料、纸张、毛笔统统由他充分提供。那时，我的画画、文笔都尚可，而金晓、沈子良的文笔和打油诗又都写得不错。由于我们三个都是成分相当不好的学生，受到如此“器重”，颇感受宠若惊。他要求我们基本上每周至少“出版”一次，要求图文并茂，务尽辛辣，而且要指名道姓。“小辣椒”出版十多期后在引起班级巨大轰动，也得罪了不少同学，引起争执，后来蒋老师不得不停刊。

今年初中同学聚会中，尽管班长郑贝贝邀请了他，但少有同学去和他亲密言谈。资产阶级出身的张某某当时对金晓耳语说，当年蒋老师曾经把他的品德评语等级定为“差”！金晓告诉我此事，我也感到惊讶和意外。呜呼，我从事教师职业几十年，知道这种最低等级的品德评语是及其罕见的，即是对双差生也最多只能评为“中”，以观后效。作为班主任对此类评语是应该慎之又慎的，绝不能下手如此之重，因为这关系到学生的升学政审，有时甚至会断送他的一生的前途。何况张某成绩好，又没有调皮捣蛋，只不过他这个人的性格相当张扬而已。

■ 郑保定老师，我校的英语教研组长。年轻时曾经为中央日报记者，在“十万青年十万军，一寸山河一滴血”的召感下，投笔从戎，成为滇缅战功臣的一员。抗战中升任为盟军的上校翻译官。

他曾经曾经参加过“衡阳保卫战”，后来在“陈纳德飞虎队”司令部工作多年，与国军著名将领陈明仁、郑洞国等熟识。当时，在机械化器材根本无法使用的情况下，与国

军高级将领一起徒步从云南穿越原始森林，转战于缅甸的腊戍、密支那、曼德勒，直到印度的加尔各答，经历过疟蚊、蚂蝗、毒蛇、猛兽、泥泞、暴雨、饥饿和战斗的洗礼，克服了种种艰难困苦，故深得魏德曼的器重。曾经奉命带领过一批飞行员去美国培训，故与史迪威将军熟悉。后来郑保定老师曾经根据自己的日记，撰写过回忆录“滇缅抗战真相”。完成初稿后，正值刚刚解放。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他不得不忍痛销毁了草稿，**使文史界失去了一份宝贵的滇缅战争第一手资料**。反右和文革中他惨遭种种迫害和侮辱。现在我校英语教研组长**祝瑞咏**曾经回忆：他在澄衷中学任教时，有一句英语句子，单词统统都认识，就是怎么也读不通，困扰了他多时。后来专程去请教过他，**郑保定**老师居然就马上回答说，这是莎士比亚一篇戏剧中的句子，使得他当场佩服得五体投地，至今难忘。可见他的英文根底之扎实。

改革开放后，郑保定老师突然接到同济大学的英语教授聘书，因为悲喜交加，乐极生悲，突发心脏病去世。

■ 五六十年代，我的恩师**许恽和**（物理教研组长）和**毛天锡**（化学教研组长）是一对无所不谈的莫逆之交。许恽和老师是清朝御前大臣**许景澄**的曾孙。（许景澄曾经留洋，懂得国际法。因为反对慈禧支持义和团、向各列强开战而被处死。）许恽和毕业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大学全部采用全英语教材，在校不允许任何学生讲话用中文。而毛天锡年轻时曾经做过美军顾问团翻译。两人的英语功底在新沪中学极为了得。仅次于**外语教师郑保定**，而反右以后，人人噤若寒蝉，不敢谈论政治和欧美。**许恽和**与**毛天锡**他俩的悄悄对话常常使用英国的苏格兰语，所以连大多数懂英文的教师也根本听不懂。（这些都是我在文革中大字报的所谓的“揭露”中所见）

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许恽和与毛天锡成为运动的对象，他们承受的压力极大，在左派逼迫下，许恽和老师不得不坦白了一些毛天锡的私房话。

比如**毛天锡**告诉他，**现在他之所以长得高大结实，得益于年轻时在美军顾问团当翻译时的饮食**。那时抗战结束，物价飞涨，毛天锡正好处于长身体的年龄，食欲极好。而美军顾问团每份套餐规定一个人只能吃一块牛排，作为小青年翻译在美军顾问团根本没有什么地位的毛天锡居然会请求上司加一块牛排，上司竟然也同意了这种特殊待遇，因此他的午餐套餐中一直有两块牛排。

当这种全校轰动性的“揭露”出现在大字报上，这对毛天锡老师无疑是相当致命的。因为这不单单是在宣传美帝国主义的仁慈和宽厚，而且在愚昧的“革命群众”看来，你毛天锡竟然做过美帝的走狗，而且至今还如此感恩，实属大逆不道。于是毛天锡老师不久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而更加令人感到蹊跷的是：不久，揭露许恽和老师“丑闻”的大字报也突然纷纷喷涌而出，但都是没有政治性的，纯粹是所谓道德方面的攻击，这也使许恽和幸免于难。说明毛天锡在“牛棚”里没有揭露老朋友许恽和老师本质性的内容。两年后郁闷的毛天锡走出牛棚，不久就因肝癌去世。下图，毛天锡老师（这是五十年代的校友寄给我的毕业照中我切割下来的部分，所以相当模糊。右边许恽和老师照片也同样如此，以便使我们今天能够一睹他们的风采。）



现在想来，非常明显，完全可能是 GCD 左派一贯的伎俩，故意挑动知识分子内讧和“反戈一击”，让他们互相揭露，从中渔利，达到获得越来越多的政治上无限上纲上线黑材料的罪恶目的。

后来我回新沪中学任教，许恽和老师和我同事多年，我们既是师生又都是物理同行，关系自然非同一般。但在我的记忆中，他从来没有提起过毛天锡一个字，这是一个一生与世无争、极其善良的大好人，此事应该是他的一段终身的隐痛。

古人云：为逝者讳。许恽和老师虽然已故，而且是我的恩师。我非常同情他的当时的处境，但又强烈地希望还原真实的历史，不愿意这些史实随我的两位恩师仙逝而湮灭。

我披露这些事的心情相当复杂，但本意是为了谴责那些政治上故意恶毒地制造社会分裂的政客们，上帝原谅我，愿恩师们的灵魂安息。

■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两名年轻的女教师出于“革命的义愤”，一位曾经向“牛鬼蛇神”碗里吐过痰，一位曾经逼着“牛鬼蛇神”吃泔脚。由于这种当众的侮辱行为，后来她们的入党申请一直没有通过群众（尤其是老教师）的评议。到退休时也是非党员，而且都是终身未嫁的老姑娘。

■ 以下是我在校友博客上摘录的新沪著名历史教师**葛彦楚**（已去世）和妻子的合影，她女儿回忆说，他是一个老实本分又倔强的老派知识分子。由于历史上曾经担任过旧政府职务的原因，他在文革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全家也因此而受牵连，殷实的家庭也被洗牌到社会的贫困底层。



历史“不清白”的老教师更是自感命悬一线。我的同学勾文海的初中班主任是**陆秀君**，几年前她曾经告诉勾文海他们，那天，举行全校性的批斗大会时，当所有的“牛鬼蛇神”胸口都悉数挂着大牌子排列在中小楼上的大平台上向全校公开“示众”时，有的女教工甚至被剃了阴阳头。**陆秀君**和**艾侠**两位女教师吓得在大垃圾桶里整整躲了一天，一直到人散校空，才偷偷逃回家。

艾侠老师的丈夫是被判刑多年的所谓“反革命”，苦命的她带着几个孩子艰难度日，教学上她是一位敬业的好教师，是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她非常喜欢我，我还曾经去过她家，

好像住在浙兴里。

可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不久，她依然免不了受辱的结局，也被剃了阴阳头，以后我们一直看到她整天戴着一只藤制工作帽在监督劳动，心里觉得实在凄楚。

■ 文革后，我进新沪中学教物理。我有一个 78 届学生叫**邱红**，她的祖父**邱清泉**是国民党著名的抗日将领，留学德国，陆军二级上将，抗战期间曾任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与第五军军长，参与昆仑关战役与滇西缅北战役。抗战胜利后参与国共内战，为第二兵团司令，在淮海战役（又称徐蚌会战）中阵亡。颇能近体诗，人称“将军诗人”。**邱红**的父亲是一个普通的职员，是**邱清泉**唯一的儿子，育有两个女儿，住在溧阳路瑞康里。

邱红也可以说在新沪中学近二十年中少见的全方面发展的优秀学生，她不但门门功课名列前茅，而且是短跑高手。人也长的修长漂亮。尤其是她的物理成绩杰出，在文革后上海市第一届物理比赛中获得第 32 名（要知道，那时物理比根本赛不设一等奖、二等奖，只有名次。而且不仅仅要考试题，而且要考物理实验的动手项目，难度相当大。）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前面的 32 名全部是男生**，后面也极少有女生获奖。（她的妹妹也在新沪中学学习，不过与她无法相比。）她酷爱文学，常常与李音（我班的团支部书记）一起来和我长谈宋词和外国文学。

后来 78 届高考，她考取了复旦大学生物理系，成为中国最有名的生物遗传学家谈家桢的门下子弟，不愧为杰出的将门后代。

毕业以后她去美国深造，我们从此失去联系。

■ 85 年，新沪中学被虹口区教育局强行拆迁，其大面积的黄金地段土地批租也有一段辛酸史，完全是由区人大主任卢莉娟一手包办，房子统统被拆，一片黄土地闲置十多年。**这是对新沪中学师资的第三次打击。**

最后，老新沪中学的校园终于卖给香港人造的“喜临门”大酒店，奠基那天一场雷阵雨，结果被虹口人戏称“**死不临盆**”（上海话谐音）

■ 我发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凡是调离或离开新沪中学的教师，有许多升迁或发迹了，仿佛跳出了厄运。比如，体育老师**赵蔚庭**到北虹中学，从语文教师、语文教研组长

一路做到教导主任；外语教师**孙佩芳**到虹口教育学院成为虹口区英语教研员；物理教师**黄渭风**调到虹口教育学院从虹口区物理教研员一路升迁到教务长；**艾华澄**老师在新沪并不得志，改革开放后到复兴中学任教，被大大地器重，成为名牌教师；少先队辅导员**李承昌**离开新沪中学后也一路升迁，直至身居虹口区事业局党委书记；新沪的团委书记**曹群**离开新沪中学，调到虹口区委担任区党委书记黄耀金的秘书，后来又成为虹口区档案局局长；**郑杰**离开新沪后曾经担任北郊学校校长，得到上海教育局长刘某赏识，屡屡见诸报纸，光彩照人，成为上海教育界名人。但后因得罪虹口区教育局上层，从此仕路坎坷。生物教师**崔乐美**离开新沪后，在鲁迅中学被评比为“上海市最佳心理辅导员”，报纸、电视上曾经连篇累牍地报道过她的优秀事迹；数学教师**陈子康**在新沪中学解散后，去五十二中担任了教导主任；大队辅导员**区嘉**离开新沪中学，现在已经成为北郊学校的副校长。水平一般的数学老师**金丕龄**从新沪辞职，承办了民办中学，由此大大发迹（但前几年刚刚因癌症去世）。等等，不胜枚举。

■ 八九十年代，邬显亮校长当政时代，他崇尚“以法治校”，法制建设学习、法制研讨会、学生模拟法庭比赛等等风行一时，实际上浪费了学生大量时间，而高考升学率跌入低谷。他在全校教工大会上说，“拼高考，我们拼不过人家重点中学，我们必须从“以法治校”为抓手打开缺口！”在行政会议上，我公开表示了不同看法，觉得他的说法无形中伤害了教学上努力拼搏的骨干教师，使混日子的教师有了偷懒的充分借口，反正死猪不怕开水烫嘛。听了我一番话，邬校长当即瞠目结舌。不过这位校长有一大优点，气量大，容得下人，从来不会轻易报复任何骨干教师，这也是我的造化。

不过，他的努力终于使得我们学校大门外挂上了“上海市“以法治校”优秀单位”的金色招牌。

■ 九十年代后，由于“军民共建”的缘故，新沪中学许新调进了多军嫂当职员，个别人是只有小学水平的农村妇女。她们的丈夫全部都是中校级军官以上。记得新沪中学曾经调来一位军嫂担任校卫生员，大家都称呼她某医生，尤其是一些女教师常常去问长问短地请教她。其实，她只经过速成的卫生员培训，除了涂涂红药水、紫药水，没有多少医学知识。

一日，我去卫生室，听见有一位教师在问她，牙周炎吃什么药比较好。她不假思索地

回答：“! SM2 最好!”我差一点喷饭，她怎么连当时最常用的药 SMZ 都不知道？把 Z 误认为是 2。我实在憋不住，急忙离开。

■ 在新沪中学，还有两个奇怪的现象，其一，凡是教育能力突出的教师，其子女多半不出色；而平时浑浑噩噩的教师，其子女倒却有不少是出类拔萃的。其二，搬进第三次新校舍后，大多数教师生育的独生子女后代都是男孩，女孩极少，比例严重失调，这会不会与新校舍涂料污染和我们学校屋顶上的电讯公司发射塔的电磁辐射有关，那就不得而知了。

■ 新沪中学最后十年，我所知道的新沪中学的共产党员至少有百分之五、六十素质底下，有的人入党纯粹是为了升官，无法达到目的就牢骚满腹，甚至与领导对立。大多数党员教师只适合当官，教学能力一般或极其底下，这是他们的共性。如末代党支部书记 K 某，69 届插队落户，初一文化程度，回沪后当居委会干部，凭着和上层同学的关系，接任我校胡梅芬书记，她不学无术，对高中数理化基本知识一窍不通，还装模作样和我（我当时是中层干部）一起去听课，我偷偷斜看她的听课笔记，基本空白，连化学分子式都不会写，但听课后有模有样地作听课评价发言，使我陡生强烈的幽默感。但想不到，她接任书记不久居然被评上“高级政工师”的高级职称！还有一位党员副校长 XIE 某，外地来的高级教师，常常吹嘘自己过去的辉煌，后来让他代课高三，想不到他的上课极烂。可是他见人总是满带笑容，忙忙碌碌，似乎是个敬业的领导。但此人深谙两面三刀、翻脸整人之术。有的党员做到教导主任，比如全校闻名那位“江边洋子”，他上课时大部分学生睡觉，他居然还会在上课时打学生耳光，引起家长来校举报。此事后来被校领导偷偷掩盖，很少有人知道，丑闻彻底被“和谐”。有的党员纯粹是政客，比如政教主任 Lu 某某，紧跟在末代党支部书记 K 某某屁股后面，出谋划策，上蹿下跳，与校长作对，罪名是校长排斥党的领导，最后把新沪中学彻底搞垮解散，并入钟山中学。党员物理教师李某某假借生病为由请假不上班，私下到松江一家私立学校任教赚外快，还操着一口苏北话信誓旦旦地拒不承认，直到校干部亲自去松江那个学校，被逮了个正着，他也竟然丝毫不脸红，不愧为斯大林所说的是“特殊材料”制成。而正是他在几年前居然还刚刚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够了，够了，不说了。反正在我的记忆中，近十年新沪中学

的合格党员屈指可数，只有胡梅芬、陈子康、朱菊珍等极少数几个。

甘蔗啃到梢，我虽然已经退休解脱，至今说往事，虽然是为了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也无端地影响了我的情绪。只是希望年轻人必须了解真正的历史真相。哎，一代名校新沪中学的亡故，就是毁在解放后历年这一类人手里。

钟恕尧 写于 2015 年五月

回忆录：“琐忆”已经全文刊登于香港中文大学网站“民间历史”中。

作者：钟恕尧

作者信箱：shuyao777@yeah.net

作者博客：新浪“钟恕尧的博客”

版 次： 2010 年 1 月 第一版。 2012 年 12 月 修